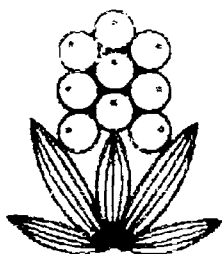




陈翰笙百岁华诞集

张椿年 主编
陆国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翰笙百岁华诞集/张拓年,陆国俊编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ISBN 7-5004-2373-X

I. 陈… II. ①张… ②陆… III. 陈翰笙-纪念文集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8076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7

字数:274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 20.00 元



已滿 101 周歲的陳翰笙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
“陈翰笙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
75周年座谈会”



目 录

编者话..... (1)

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同志致开幕词.....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代表
党中央向陈翰笙同志祝贺..... (6)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讲话.....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讲话 (12)

国内外知名人士的祝贺

贺翰老百岁华诞..... 马 洪 (17)

陈翰笙老前辈百岁荣寿祝词..... 刘大年 (18)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季羨林 (22)

伴岁月踏歌而行
——贺陈翰笙教授期颐大寿..... 张文秋 (24)

当代理论工作的楷模..... 秦柳方 (27)

他的事迹是一座丰碑..... 薛葆鼎 (31)

一身正气 淡泊名利..... 张 彦 (38)

一辈子做了好事..... 爱泼斯坦 (46)

社会各界人士的祝贺

庆祝陈翰笙教授百岁华诞..... 郝 斌 (49)



对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

75 周年的祝词	宗莉如 (52)
关于陈翰老早年的一篇文章	陈乐民 (54)
陈翰笙早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	史建霞 (57)
陈翰笙教授和他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从翰香 (65)
陈翰笙先生与“中国农村派”的理论和学术贡献	雷 颐 (70)
谈陈翰笙 30 年代农村调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侯建新 (91)
追求理想不求闻达	顾景高 (98)
陈翰笙与工业合作社	爱泼斯坦 (103)
新中国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回忆陈翰笙同志 1947 年冬在纽约的议论	薛葆鼎 (112)
陈翰笙与《中国建设》	张 彦 (115)
庆祝陈翰笙所长百年寿辰	刘恩照 (120)
陈翰老与世界历史所	廖学盛 (124)
翰老的科研思想	陆国俊 (130)
陈翰笙：具有传奇经历的革命老人	田 森 (135)
百岁老人 一生清白	沈自敏 (139)
我说陈翰老	俞 源 (143)
陈翰笙姨父与我们	孙少礼 孙幼礼 孙稚礼 孙小礼 (148)
义兄——陈翰笙	彭家礼 (163)
我所知道的陈翰笙先生	费筱墨 (165)
翰老对我们的教育与关怀	李康明 (168)
结识陈翰老五十年	刘振寰 (171)
五十年雪泥鸿爪 ——记陈翰笙与李纯青的友谊	谈家芳 (173)
陈翰笙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启发	朱 敏 (184)



无处不闪光——记陈翰老	孙巧成 (186)
陈翰老二三事	刘存宽 (191)
中国的脊梁	胡其安 (195)
“文革”中认识的陈翰老伯	许本道 (198)
我所认识的陈翰笙教授	任雪芳 (204)
陈翰笙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	江 枫 (208)
给人以知识和启发	
——《陈翰笙文集》中几篇论国际关系的作品简介	
.....	张振鹞 (217)
写在《陈翰笙文集1919—1949》前的话	李新玉 (222)
我所认识的陈翰笙	陈志昆 (228)

附录一

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同志

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	(233)
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严谨的社会科学家	胡 绳 (235)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调查	薛慕桥 (238)
求真求是 刚正不阿	
——祝贺我所敬重的翰笙同志	吴觉农 (241)
培育后进 诲人不倦	孙晓村 (244)
陈翰笙与国际宣传工作	爱泼斯坦 (246)
我所了解的陈翰笙	爱德乐 (251)
庆祝陈翰笙教授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	(251)
翰老跨世纪的一生	薛葆鼎 (253)
翰老至少立过三个大功	陈洪进 (260)
陈翰老和我	陈岱孙 (263)
翰老为我们树立一个光辉典范	赵宝煦 (265)
学习翰老关心下一代	林承节 (267)
不停顿地无私奉献	田 森 (269)



我所知道陈翰笙教授的“国际贡献”

…… 史蒂芬·R·麦金农(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271)

附录二

陈翰笙同志在他百岁华诞庆祝会上的讲话…………… (277)

陈翰笙同志谈《地下工作二十五年》…………… (陈洪进笔记)(278)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感(一)…………… 薛葆鼎(299)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感(二)…………… 薛葆鼎(302)

陈翰笙诗选…………… (318)



编者话

江山不老，松柏长青，陈翰笙同志生于上个世纪末，而今已寿登期颐。翰老是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革命前辈，又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1996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庆祝翰老的百岁华诞。翰老的一些老战友、学生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纷纷发言，表达了他们对革命老人的景仰和敬重之意。在这次会的前后还有不少同志撰文向他祝贺。这些发言和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翰老在革命活动、学术研究、教育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懿德嘉行，具有教育的意义，为此我们将这些发言和文章结集出版。

为了对翰老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我们把同志们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祝翰老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和1994年北京大学为庆祝翰老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以及由翰老口述、由陈洪进笔记的《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薛葆鼎同志的《〈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纪》、翰老的一些诗作附录于集后。

翰老漫长的一生是一座历史丰碑。本集虽不能尽载他的业绩，但重要的它是我们对翰老届满百岁荣寿的一个纪念。

这本书的编辑校读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谈家芳、吕同六和童瑜琼同志的很大帮助。在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周用宜和任明同志给予了极大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诚致衷心的感谢。



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王忍之同志致开幕词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翰老是蜚声海内外的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在长达75年即四分之三世纪的岁月中间，翰老为党和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许多学术领域里面有卓越的建树，赢得党内外和海内外的同志和朋友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希望召开一个座谈会，在翰老百岁华诞之际，一起来表达我们对翰老的敬意。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有邓力群同志、黄华同志、薛暮桥同志、刘大年同志、季羨林同志、骆耕漠同志、梅益同志、张文秋同志，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还有国务院有关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无锡市等单位的领导，翰老的朋友和学生。

现在座谈会开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李铁映同志代表党中央向陈翰笙同志祝贺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举行“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我代表党中央向陈翰笙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

陈翰笙同志是我党健在的最年长的党员之一，他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时代。在他漫长的人生画卷中，刻印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黑暗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历程。陈翰笙同志青年时代就立志救国，1921年，他作为留美学生的代表，据理力劝北洋军阀代表不能在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上签字。归国后，他在李大钊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宋庆龄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指示，英勇无畏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作为宋庆龄的主要助手，协助宋庆龄同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通过自己主编的《远东通讯》，第一个向国外报导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他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争取国际友人和华侨支持我国的抗日战争，在海外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三次赴美，为配合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在美国从事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同志的召唤，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的顾问、外交学会



副会长、《中国建设》杂志副主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次座谈会，宣传和学习陈翰笙同志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是十分有意义的。

陈翰笙同志襟怀坦白，淡泊名利。他一向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群众，不讲地位，不讲享受，始终勤奋工作，不倦学习。从刚才他的很简短的讲话中，还在要求做事。不做事，他感觉心里不安，这也充分说明了他的道德文章。年轻时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90高龄时，他在别人的诵读下，认真地学习了《邓小平文选》，做了详细的笔记。陈翰笙同志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直到前几年，他的作息时间表仍是排得满满的。

陈翰笙同志为人正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四人帮”横行时，他曾公开指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在“文化革命”初期，他曾遭迫害，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从1972年开始，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在家中免费教授英文和德文。在他接纳的学生中，有许多所谓的“黑帮”子女，他不畏权势，不怕惹来横祸。

陈翰笙同志知识渊博，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他一面从事公开的或隐蔽的革命斗争，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他在毕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社会科学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解放前，为了认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他曾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调查组，从1929年春天至1934年，在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的24个县进行了广泛的农村调查。调查组撰写的大量论文和调查报告，论证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陈翰笙同志十分重视教育。百岁高龄前，他还写了许多呼吁



兴办教育的文章。他在培养青年方面，更是身体力行，对登门求教者总是热情接待。送给他的书籍论文，他都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他甚至不顾年迈、帮助青年翻译资料。受到陈翰笙同志培养和教育的学生遍布海内外。

陈翰笙同志献身革命，忠于人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懿德嘉行，为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做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衷心地祝陈翰笙同志健康长寿！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胡绳同志的讲话

陈翰笙同志，大家都称他为翰老。陈翰老是众所景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前辈，他用漫长的一生，为民族解放事业，为社会进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刚才汝信同志已经介绍了翰老一生的大致经历。我现在只就30年代翰老在学术界、文化界所起的作用简单讲几句话。

那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29年，国民党政府要建立一个中央研究院，由比较开明的蔡元培先生当院长。蔡元培先生就请翰老担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他自己任所长，所的实际工作是翰老做的。翰老利用这个基地，团结了一些学者，进行了大概有五六年之久的农村调查和研究工作。1932年，翰老又跟一些同志和朋友，包括在座的薛暮桥同志，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农村》杂志。这个杂志是公开出版的，没有遭到国民党查禁；它是搞一些调查研究，但是细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当前农村的事实。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科学地了解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当时，在思想学术界发生过一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翰老和他团结的一些同志朋友，的确是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和中国实际紧相接合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对党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问题还可以更深一层地看。当时，他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和党内的左倾现象是不相合的。大家知道，在20年代末特别是30年代初，在第三国际影响下，左倾势力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在“左”的影响下，按照左倾的做法，左翼组织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搞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不是去搞革命的文化创作；主要是搞飞行集会，贴传单，他们在这些集会和油印的秘密刊物上，提出许多形式上很革命但不合中国情况的口号，譬如，什么政治活动都以保卫苏联为宗旨。再一个就是排斥中间势力，惟我独左，惟我独革。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作只能是遭受伤害。那么，陈翰老跟他的同志和朋友从1929年到1934年所做的事情恰好相反，他们利用可以公开的合法的地位，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事情，不大肆宣扬革命的口号和摆出革命的架势，但实际地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确确实实为革命做了贡献。当然，我不是说30年代只有翰笙同志和薛暮桥同志他们几个这样做了。在30年代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前几年，可以说，上海左翼文化界已经相率悄悄地改变了某些过去的做法。原因是以王明为灵魂的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在上海站不住了，都跑到苏区去了。而留在白区的中央局的组织几乎都被破坏。上海的一些同志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的领导，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不得不放弃惟我独革的姿态，以免把自己搞得孤立，而尽量跟朋友合作，做扎扎实实能够接近群众的、能够公开的、起革命进步作用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上海的文化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界，显出一种新的生机，以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毛主席后来曾经说，国民党搞了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一个叫文化围剿，两个围剿都失败了。特别值得令人注意的，在文化方面国民党的围剿失败了，这个事情很值得沉思。为什么文化围剿失败了呢？当时的共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在国民党地区完全是手无寸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呢？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说，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共产党人掌握的是真理，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人需要的，因此取得了胜利。也许还应该加第二条，在文化方面，较早地多少克服了从国际方面来的“左”的东西、“左”的做法。虽然不能说，那时在国民党地区左翼文化工作者有意识地、系统地打破了“左”的框框，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与左倾路线相矛盾的做法，并取得很好的成效。在破除左倾束缚中，我们党有好些同志做过工作，许多是我们钦佩的老前辈，陈翰老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在这一点上简单说这么几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 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话

今天，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翰笙同志诞生于上一个世纪末，经历了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他早年受爱国主义思想驱使，赴美国和德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抱着报国图强的宏愿，投身民族教育事业，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参加了1926年“三一八”反帝大示威。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无论身居国外或国内，无论在公开和地下的斗争中，无论从事学术活动还是社会活动，都忠诚地为党的事业克服困难，努力工作。30年代，他组织大批青年社会工作者，在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的24个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通过对大量调查材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了托陈取消派散布的中国农村经济已属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误，驳斥了国民党政府宣扬“农



村复兴”的谬论；论证了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科学结论，支持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他秘密参与宋庆龄先生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活动，以不惧风险的无畏精神，多次营救受反动派追捕的革命者与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在海外创办《远东通讯》等报刊，发表时文，进行演讲，宣传我国的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主张，向海外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争取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支持我国的抗日战争。他作为宋庆龄倡导的“工合”运动和“保卫中国大同盟”的积极参加者，向同情、支持抗日的海外朋友与华侨募捐，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了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一批国际友人，同他们团结共事，为中国革命赢得海外进步人士的支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机智地冲破美国当局的阻挠，毅然回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交战线工作。他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种代表团，多次出访苏联及南亚、东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积极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为打破国际反动势力孤立新中国，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翰笙同志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涉及社会科学诸多的领域，尤其擅长经济和史学。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反对教条主义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善于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并联系实际确定课题，重视调查研究和采集信息，注重资料的完整与真实，力主使学术研究面向社会，为现实服务，强调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以学风严谨和著述丰富，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解放以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事业，身兼若干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团体的领导职务，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陈翰笙同志一向以“教书育人为本分”，把培养年轻一代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己任，对求教于他的青年来者不拒，关心青年人的德育，在学科知识、科研方法上给予指导，是许多青年



人的良师益友。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蔑视“四人帮”的迫害，不顾八旬高龄和双目几近失明，在主持编撰300余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同时，还在自己的居室为有志青年创办外语学习班；自编教材，免费讲授英语和德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除了继续免费教英语外，还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并积极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组织工作，积极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陈翰笙同志虽因年迈退居二线，但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鼓舞而青春焕发。他坚持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钻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以“年逾八旬不老翁”的精神，担任多种学术名誉职务，照例主持众多的学术活动，频繁接待各方面的来访者，十分关心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建设，热心向有关单位提出有益的建议。他把工作学习当作生命的第一需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党的社会科学事业奋斗不息的高风亮节。

陈翰笙同志对同志和友人慈祥恺和，坦诚相待，乐于助人。他光明磊落，具有刚直不阿、坦荡豁达的品格。他作风朴实，讲求实效，不尚空谈。他忧国忧民，廉洁奉公，疾恶如仇，不图私利，生活俭朴。始终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学者的优秀品德。

在庆祝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努力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国内外知名人士的祝贺



贺翰老百岁华诞

尊敬的翰老：

在您欢度百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

70多年来，您为党的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坦荡无私、刚直不阿的做人品德，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治学作风，永远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由于目前我正在日本访问，不能躬逢盛会当面向您祝寿，谨遥祝翰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马 洪

一九九六、十、



陈翰笙老前辈百岁荣寿祝词

刘大年

陈翰笙老前辈届满百岁荣寿，理当热烈祝贺。翰老一是革命家，二是学者。对于他平生的活动和贡献，我想可以用几个字来表达，这几个字就是：“革命前辈，学者宗师”。这个话很平常，但对于翰老来说则很不平常。

革命前辈各有经历，但不一定都有那么独特的经历。翰老从事革命活动、加入第三国际以来，已经70有年。他加入第三国际的介绍人是加拉罕、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70年党龄的同志今天可能还有，但是加拉罕、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人不见得有了。翰老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工作，现在看来是传奇性的。其中有一个组织，是由二十几个国家的活动家、革命家参加做情报和宣传工作的。翰老与闻其事。它一时无法写出来，翰老手里没有什么记录，别人手里也没有什么记录。听说集中了第三国际资料的俄国档案里有不少关于中国人的记录。倘若属实，翰老的某些活动，也许在俄国档案里有所反映。第三国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的中心，参予它的活动，是追求真理、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这是同时代革命者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失败，宋庆龄去莫斯科解释孙中山三大政策，争取国际上支持中国人民。翰老不久亦至莫斯科，与宋相识，往后长时间里协助宋庆龄工作。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在香港实际领导国际友人参与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生产军需和民用



产品，支援抗战。翰老一段时间里是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以后奉派至美国，除了报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还着重研究国际问题。到了新中国，仍继续着这个领域的工作。

关于学者宗师，现在有些头衔、高帽子满天飞，可以说不值钱。但翰老这个宗师值钱。1929年到1935年，他由蔡元培聘请担任蔡自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在长达六年时间内组织领导中国农村的系统调查工作，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一大创举。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存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两种生产关系中究竟哪个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这是确认中国社会性质的最终根据。农村的状况不只是有封建生产关系的一面，也包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一面。中国农村调查就是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它将直接回答中国衰败黑暗出路在哪里的问题。在蒋介石政权统治下，民族危机日深，内战不止，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外也有一些人把目光转向农村，想从那里做点什么或了解点什么。他们的情况彼此不同。一类是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与平教会。两者的背景、做法各异，但都参与农村的某些组织活动，不属于客观调查，更谈不上科学研究。再一类是《大公报》、《申报》等报刊对农村的采访报导。例如1936年《大公报》派记者采访冀南、豫北几个县的农村，并发表社评说，从那里看到的是“世外蛮邦、上古乱世”，中国文明衰竭了。而那些报导、评论一般停留于社会现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农村生产关系的本质。翰老主持的农村调查根本不同。它汲取西方社会学方法，用系统的、大量的涉及全国广大地区的统计资料、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说明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中国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使中共前此提出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即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进一步被理论界所证实了。这个证实，具有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它告诉人们，中国农村与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此作过扼要评述。中国农村调



查的展开，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鲜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派。他们出版的刊物叫《中国农村》，当时人们称为中国农村派。后来在新中国的经济工作中各有贡献的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人就来自这个学派。

陈翰老一生追求真理。加入第三国际是追求真理，开创中国农村调查和往后的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与坚持真理同样极其不容易。我们祝贺翰老百岁上寿，要学习翰老追求真理的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前人庆寿，或有咏作。这里口占几首小诗，作为我的祝词。

上寿高名出比邻，木樨地段钓河滨。
孙崎老与陈翰老，廿四楼中拜两人。^①

二

当初风雨日沉沦，抖擞苏俄道上尘。
不为恩仇只为国，大旗戴拥孙夫人。

三

桓宽盐铁问谁真，中国农村一派新。
几辈名家门户显，论宗共认辟山人。

四

鸿词博学贵精神，议到先生始信真。
我蛀遗经充著作，多惭名誉傍斯人。^②



注释：

- ① 孙崎即孙越崎，解放前为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 ② 清康熙时设博学宏词科，此处指科学院学部委员。翰老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誉所长，我亦侧居其一。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季羨林

今天，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认识翰老将近半个世纪，我们在许多场合，在社会活动、国际活动中，都在一起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朋友，实际上，在我的心中我始终认为翰老是我的老师。通常我们中国人评论一个人物，跟欧洲人的标准稍有不同。我们讲道德文章，把道德放在前面，把文章放在后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跟欧洲人不大一样。翰老的文章我不敢说，现在我只讲翰老的道德，我不能讲全面，只讲一件事。像我们这批较年老的人，最重要的是看他青年是什么态度。我们的事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接后人。我们的事业要前进，必须要有继承人，有后来人。我们对年轻人是什么态度，至关重要。翰老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只举一件事，譬如教英文。翰老那么大的年龄，每天忙着教英文，到翰老那里学英文的不下几百人。毛泽东同志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专门利人这句话很容易讲，可是一个人能达到这个境界非常不容易，从翰老这件小事来看，完全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培养我们的后一代，希望能接我们老一代的班，使社会向前发展，这件事非常简单。翰老无所图，只希望把所掌握的知识完全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从大的方面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很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翰老百岁华诞，一个人百岁很难。北京大学确实出百岁老人，我们的马老即马寅初先生是百岁老人，还有一个是我的老师文特，美国人，地地道道活了一百岁。翰老原来是北大教授，也是一百岁。现在一百岁是起点，下一步要做茶寿，即一百零八岁。我们讲老年人要健康长寿，光长寿还不够，还要健康。翰老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很精神。我们希望并祝贺翰老活得更长寿，对我们国家，对培养青年，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要永远向您学习。



伴岁月踏歌而行

——贺陈翰笙教授期颐大寿

张 文 秋

1997年注定蕴育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料峭的仲春，我们翘首迎来了翰老期颐寿辰。春机暗露，百花待育，在这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日子里，作为翰老亲密的老战友，我衷心地祝福他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如歌岁月。翰老以其无暇的人品，崇高的革命风范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谱写了一曲铿锵激昂、隽永悠扬的岁月之歌。

我同翰老相识在30年代初。当时，我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担任联络处的处长兼机要秘书。有一天，中央联络部的秘书长张方文同志把我领到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一栋高大华丽的洋楼里。在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里，张方文介绍我认识了房子的主人——风度潇洒，仪表堂堂的陈翰笙先生和他美貌端庄、聪慧机智的夫人——顾淑型。原来，美国《法兰克福报》总编辑史沫特莱听了董秋斯的介绍，对我的革命经历很感兴趣，也很敬佩，想把我的历史全部写出来，让人们了解中国妇女在革命道路上是怎样英勇奋斗的，并请了顾淑型女士作翻译。经过周恩来同志的批准和帮助，在翰老家中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记共产党员单菲》一文。这期间，翰老不但协助了翻译工作，每天还要自己照料生活，顿顿吃两片面包，一碗西红柿、土豆、圆白菜烩成的



“红菜汤”。这段俭朴的生活让我记忆犹新。

火热的心肠，坚定的立场以及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相互印映，充分展示了翰老无产阶级革命学者的伟大风范。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翰老每每夜幕初降便请年轻朋友搀扶着，从东华门书房徒步到天安门广场，听取追悼周总理的诗歌，听取群众自发声讨社会法西斯的檄文。他不顾“四人帮”的禁令，置身于拯救祖国的行列。

“四人帮”横行期间，翰老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打击迫害，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受尽了折磨。致使翰老眼疾加重。他的妹妹陈素雅见他眼病如此严重，急得直哭，可翰老却风趣地笑着说：“哭什么？不要哭嘛！青光眼、白内障，我现在是‘一清二白’，多么光彩呀！”

他刚从乡下回到北京，住在故宫东门外东华门大街的一所破旧的四合院，就设帐授徒，为还戴着“黑帮帽子”的高干子女义务教学外语，“有教无类”，无私无畏。当时，我的三女儿少林刚刚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不久，正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就在翰老那里补习英语口语。翰老每晚上课从练词造句开始，循循善诱，耐心讲解，用的教材是他从当时各类报刊上选下的时事政治性文章。他借助资本主义民主，委婉宣传社会主义应有的新民主。

人说，若要不被世人遗忘，要么写出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做些值得人写的事情。两者，翰老都做到。

以教授、学者之称蜚声海内外的翰老，构思了一二十年，于90年代初期，主编出版了三四百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补充了华工出国的血泪史料，为《资本论》那一章增加了一个注释；他曾组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揭示了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为中国经济理论界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流亡印度期间，他为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区域划分作了大量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创作了英文专著《印度巴基斯坦经济区



域》，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也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区域作出了示范。

解放后，翰老淡泊名位，先后辞谢了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之职，潜心研究工作，同时仍然参加一些人民福利工作。1990年8月，他发起召开“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他亲自主持召开“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他亲临“中日企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7月，翰老还常接待外宾，从不言老。

岁月如歌。婉转而舒缓的时光旋律中，一位睿智而慈祥的老人正踏歌而行。我谨以此文献给我亲密的老战友，并赋诗一首庆贺他期颐寿辰，祝福他踏歌的步履更加稳健，祝愿我们能携手共睹祖国日益繁荣和昌盛！

翰老足迹遍中外，胸中藏有文笔锋。
大胆开拓新世界，巨笔一挥五洲红。
侠骨雄心冲北斗，气吞山河贯长虹。
喜逢百岁期颐日，四季长青不老松。



当代理论工作的楷模

秦柳方

今年是陈翰笙同志华诞，又是他从事学术研究75周年，今天我们在此向他谨致热烈而诚挚的祝贺！

翰老早年留学美国、德国，专攻历史科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深受学生的欢迎。

1928年，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在莫斯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一书，提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自西方资本主义传入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就是资本主义农村。翰老与之讨论，不同意马季亚尔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在讨论中感到缺乏有力的材料说服对方，萌生了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调查的想法。

1929年，翰老在中央研究院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蔡元培兼），主持社会学组，就计划进行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成立了调查团，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选定的无锡县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花了三个月时间进行挨户调查。当时，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工作。次年，又在河北保定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1933年至1934年，又组织了广东农村经济调查，以及山东、安徽、河南烟叶产区的农村经济调查；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说明农村土地所有权相当集中，占村户9.9%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的63.8%，占村户90.1%的中农和贫雇农，只占有耕地的36.2%。广大农民深受地租、税捐、高利贷和雇佣劳动的剥削，生产停滞，再加外国商品倾销，中国产品出口萎缩，中国农村经济更趋衰落。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7月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理论界却众说纷纭。

1933年，翰老集结研究农村经济专家和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的主要成员，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选为理事长，一直领导这个研究会的工作。次年，在沪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同志主编。该刊登载有关农村经济专论和农村通讯；报道农村经济实况，还进行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因为有了上述几次农村经济调查提供的重要数据，在许多同志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些数据，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深入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理论，在学术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就翰老主持的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及《中国农村》月刊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是“论证了改革封建制度必要性，为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是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发起和推动的，在大后方和延安、山东等解放区广泛建立了工业生产合作社，救济失业工人，产品供应军需民用，支持抗战。1939年，翰老在香港与宋庆龄、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发起建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部分捐款直接拨交解放区和路易·艾黎主持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部分拨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支持大后方的工业合作社，先后募得款项有500万美元。



香港沦陷，翰老转到桂林，建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并主持工合研究所。

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活动，翰老担任名誉顾问。1987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重建，翰老任副主席。他经常对两会工作提建议，对工合的对外宣传和联络，以及协会现有工合事业，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翰老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与李大钊密切交往，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北京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腐败政府，经常上街游行，翰老积极参加学生的游行活动。北大学生南下请愿，他到车站送行。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在党领导下进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翰老和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游行，“三·一八”惨案中军警开枪，他及时扑地，受到学生保护，幸免于难。

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为第三国际在柏林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就国内形势和重大事件撰写了几十篇英文通讯，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形势险恶，他曾去莫斯科，任共产国际筹备的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

1928年至1932年翰老在上海期间，曾积极协助国际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1935年，翰老再次去莫斯科，在东方劳动大学任研究员，并与党中央派在那里的同志交往很多。

他在香港期间，曾积极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向国外宣传，募集款项，支持抗战。还与胡愈之等创办《远东通讯》，及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香港沦陷，翰老转到桂林，继续从事文化和对外宣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重庆方面密电桂林西南行营逮捕他。经李济深托人转告，国际友人协助，搭乘军用飞机到印度，在那里从事印度区域经济的研究。



抗战胜利以后，翰老去美国，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在美期间，受周恩来、廖承志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顾问，与进步人士交往。当时冯玉祥将军在美进行反蒋反内战活动，翰老曾为他出主意，如何用恰当的方式促使美方改变助蒋援华的方针以及反对外国报刊杂志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1951年翰老回国后，辞谢行政工作，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并做了许多民间外交工作。

翰老极度关心教育事业，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经常就教育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从“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因有闲余时间，教授干部子弟（包括少奇同志的子女）补习英语，不少青年经他指导有了升学和出国学习的机会。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坚持这项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在75年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史学、社会学研究中，坚持革命，坚持以马克思为指导，他的许多理论著作，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满爱国主义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的学术宝库。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是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楷模，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敬祝翰老健康长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续作出贡献！



他的事迹是一座丰碑

薛葆鼎

为革命事业、为教育事业、为学术研究、为国际活动，奔忙了70多年的陈翰笙教授，在1996年春节联欢期间欢度了99岁诞辰，设家宴庆贺进入100岁高龄。

我们庆贺翰老健康长寿，更钦佩他的革命风范和道德文章。他的杰出事迹是一座丰碑。

一、他到老不忘童年时的母教。他的慈母用无锡土话告诉他：“为人要正派，勿要长一双势利眼——看见大佛得拜，看见小佛踢一脚——骨头要硬，心肠要热。”他一生身体力行。在“四人帮”横行的70年代，他在“五七”干校患严重的青光眼和高度的白内障，刚回到北京，便在家设帐授徒，为还戴着“黑帮帽子”的高干子女义务教学外语，“有教无类”、无私无畏。每晚上课练习造句，用的教材是他自编的《英美时文选读》，借助资本主义的民主，委婉宣传社会主义该有真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每乘夜幕初降，便请年轻朋友搀扶着，从东华门书房徒步到天安门广场，听取追悼周总理的诗歌，听取群众自发声讨社会法西斯的檄文。不顾“四人帮”的禁令，置身于拯救祖国的行列，可见他已赋予了七八十年前的母教——“硬骨头”和“热心肠”，以革命精神和新内容。



二、他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补充了华工出国的血泪史料，也可以说为《资本论》那一章增加了一个注释。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他熟读了轻易借不到的德文版《资本论》。从马克思花40年写出原稿、恩格斯续成第三卷的这部经典著作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年活动中，他联系过去中国任凭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观察了150年来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和不幸遭遇，构思了一二十年，90年代初期，他双目将近失明了，才抢时间主编出版了三四百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史料揭示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完成原始积累过程中，诱骗、贩运、奴役、残害华工的血淋淋史实。《资本论》斥责了资本主义抢掠、贩运、奴役、残害“黑奴”开发新大陆的暴行；这份史料则记录了参加开发南北美洲等地的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被称作“猪仔”的“黄奴”。

三、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付之革命实践。在北京大学任历史系兼法律系教授时，他得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指引，先为共产国际写中国通讯，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封建暴虐；以后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看准了真理所在便刻意追求。他追随李大钊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三一八”惨案的当天，他在军阀的枪林弹雨下，幸免于难。李大钊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那几天，他多次亲去探望恳谈。李大钊遇难，他处境险恶，被迫流亡国外。90年代，他把生平档案捐赠给李大钊为首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为寄托缅怀李大钊烈士相知的深情。

四、他组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揭示了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是在北京大学时期，他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蔡和森在北京郊外彻夜深谈，明确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其后在共产国际遇上了马季亚尔武断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更激发了他科学探索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革命任务关系的依据。1929—1935年，他得到国民党左派元老蔡元培的支持，利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选择



了对全国农村有代表性的地方，如江苏的无锡、河北的保定、广东的番禺等十来个县，以及许昌、凤阳、潍县三个烟草产地，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从土地革命开始。这正符合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后转移主力下乡搞农民运动，从事土地革命正确的战略路线。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他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其中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有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孙晓村、张锡昌、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们后来都为新中国经济理论界作出了杰出贡献。1933年，他以这批人为骨干，组成了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多年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薛暮桥为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针对托派鼓吹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国民党渲染中国农村已在复兴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激烈论战，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还用事实和资料驳倒了共产国际中马季亚尔的错误论调。三四十年代，刘少奇在华中局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陈翰笙多年在国外发表中国农村经济的许多英文论著，这个研究会的实际影响还渗透到日本与欧美的学术界中。

五、他多年协助宋庆龄为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遗志所从事的进步活动。1927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号召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就在这时，陈翰笙结识了宋庆龄。1929年在上海，他奔走营救遭蒋介石反动派逮捕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邓演达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等革命志士。在邓演达、杨杏佛遇害后，他被迫流亡日本。1939年5月他专程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合运动”和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为了抵制蒋介石、孔祥熙在国民党统治区滥用“工合”捐款，他和斯诺、艾黎等专门组织了“工合国际委员会”，亲自担任执行秘书，用了两年多时间把华侨和国际友人募捐来的



2000 万美元直接交廖承志，通过上海银行汇往延安由李富春签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元还未贬值，2000 万美元是个不小的数字。1941 年 1 月，通过宋庆龄支持他创办的英文《远东通讯》，及时将“皖南事变”真相公诸于众。国际进步舆论的抨击，迫使蒋政府不敢再扩大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陈毅为代军长重建新四军时，他又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敞开所有在香港的仓库大门，取出大批重要物资输送苏北支持重建新四军。

六、他在流亡印度期间，为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区域划分作了大量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香港沦陷后，他转到桂林参加民主运动。1944 年 3 月，李济深通过陈此生透露重庆蒋政府密电桂林军委会办事处缉捕他的消息。在英国朋友帮助下，他从桂林经昆明流亡印度。在德里大学作评卷员兼英国远东情报局译员时，他冒着四十几度的热带酷暑，埋头于英军低矮的军用棚营房内查阅并摘记了“英国皇家学会”考察印度全境的 14 卷档案，又利用印度史学会的条件，对喜马拉雅以南和印度东、南、西部沿海的全境进行了实地考察。一年后，他在美国西雅图写成了英文专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他创造性地按地形、水利、农作物、耕作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 5 项标准，划分南亚次大陆为 21 个经济区域。他指出科学的方法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区域来从事南亚次大陆的经济治理。195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书的汉译本，80 年代德里大学再次出版了附有巨幅地图的该书英文本，国际学术界至今仍认为这部书富有学术价值。这是他流亡生活中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区域作出了示范。

七、他三次到美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了民间外交式的国际活动。第一次是 1915—1922 年，他先后在美国赫门工读学校、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求学。1922 年，他和查良钊、段锡朋、罗家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代表，劝告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不要在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九国公约》上签字，但北洋政府最后还是授权顾维钧签



了字，暴露了军阀官僚投靠帝国主义的卑劣面目。第二次1936—1939年，他到纽约协助欧文·拉铁摩尔编辑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并使这个标榜不问政治的学术刊物，有了一定的进步气息。在此期间，他协助饶漱石创办了《华侨日报》，使美国华侨社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具；还协助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这三位进步记者组织写作，使美国报刊上出现了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专稿。1938年初，他应太平洋关系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走遍加拿大十几座大城市，用英语介绍“西安事变”真相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影响及于美国舆论。第三次是1946年—1950年，他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琼斯·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费城宾州大学、纽约亚洲研究所，担任特聘教授、特约研究员等。蒋介石反共内战一打响，他便回到母校波莫纳大学作了四个星期的系列性演说，分析中国封建法西斯的官僚资本统治与反共内战直接相关的必然性。又到美国许多大城市，宣传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学生运动与民主革命，指出它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对谱写新中国历史具有现实意义。不久，他受周恩来、廖承志委托，任“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顾问，并与美共主席福斯特、常务秘书杰姆斯·艾伦保持着联系；他又通过斯诺等进步记者和“美国争取民主远东政策”等进步团体对美国报刊施加影响。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1979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访美代表团遗憾地说，美国之所以丧失了在华势力，与陈翰笙教授当年所做的工作不无关系。

1947年5月到1948年8月，冯玉祥在美国从事反美扶蒋活动引起国际轰动。1947年初冬，冯听说美国国会将通过6000万美元紧急援蒋法案，急得他想效法中国古代“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亲临国会门口散发传单劝告议员不要再援蒋打内战。陈翰笙夫妇请冯夫妇吃饭，有条有理地向他们解释这样做很不合适。指出美国历史短，不会有人懂什么“哭秦庭”的故事；这样做也很危险，易于授人以隙，让美蒋特务搞人身袭击。不如改为向到过中国的



马歇尔国务卿先作礼节性拜访，再在华盛顿举行公开招待会，向美国上层社会著名人士及重要报刊记者宣传援蒋打内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是使中国老弱妇孺多受战祸灾难。冯照他的意见办了，公开招待会惊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邀请冯到国会作证。冯出席作证了两个多小时，使该会表决时把6000万美元紧急援蒋拨款削减为1800万美元。1948年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又试探冯玉祥“联美反蒋”，引诱冯只要答应同美国“合作”，“另组一股民主力量”，就可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火有军火”。冯同“小民革”在美成员和“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委员会”商量，采纳陈翰笙的说法，严词拒绝了“外国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事后，冯对杨刚说：“他一个白面书生，却是张良（张子房）式运筹决策、决胜于千里之外”。于是冯亲自画了一幅引吭高啼的大公鸡向陈翰笙教授致谢。后来到纽约的王昆仑听到后说：“蒋介石在紫金山听说美援大打折扣，只好跳脚。而冯玉祥不上美帝说客的当，无疑是对的。”

八、解放后他不求名位，专心做研究工作，同时仍然参加一些人民外交工作。1950年他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绕道欧洲回国。一向周总理辞谢当外交部副部长；二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辞谢当北京大学副校长。因为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他多次出国做人民外交工作；因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多次到各省视察。而学术性职务，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以及七八个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只要学科相近，他无不欣然就任。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大会”；1994年北京大學举行“陈翰笙教授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庆祝会”；1989年他出任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1990年8月，他发起召开“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10月，他亲临“中日企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他98岁高龄了，还常接待外宾，从不言老。



他的著作言简意赅，十分丰富。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40万字的《陈翰笙文集》；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他出版了18万字自传体的《四个时代的我》；1996年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将出版他解放前100多篇英文论著选编。然而要汇齐他那诸多笔名和化名而散见在国内外许多出版物的短篇是十分不容易的；我想这是“有心专门研究的人仍须继续努力的”。

九、预见与夙愿。1933年1月，他在上海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葬送了东北，还在向日本侵略者屈膝不抵抗，而倾全力打反共内战，国势危急。他预言中国可能灭亡，也可能半个中国沦亡，然而更可能不出20年会完全独立，他寄希望于受围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会杀出血路，多难兴邦。果然新中国在16年后站立起来了。1946年冬，他在纽约就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那时蒋介石反动派正在美军支援下向解放区重点进攻；而且他说：“人民政权当权了，将保证中国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途。”他又说：“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心做点学术研究工作，一偿夙愿。”

这里可见到他惊人的预见能力，也可见到他以学术研究作为一生追求的夙愿。

再过五年，便是21世纪。祝愿他从19世纪末出生而进入21世纪初，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跨三个世纪的“人瑞”，同全国人民一道去迎接更为灿烂辉煌的未来！



一身正气 淡泊名利

张彦

周谷城先生在为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陈翰笙的《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味而又令人信服、很好的参考读物。”这因为，陈翰笙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四个时代：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且，他一生所作犹如一座丰碑的贡献，与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现任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1897年2月5日出生在江苏无锡，他即将成为罕见的百岁老人。

早在20年代，陈翰笙已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精通英、德、俄等多种外国语言，先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27岁即被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该校历史系教授，成为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教授。他的专著和论文，分别收藏于美国197所大学。他的中、英、德文著作约300种，主要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华工和华侨的历史问题，以及对不同时期的国际经济、政治问题的精辟分析。他所有的学术活动，无不是为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服务，受到了很高的评价。1985年，为庆祝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举行大会，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了40万字的中文《陈翰笙文集》。1994年，为纪念陈翰笙“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北京大学曾召开专门座谈会。为了庆祝陈翰笙的百岁华诞，他的学生早在一年前即已从海内外收集并整理了他的大量英文论著《陈翰笙文集，1919—1949》（英文版）。

陈翰笙1915年远渡美国留学时，为的是想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来造福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外间的众多新事物引导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走去。他从学园艺，学地质，直到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学历史。实际上，他是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进入了必须根本改造中国面貌的思想境界。

1924—1927年，中国正处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时期。在这个时候从国外归来的陈翰笙，很自然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经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不顾个人危险，英勇地投入了反对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支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工人罢工，向国外发表文章揭露中国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恐怖事实。

1926年3月18日，北京数千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八国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政府的卖国行为。李大钊同志领导了这次活动，并亲自扛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陈翰笙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并沿途散发反帝传单。当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李大钊同志也受了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翰笙满怀愤怒写的一篇《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以后，引起了海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大关注。

白色恐怖的笼罩，迫使陈翰笙不得不流亡苏联，并转移到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开始认识到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再度回国以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农村调查。自1928年到1934年，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



收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终于得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他们明确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除土地改革外，没有别的出路”。

陈翰笙这时候所组织的这个研究会，会员多达五百余人，通过长期实践培养出一大批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像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杰出人物。当时，这些为数可观而又颇具影响的专家学者，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线，发挥很大威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翰笙活跃于美国、加拿大、香港和国内，坚持不懈地支持人民的英勇抗战，揭露任何妥协投降的言行。在香港，他与宋庆龄以及一些国际友人组建了“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向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募捐，将巨额捐款送到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是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通讯》上及时将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阴谋伏击的消息向国际上报道，激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释后，曾为此向陈翰笙当面致谢。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陈翰笙回到桂林，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他曾向外国记者披露蒋介石秘密逮捕廖承志同志的消息，配合何香凝和宋庆龄营救廖承志出狱。为此，何香凝还特意给陈翰笙画了一幅梅花以表达她的谢意。1942年11月，由于在桂林举办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注意，陈翰笙遭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下令通缉。于是，他不得不逃亡印度。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陈翰笙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于1946年第三次去美国工作。他奔走各地，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情谊。他当时所作的宣传工作，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他是十分有力的调查材料，让美国人能认识到：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中国最腐朽的势力，中



国的内战是人民民主力量反抗封建买办势力的斗争。他坦率地告诉美国人：“美国政府如果援蒋反共，就是走进了死胡同，就是以中国人民为敌！”他用英文演讲，用英文发表文章，很容易为美国人所接受，效果非常显著。

1951年1月31日，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一起，终于回到了他们俩长期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人民中国。为了欢迎他们的胜利归来，周恩来总理设宴为他们洗尘。周恩来当时兼外交部长，想请陈翰笙担任副部长，助他一臂之力。陈翰笙不想当官，但没有直接答复，却说：“总理，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从此，近半个世纪来，除了担任外交部顾问和参加一些人民外交活动以及三次被选为人大代表和一次担任政协委员外，陈翰笙如愿以偿，能够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主要献给了他心爱的学术研究、教育和新闻事业，其中包括他1952年受宋庆龄和周恩来委托一手创办起来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1990年改名《今日中国》）。

陈翰笙之所以婉言拒绝了周总理让他当副部长的盛情邀请，绝非偶然。也许应该说，这正反映了他的为人准则：一生奉献，淡泊名利。这不仅为他的前半生的事迹所证实，他历经坎坷的后半生更说明了问题。

虽然受的是部长级待遇，陈翰笙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布衣百姓。一次，他从广州返京到上海作短暂停留。一位报社记者很想趁此对他进行采访，但就是无法找到他的住处。到部长级干部常住的宾馆查询，回答都是：“查无此人”。几经周折，才在他妹妹非常简朴的住处找到了他。据说，每次到上海，下榻在这里的一张旧床，已经是他的老规矩了。实际上，解放后，陈翰笙这样一个位居外事工作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一所古老而破旧的四合院里，度过了20年春秋。

年逾古稀，陈翰笙依然亲自下去搞社会调查，而且拒绝任何



隆重接待。一次，他去在历史上以逃荒闻名的安徽凤阳县访问。一放下行李，就提出要到县委去汇报来此进行农村调查的打算。接待的人感到迷茫：“奇怪！哪有中央的大干部首先来向基层同志报到的？”他十分朴实，最反对官僚作风。他也极其严格，对于不正之风，当面批评，毫不留情。

但是，他对于好学上进的青年，则十分爱护。一个大学历史系学生写了篇学术论文，辗转托人送请陈翰笙审阅。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逐字逐句审读，认真批注。他还亲笔给他写信，对论文的标题、内容、引用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意见，并热情邀请这位青年学生来当面交谈。初次见面，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有关资料作了详尽介绍。这不过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个，经过他培育出来的年轻学者已难以数计，不少已颇有成就。

无论是治学和为人，陈翰笙都一向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并不是单纯依靠阅读文件，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大跃进”时代的各种“放卫星”的头条新闻，从来没有打动过他。相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一直对所谓“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一些亲朋好友都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他的经济学界老朋友，怕他惹来横祸，有意识地常来给他介绍一些经济如何发展的“正面新闻”。他说：“我不要听，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像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陈翰笙当然也不可能幸免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十年浩劫中，他这样一位一生献身革命的老干部竟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审讯和虐待。与他共同奋斗终身的夫人亦因此含冤去世。但是，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让他低头折腰，更不能丝毫改变他的“硬骨头”精神。红卫兵打他揍他要他弯腰接受批斗，他就是不低头，宁愿一屁股坐在地上以示抗议。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倒行逆施，他毫不顾忌予以痛骂。

陈翰笙的刚直不阿和见义勇为，是从小就逐渐形成的。他到



老也忘不了童年时母亲用无锡话对他进行的家教：“为人要正派，勿要长一双势利眼——看见大佛得拜，看见小佛踢一脚——骨头要硬，心肠要热。”对此，他一生身体力行。在70年代“文革”期间，他因患严重眼病，不能继续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调回北京。他不忍看见一些青年失去学习机会，成天东游西逛，就自动在家里办起了外语学习班，义务辅导上门求教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和德语。来学习的年轻人中，有不少是当时被打倒的所谓“黑帮”的子女，其中就包括被打成“头号走资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孩子。好心的友人纷纷来规劝他，不要再惹麻烦了。陈翰笙却依然我行我素，来者不拒。他说：“我不怕。我想，我陈翰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免费收学生，总不犯法吧。刘少奇就是有问题的，他的儿女是无罪的。他们可以上工厂当工人，为什么不能到我这儿学习呢？我们是共产党国家，难道还搞封建株连、罪及妻孥那一套！？”十几年下来，在他这里学习过的已有200余人，有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也有过“不惑之年”的大学讲师、副教授，还有工人、厂长，甚至著名的演员。这些学生当中，不少已出国留学或者工作去了，至今他们还常给这位极不寻常的老师来信表示感激之情。

陈翰笙似乎一生都是只为工作，不求享受。即使到了90高龄，他给自己安排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每天分早、中、晚三班工作，甚至连节假日也不休息。为了让中国青年能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他主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从1979年以来他亲自审阅的书稿就达197册。他还担任《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主编，已经整理出版了300万字。他同时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自从眼睛开始失明，他不能不在别人帮助下看报、读书、写文章。1988年出版陈翰笙自传《四个时代的我》，就是在他的口述下，由任雪芳同志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本自传不同凡响，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让你兴趣盎然地跟踪他目睹了风云巨变的一个世纪，对于一生不示谗利、只讲奉



献的传主，不能不由衷地肃然起敬。

经陈翰笙筹备创办的《中国建设》，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本拥有多种文版对外介绍新中国颇有影响的杂志，销行世界各国。我就是50年代在这个杂志社与陈翰笙共事的，当时他是编委会的副主任，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为了欢庆陈翰老的百岁华诞，作为晚辈和老友，我不久前专程到这位令人无限敬仰的老人在北京西城的住所向他表示祝贺。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陈翰老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锃亮。除了两眼因患青光眼和白内障而近乎失明和老年人惯有的记忆力减退以外，他依然那么精神、健谈。而且，风趣不减当年，仍然喜欢不时来两句他特有的幽默或者讽刺。比如，我问到他的眼睛，他说：“我现在是最‘清白’了——青光眼加白内障。”当谈话涉及到某个共同的友人时，他脱口而出：“他文章写得很好，但就是怕得罪人！”心直口快，一如既往。

当时，作为杂志社的领导，他为编辑部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他约一个人去谈工作，那人晚去15分钟，只见门上贴着一张黄色纸条：“时间宝贵，恕不久候。”陈翰笙早已人去房空。此事传开，谁也不敢再迟到了。陈翰笙经常为杂志写一些重点文章，总是那么深入浅出容易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凡是答应写的稿子，从来都是提前交稿，而且字数绝不超过编辑计划的要求。他对别人的稿子同样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改了又改。他当年所树立的好风范，如今已成为这个杂志社人人都必须学习的优良传统。

在陈翰老朴素整洁的书斋里，谈古说今一个下午，我仿佛跟随着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重新回顾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兴衰奋斗的历程。在这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画卷中，陈翰笙传奇的一生，闪烁着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耀眼的光辉。看到百岁老人如此健康，不可抗拒地渴望了解他的长寿秘诀。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了在座的他的83岁的胞妹陈素雅，自1971年以来她一直陪伴着他。她的回答竟是：“要说‘秘诀’，除了生活绝对规律化以外，也许应



该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一生没有名利观念，从来不与人计较什么。他看不惯的事，就要发表意见，而且毫不留情。但是，讲完了也就算了，从不储存在心里憋气。”



一辈子做了好事

爱泼斯坦

我认识翰老已经是五十多年了，也可以算是翰老培养的青年。我知道翰老在中国的工作，在外国的工作；他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做过统战工作，国际宣传工作和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翰老是一辈子做了好事，没有做过自私的事，没有为了钱为了名去做什么事。我们最近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翰老的长征可以算是100年或70年，因为革命工作也是一个长征。我们现在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看翰老的工作，看翰老的一生，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国家。翰老的名誉在外国是很高的，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翰老和我说过不少事，我还记得。他说，个人主义不能要，但个性还是应该要的。我看翰老是很有个性一个人，他的个性不减少他对集体的功劳，而是更加上一份功劳。



社会各界人士的祝贺



庆祝陈翰笙教授百岁华诞

郝 斌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庆贺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及翰老曾经任教的北大历史系、法律系、国政系，向翰老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翰老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两年前的金秋十月，我们有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庆祝陈翰笙教授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纪念会”及翰老的生平展览，这次展览在我校青年学生以及老师中引起巨大反响，师生了解了翰老不平凡的一生，更增加了对翰老的敬重、景仰。我们也由此体会到翰老对北大怀有的深厚而真挚的感情。

北京大学是翰老学术生涯的起点。1924年陈翰老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当时正在欧洲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特地邀请他来北大任教。陈翰老接受了邀请，到北大开授欧洲通史、欧美史学史和美国宪法史，当时他只有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从此之后，翰老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治学，始终伴随着陈翰老，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始终伴随着翰老的治学研究。从下面一个事例，对翰老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可以略见一斑。在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如何分析和确认，曾是一个重大课题，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有托陈取消派，也有第三国际的一些人士，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



了很不符合实际的想法，而根据这种看法，会派生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界定，会影响到诸如革命的对象、动力、同盟军，以及革命的步骤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与第三国际有着组织关系的陈翰老，既不盲目听众他们的观点，也不妄发空论，而是脚踏实地，组织了一批人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事实从理论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对于历史问题，陈翰老认为不是为了写几本历史书去研究历史，而是应该使历史研究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有鉴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最迫切、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反帝反封建，他就集中力量从历史和现实方面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土地问题。他所进行的大量的农村调查，成为我国学术界从实地调查的先行和典范。翰老在学术上严谨的科学学风和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翰老也是在北大开始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1924—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逐步走向高潮，当时的北京大学集中了许多优秀人才和爱国进步人士，教师和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从国外回来的陈翰笙，在纷繁变化的形势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时间还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随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他参加了1925年“五卅惨案”北大学子的示威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1926年他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同志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使馆周围布满密探，陈翰笙不顾自己的安危，多次去看望李大钊同志。就是经过李大钊同志介绍，陈翰笙同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他为第三国际的刊物——《国际通讯》撰写了许多英文通讯稿，中国的革命动态通过他写的英文通讯稿，传播到海外。

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翰老冒着巨大的风险，以学者的身份进行革命政治活动。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70年如一日，虽然受过许多挫折和迫害，但始终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在革



命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翰老永远是“清流”，坚持不懈地同各种“浊流”做斗争。作为一名有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坚持信仰、坚定信念，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楷模。

翰老在他的晚年仍然同北京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翰老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精力旺盛。1978年，他重新走上北大的讲台，受聘担任国政系兼职教授，翰老对此感到高兴，北大也感到非常荣幸。翰老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学生们最高兴的是与翰老讨论问题，许多受教的学生至今谈起那段学习生活，对翰老怀念、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翰老不仅教他们作学问，更教他们做人，翰老的道德文章、言传身教使同学终生受益。

翰老与北大一直有着特殊的缘分，为了表示他最终归宿于北大，翰老将他的生平著述及珍藏的文献资料、实物捐赠给北大图书馆，这部分资料已经作为北京大学文库中的“名人文库”的一个专藏永久保存，这是翰老与北大特殊感情的象征，我们将始终珍视翰老对北大的这份感情。

最后，我再次代表北京大学祝翰老健康长寿！



对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和从事 学术活动75周年的祝词

无锡市人民政府 宗菊如

欣逢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我们谨代表家乡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陈翰笙同志少岁壮志，18岁即负笈西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学成归国后，曾积极协助李大钊同志从事革命活动，从“五卅”、“三·一八”到北伐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留下了光荣的足迹。在1929年以后的六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到无锡等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材料论证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转辗海内外，以其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陈翰笙同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忠实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广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发展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他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在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世界经济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建树的工作。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陈翰笙同志表现出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



革命真理的执着追求。在学术研究中，他那科学严谨的态度，深入踏实的作风，精研细究的精神，也深为人们称道。他以自己光荣的革命业绩、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崇高的品格风范，成为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同时也为我们家乡人民建设无锡、发展无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家乡人民为之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陈翰笙同志对家乡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时时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就在他将近90高龄之时，还不辞劳苦，亲临无锡参加经济发展研究会，为无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中肯、宝贵意见。对此，家乡人民是会永远铭记的。

值此百龄庆典之际，我们向陈翰笙表示崇高的敬意！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续作出可贵的贡献！



关于陈翰老早年的一篇论文

陈乐民

陈翰老是我国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和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一位奠基人。恰在祝贺翰老百岁华诞之际，我拿到了他青年时期在芝加哥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的英文打字稿。那是他近70年前的作品了。论文是对1912—1913年欧洲列强伦敦大使级会议的评述和分析。这次伦敦会议是列强分割阿尔巴尼亚的一次没有成果的谈判。文章的写法是小中见大，透视出的问题是战前巴尔干局势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奏形势的缩影。各有关大国的代表在会上的表演，这些国家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意图，它们的动作，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半岛内外问题的交织，以及当时欧洲舆论的反映，都囊括在这篇文章中了。这对于学欧史的我，看到前辈对那个时代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某种亲切感。

文章写成于1921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三年，战争的影子还很清晰地留在世人印象中，所谓“凡尔赛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巴尔干仍然是大国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个筹码。因此这篇论文属于本世纪初的当代史范围。历史是今天的镜子，时代固然不同了，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纵使再乱、再紧张，也不可能引发出类似的“世界大战”来；然而，这个半岛仍带着历史遗产，不断翻新着原有的矛盾和问题，以致谁也看不到了结的可能和前景。因此，70年前描述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并不显得生疏和遥



远。“巴尔干”这个人人都熟悉的名词，哪一天才能给人一个新的印象呢？欧洲的中古史、近代史，20世纪的世界史，从来绕不过它。

在巴尔干这座以二河（萨瓦河和多瑙河）六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亚德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为界的半岛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有几股势力绞在一起；多种民族的、宗教的、领土的矛盾和冲突，无日无之，一发必动全身。更重要的，使这本身已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加尖锐激烈，并推向白热化的，是列强在这里的利益争夺；正如翰老文章所说的，“每一大国都或多或少地在巴尔干半岛有自己的经济或战略利益”。翰老在“巴尔干半岛”后面特意加了一个“同位语”：“走向近东和远东的通道”。

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非常清楚，嵌在欧、亚、非交汇点的巴尔干在欧洲全局中具有怎样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和地缘的价值。于是巴尔干便这样背上了过重的压力。在这里，集中了泛土耳其、泛希腊、泛斯拉夫、泛日耳曼几股思潮；塞尔维亚、希腊、奥匈、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等等诸多势力胶织一处；希腊后面站着法国，塞尔维亚后面站着俄国，在这一团乱麻后面则站着英国。作为伦敦会议盘中物的小小的、分裂的、毫无权利的阿尔巴尼亚，竟成了一夫当关的巴尔干咽喉要塞，这里直接牵动着亚德里亚海，牵动着整个巴尔干的政治神经。文章再次画龙点睛：

“在阿尔巴尼亚的争斗中，其意义全然不在阿尔巴尼亚；它只不过是列强争夺近东的占有权，并导向远东通道的大规模斗争的一部分而已。”

当时欧洲列强的频繁外交活动，可谓治丝而棼；大到较远的1878年柏林会议，小到这次伦敦大使级会议，翰老均一针见血地讽之为“江湖郎中”式的会议，对患者的病灶不仅毫无疗效，而且在药膏的覆盖下让它变本加厉地化脓、感染、溃烂。巴尔干半岛只是大国赛场上的一个“足球”，不管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



无非是为了“大国的自私利益”，对此，“欧洲大国是从来没有节制的”。那时，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已经爆发，“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对垒之势已经形成，整个欧洲正急促地滚向战争深渊。在如此千钧一发的当中开个伦敦会议，也确实只能充当“江湖郎中”的角色了。

文章写的已是历史事实，分析和断语也早已为历史所验证。文章观点之鲜明、犀利，已显见翰老在青年时期的史才、史识和观察现势的敏感。

今天的巴尔干依然不安定，历史不会原样不动地再现，然而，抚今追昔，今天却常可见历史的投影。

另外，从这篇论文，还足可见翰老已在学生时期即十分讲究学术研究的规范化。言而有据，是作史的第一要义。翰老此文引述都有出处，无一语无来历，所作评论性断语，均持之有故，所以推论既自然、严谨而又可信。这种严谨认真的学风，是可为我辈学人效法的。

还记得早在50年代，陈翰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我那时还很年轻，有幸与翰老分在同一个小组委员会里，翰老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原由我作翻译，但我水平太低，翰老就直接用英文主持了。几十年过去了，翰老当时的风采宛在目前。

翰老世纪学人，其人品，其学养，素为我辈深深仰慕敬佩。捧读翰老旧文之余，草成此读后感，借贺翰老百岁华诞，并祝翰老健康长寿。



陈翰笙早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

史建霞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第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值革命高潮起点之时的1924年4月，陈翰笙与夫人顾淑型应邀由欧洲回国。陈翰笙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只有27岁，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主讲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兼教北京大学法学系美国宪法史课程；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他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洪流。

当时的北京，虽然仍是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中心，但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如：要求承认苏联，恢复中苏邦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声援“五卅”运动；要求关税自主；“首都革命”；“三·一八”斗争；支援北伐战争等等。具有反帝反封建优良传统的北京大学一次又一次地卷起了革命的浪潮。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北京大学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沙滩红楼（北大第一院），成为党的北方区委和北京党组织指挥革命工作的中心活动地点之一。这里有党的联系机关，有党的刊物《政治生活》的发行机构，还有几间教室成为党团支部秘密开会的场所。党的负责人赵世炎、陈乔年、黄日葵、范鸿吉等人，都住



在沙滩附近的北大宿舍或公寓，他们以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旁听生的身份做掩护，开辟工作。北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已有30多名地下党员，党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群众性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学生会的主要干部多数是党团员。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许多进步师生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组织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大学的师生中呈现出一派热烈的革命气氛。

陈翰笙刚从国外回来，面对周围的革命气氛，积极参加了校内的各项进步活动。同时认真备课，完成教学任务，还举办欧美通史选修课程的讲座。为了让同学们选修课程参考，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写文章，介绍欧美通史的梗概，“欧美通史分四段：自有人类至有记载，三十万年为太古。自有记载迄纪元后三百年，其间六千年为上古。自三百年迄一千五百年其间一千二百年为中古。其后四百二十五年为近代。”^①他在介绍讲演的课程安排时写到“讲演时间任凭题目范围与史料选择为均平之支配。”^②该文还讲了欧美通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这些对选修课的同学起到很大的帮助。因陈翰笙知识广博，平易近人，任课不久，吸引不少爱学习、喜钻研的同学，他们便成为很要好的师生朋友。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等学校于1924年7月21日派代表向政府交涉，反对政府侵吞各国“退还”的用于教育事业的“庚子赔款”的活动。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陈翰笙结识了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受其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翰笙十分敬佩李大钊的为人。当时李大钊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工作任务很多，十分繁忙。陈翰笙见到李大钊一次很不容易，但遇到事情他总是想方设法找到李大钊。李大钊每次都热情地帮助他分析事因、出主意，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嘱咐陈翰笙要读《资本论》，学习有关十月革命历史的著述。陈翰笙读了这些书籍后，写了一篇“俄国历史的研究”，发表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四卷上。



陈翰笙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错，就与高仁山一起找到李大钊，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大钊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⑧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陈翰笙于1925年春季加入国民党。从此以后，陈翰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共产党人同心协力，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当时军阀政府竭力摧残教育事业，竟至企图侵吞用于教育费用的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加上反动军阀连年忙于发动内战抢夺地盘，根本无视学术的教育事业，致使学校的经费积欠十分严重，据1924年6月18日《晨报》的报道：“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经费，每月不过十七万余元。年来政府未能按期照数发给，及今积欠已阅十月。学校本身与教职员个人，均已无法维持，校务与教务，也大半停顿，水尽山穷，奄奄一息。”面对教育界的惨状，陈翰笙用实际行动来办教育。1925年春，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他与高仁山、薛培元、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72号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第二十八中学），高仁山任校长，陈翰笙任校董事，其夫人顾淑型任教务长。艺文中学的办学宗旨是：适合中国现代化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艺文中学一反中国学校传统的灌注式教学方法，而采用美国人创制的道尔顿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强调培养学生能有计划、主动学习，以讨论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该校创办后，由于校长、教员作风民主，校内革命气氛很好。师生之间关系融洽。畅所欲言，经常共同交流思想，研究学业。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一些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往共产主义，主张革命，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三·一八”斗争中，该校教务长兼英文老师顾淑型抢拍下珍贵的历史镜头，两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艺文中学为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不少的人才。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在光天



化日之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英租界巡捕房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浪潮从黄埔江畔涌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掀起了浩大的援助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运动。

6月2日，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会立即向全国通电抗议，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学生，收回英、日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决定6月3日开始罢课，联合北京各校举行反帝大示威，并号召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监督政府对英、日帝国主义提出严重交涉。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沪案雪耻会”、“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讲演团，分赴各区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北大教职员在声援“五卅”事件中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每次都与学生一起参加各项活动，还多次致函执政府，要求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国人，立即派兵接收上海、汉口等地的英租界，解除在华的英、日军队武装，并断绝外交关系。还捐赠1万元汇给上海工作。陈翰笙每次都积极参加活动，“还常常扛着大旗走在前面”^⑥陈翰笙、余文、高仁山等教授发起组织“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他负责后援会文书股工作，主要任务是与各报馆接洽及发表文件，收集新闻等。6月15日，陈翰笙、李四光、高仁山、马寅初等45名国立各校教职员签名致各校校长函，正式建议将政府拨给各校积欠教育经费150万元中提出10万元援助上海工作。陈翰笙还多次与北京大学教授们一起，向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方面发表宣言、通电，阐述解决沪案的严正立场。声援上海的“五卅”斗争持续了3个多月，陈翰笙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五卅”运动后，李大钊派他到上海去策划租界里印度巡捕罢工。当时准备30万元策划罢工的费用。陈翰笙到上海与李立三、陈云两同志接洽后，经过调查联系，两个月罢工开支起码要70万元，费用不够。加上其它原因，使此次计划未能实现。陈翰笙由上海回到北京，正赶上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



法、日等军方列强在北京召开关税会议，讨论制定税率和我国关税自主的问题。段祺瑞执政府的这一卖国行动为导火线，北京爆发了以收回关税自主为目的的群众运动。陈翰笙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并与北京各校50多位教授发起组织了“关税自主”促成会。促成会曾多次发宣言，阐述为什么反对段祺瑞的这次会议，为什么要求关税自主，如北大教职员对于关税问题第二次宣言中指出：“任何中国人想利用机会和帝国主义勾结去攫取税收，那是我们绝对反对的。不消说得，在这个时机中任何中国人胆敢压制国民的关税自主运动，更是我们不能容忍的。”^⑧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北京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军阀统治。段祺瑞执政府首先对学生运动下了毒手。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陈翰笙与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负责贴标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反动军阀对请愿队伍开了枪，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对北京惨案极为关注，3月20日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段祺瑞政府的罪行。各界人士纷纷谴责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段祺瑞执政府颠倒黑白，掩盖罪行，19日竟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陈翰笙面对残酷的现实，用手中的笔，写下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此文详细记述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经过，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政府的残暴，文章的开头写到：“此实中华民国空前的惨案。我亲临其地，适逢其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应将当日目击的真相为读者作一简单的报告。”^⑨此文阐明了陈翰笙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鲜明立场，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发布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通缉令。面对白色恐怖，李大钊等北京共产党人把同志们疏散或隐蔽。而李大钊本人因工作需要留在北京坚持战斗，为了避免敌人迫害，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此处是使馆区，军警不能随便进去抓人，但被严密监视。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着几辆人力车，那些车夫都是密探化装的，他们跟踪进出大使馆的人。在白色恐怖下，北京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方面舆论严厉谴责段祺瑞政府的罪行。4月10日驻北京的国民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赶走了段祺瑞。但是五天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逼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从此，北京完全处于奉系军阀野蛮残酷的统治之下。5月1日，张作霖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怀庆即发布条令，宣称对“宣传赤化，宣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北方的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纷纷脱离和疏远了革命组织。而陈翰笙此时更是积极为革命事业而奔走，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苏联大使馆去看望李大钊，帮助李大钊完成特殊任务。此时经李大钊介绍，陈翰笙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又将陈翰笙介绍给大使馆文化参赞坎托诺维奇及北京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格里涅维奇送《资本论》与陈翰笙。陈翰笙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认真学习，最后都能做到哪一章哪一页，甚至哪一页讲什么都能背下来。有不懂的问题，晚上就找格里涅维奇请教、讨论，有时为弄清问题讨论到深夜就住在格处。通过《资本论》的学习，使陈翰笙的思想发生极大变化。正如自己所说：“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了《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①



陈翰笙与坎托诺维奇的交往中，详细地了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并经李大钊和加拉罕大使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在柏林有了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周刊），它主要刊载共产国际的文献和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各国政治经济述评，陈翰笙为其投稿。陈翰笙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围绕着“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国内大事，写了十几篇文章寄给《国际通讯》。这些稿子为共产国际了解当时中国问题提供了依据，同时，中国革命的动态通过他的英文通讯，传播到海外。

1926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英帝国主义分子乘机挑衅，冲入华界，当场刺死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为了惩治英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1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急需懂外语、能做外交工作的人才。陈翰笙应陈友仁之邀，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当顾问。陈翰笙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控制，由北京出发绕道天津、上海到汉口。陈翰笙到任后就同英国政府交涉。经过一番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2月19日与武汉政府签订汉（汉口）、浔（九江）等协定，正式承认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事宜无条件交还中国管理。在这场斗争中，陈翰笙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陈翰笙到汉口仅半个月时间，就接到李大钊由北京来的急电，要陈立即返回北京。陈翰笙接到急电，请假谎称母病于1927年2月抵达北京，立即面见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内，李大钊向陈翰笙介绍了北京的变化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险恶形势，并一再嘱咐陈翰笙不要暴露自己，隐蔽好。在这段时间，陈翰笙帮助李大钊办事、联络，直到李大钊被捕的前两天4月4日，陈翰笙还到东交民巷去看望李大钊，这次会面竟成了永诀。4月6日，李大钊被捕，陈翰笙的处境十分危险，后经一日本朋友的帮助，他离京到天津，取道日本，再转赴苏联莫斯科，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陈翰笙走后不久，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十几位革命战友，被张作霖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翰笙跟随李大钊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和考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时陈翰笙不光是革命者，还是位学者，其特点是坚持在战斗中做学问，用自身的优势在各个领域中与敌人进行战斗。陈翰笙在北京近三年的时间内，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兼《现代评论》的编辑工作，办私立艺文中学。在没有安静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在政治动荡、战事激烈的环境中，他把战斗与学术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何等的毅力。据不完全统计，陈翰笙在北京的时间中，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53篇文章^①；在《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卷上发表“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我国历史的研究”等四篇；1926年7月《救国日报》登载的“东北抗日最近情形”等文章，共计58篇，不包括写给第三国际《国际通讯》的十几篇文章，为我国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留下珍贵的史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 ①《北京大学月刊》1924年12月20日。
- ②当时任北大教育系副主任。
- ③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33页。
- ④同上书。
- ⑤《北京大学月刊》，1925年11月13日。
- ⑥《陈翰笙文集》，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47页。
- ⑦《四个时代的我》，第34页。
- ⑧《四个时代的我》，第165页有目录。



陈翰笙教授和他的中国 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从 翰 香

今天，我们社会科学界这么多同志欢聚一堂，为陈翰笙教授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举行庆贺大会，我和大家一样，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是一个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工作者，在我和我熟识的一辈人心中，陈翰笙教授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社会科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大家敬重的师长。先生七八十年来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培养和影响着几代人。先生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我这里仅就他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一点粗浅看法。

首先，我认为有关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成果是陈翰笙教授学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生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先生一生的研究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村经济。192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撰写了题为《中国出口通商与茶叶贸易关系》的论文。1927年，他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所工作期间，目睹了当年在苏联的一批学者，引用马列经典著作的片言



只语，对农村问题争论不休的状况，由此，他开始领悟到研究农民问题，不能光靠经典著作，只有做农村调查才是出路。1928年，他刚回到中国，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同年，他应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1933年他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该会理事长，会员500余人。从1928年开始，到1936年他去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工作为止，在这七八年时间里，陈翰笙教授正是依靠中研院社科所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两块阵地，积极发起和推动了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并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团结和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工作者。在这七八年里，他和他的学生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北到黑龙江，南抵广东，中部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江苏、浙江，华北有河北。其中，浙江杭嘉湖（1928年调查），江苏无锡（1929年调查），河北保定（1930年调查），广东番禺（1933—1934年调查）等都是在全国农村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他们去调查过的村庄和农户数以千百计，仅无锡、保定、番禺三县的调查对象，就涵盖了143个村，其中43个村的4189户是逐户分类登记的。就我查阅过的保定调查表（1930年）可以看出，其设项之规范、周密和数据之确凿。在这些著作中，《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933年）、《广东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934年）、以及稍后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1939年）等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权威作品。

3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陈翰笙教授虽然在国外和国内都担负了不少工作任务，可是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关注从未停止过，在国外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利用多种文字（英、日、德、俄），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而一旦有机会短期回到国内，他就会不失时机地抓紧时间去农村、去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1948年用英文写成专著。此外，30年代末有关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安徽凤阳烟草产区的农村调查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仅《中国建设（英文版）》一种杂志上，陈翰笙教授在1952—1982年期间共发表了31篇文章，其中有关农村经济的13篇，另外还有3篇是写少数民族的。直到1984年，在先生88岁高龄时，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献，先生与薛暮桥等同志合编了题为《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书，并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很大。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陈翰笙教授在从事农村调查和研究中，反复阐述并贯彻始终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他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生产关系；第二，他提出了按土地所有和雇佣情况，将农户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这两个观点，在当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里边既包括赞成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包括反对者。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而社会经济结构又是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因此，探讨一个社会的性质，首先必须搞清楚该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可是，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身处国民党统治区的陈翰笙教授来说，要在自己主持和指导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中坚持这一条基本原理，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学术界的状况非常混乱，各种社会势力的研究队伍都在关注农村经济，不少人也去农村搞调查。然而，大多数的调查研究，正如陈翰笙教授当年曾经批评的那样，他们“不曾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调查侧重于生产而忽视了生产关系”，“这无非表明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错误罢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20年代到30年初，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次论战，暴露出了一些事关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其中危害最大的是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这个时期，有关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实质上就是理论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的大斗争。形势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陈



翰笙教授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调查和论证，为这场论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胡绳同志有一段重要谈话值得我们重新读一读。胡绳同志1985年曾这样指出：“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程度，与这种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是关于革命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

论及按土地所有和雇佣情况，将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的农户分类问题，也许人们首先会想到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选集》一书中，都有过“怎样分析阶级”的规定，其中有关农户分类也都是按这个标准区分的。但细查这些文件的发布时间，大家一定会有另一种想法。毛选第一卷《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于1933年10月，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此文与1933《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决定》作为中共中央两个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在此以前，1936年由博古署名发布了一个名叫“怎样分析阶级”的命令，在陕甘苏区实行过。这份时间表说明，毛选和中央的有关文件全都是1933年10月以后的事。而陈翰笙教授主持和亲自实地调查时制订的农户分类标准却都是发生在1933年以前。陈翰笙教授的过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和他的学生们依照这个农户分类标准调查整理出来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时必不可少的历史文献，而且其作用可能说是同时代留下来的其他的调查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同时期的其他调查资料，差不多都是从农业经营的角度，将农户分成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可是，事实上，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去看待。自耕农不仅包括一般自耕农，而且还包括富农和贫苦自耕农，而佃农中则有佃富农和一般佃农之别，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相差甚远，无法同等看待。因



此，尽管主持这些调查的诸多学者中，不少人也是很有造诣的，他们的调查所涉及的地区常常也很广大，取得的数据往往也相当系统，可是，要想直接引用他们的调查资料来判断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性质，却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比，陈翰笙教授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位同志所作的若干项农村调查资料之所以被学术界广泛引用，显然是同他们对农户的科学分类分不开。

陈翰笙教授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学者，除了研究农村经济问题以外，他对中国经济的其它领域，诸如赋税、金融物价、官僚资本乃至铁路事业的发展，都曾有过深刻的研究。李新玉博士主编的《陈翰笙文集1919—1949》（英文版）一书中，有一篇先生论述中国铁路新战略的文章（1937年写作），我和我的同事读后，都认为此文写得客观、公正，同时对外国资本也并未放松警惕，即使现在，也少有研究铁路史的文章能做到这些，此外该文还有一些至今仍未被利用过的史料。除经济学科，先生撰写的政治评论性质的文章同样非常出色。文集中有一篇题为《揭开幕布的中国政治闹剧》，这是一篇在刊物上连载的时事述评性质的文章，虽然时间已经过去60余年，可是其眼光之敏锐，语言之辛辣，使得今天读到它的人仍然有一种新鲜感，回味无穷。

七八十年来，陈翰笙教授一直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着。他的敬业精神，永远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祝陈翰笙教授健康长寿！



陈翰笙先生与“中国农村派”的 理论和学术贡献^{*}

雷 颐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如何建设的理论。由于后一方面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种尚不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设想，所以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富创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论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还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作为革命对象，是以它对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为基础的。无疑，这种阐释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以陈翰笙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且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后来被称为“中

^{*} 本文是在拙作《“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的基础上改写的，以庆祝陈翰笙先生百岁华诞。



国农村派”) 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认识。因此，本文拟对1928—1935年间“中国农村派”有关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视，并试图由此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对近代社会学学术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一恰当的历史定位。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①，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惟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在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是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



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³²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³³。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没有根据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来，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有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³⁴。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³⁵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



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⑧。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⑨。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两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



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②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③根据同样的数据，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涵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论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分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⑨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期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 Madi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陈氏则“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⑩。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



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3]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



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象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⁹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制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¹⁰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²⁹。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³⁰

另外，中共党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李平心（李于1927年



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参加陈翰笙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在1932年6月写就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一文，已用相当成熟的“辩证法”语言提纲挈领地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他对矛盾是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普遍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量变质变规律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但遗憾的是，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意义后来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其要点：他认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机械“均势论”都不能正确了解认识中国农村，“形式逻辑不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陈死的、凝固的、空虚的概念之上”，“只能认识事物的静态”，“不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动发展中，与事物的联系和互动中去把握实际，即是不能论事物的过程与动态以及它们内部对立性的统一和相互转变”。依此观点推论，“则帝国主义商品之流入农村，只有促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而“不能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豪绅买办剥削农民的事实”；“只能看见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与地主势力的分立，而不知道它们往往是勾结起来剥削和压迫农民的”。若是“机械地、抽象地把握到事物的类似，由此而构成一种没有内容的概念”。例如在分析农村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时，便会“将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等一概归纳而为同一范畴，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差别性无条件地抹煞了”，终将导致对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抹煞。而且，“机械的均势论不了解对立的统一法则，即是不了解事物运动的基础在于它本身一切联系中所包含的诸矛盾性与对立的相互转变……”；“抹煞质与量的差异性，企图将一切高级的复杂的运动还原为单纯的机械运动，否认高级形态的事物之特殊性”，“把个别的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暂时的相对的均衡普遍化、绝对化，而由此来确立事物存在之一般的基础”。所以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第一个规律“就是事物的矛盾性之发展与转变”，“因此在研究中国农



村经济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注意这些矛盾的关系之发生与转化。要考察各种矛盾的实质与内容是什么，要追溯各种矛盾之史的发展与转变”。所以不能孤立地从土地买卖、高利贷的发达等来断定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应看到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反而转化为封建性剥削。另外，既要看到中国与世界联系（殖民地）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特殊性，“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种辩证法的统一”。因此应该看到世界资本主义农业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但又不能认为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性质进而用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中国农村的深刻危机。同时，还注意中国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不能分别地把握各处的农业经济特殊的统一法则，综合各地的特殊状况来建立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之一般的估计”。同理，他强调“我们不能依据抽象的真理来考察农村经济的各个现象，而必须对于每一个特写的范畴作具体的研究”。而“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资本发达的事实而断定中国资本主义早已发达，封建势力已摧毁殆尽”。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即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商业资本的特质，只是抽象地抓住资本的概念，用此种抽象概念来解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性质”。最后，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互相转变法则”。但是，“唯物辩证法决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一刻使它和具体的现实的情境失了联络，因此实际的调查和统计以及搜集材料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身亦须以辩证法为基础），仍然成为目前第一等的任务”。^⑤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



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割的情况。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⁸⁵。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⁸⁶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



宁为依据)解释,目前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⑨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⑩。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在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



样，“为争得世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持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⑧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⑨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在



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⁶⁸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⁶⁹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 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 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 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⁷⁰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⁷¹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



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时，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²⁸。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²⁹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



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⑧。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⑨。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⑩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⑪。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妨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惟一的科学理论，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



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点，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⑨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五

由陈翰笙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从学术方面来说，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社会学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部分，由西方传入的。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就翻译



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的部分章节，1903年全书以《群学肄言》之名出版，影响甚巨，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萌芽。随后，有更多的社会学著作翻译出版，不少留学生出国学习社会学，同时有一些国外社会学学者到中国的大学任教，这样，社会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建立起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机构，产生了一批学术水平极高的社会学学者。他们有的侧重社会的心理因素，有的强调文化的作用，有的是生物论者、专注于国民体质的调查研究，更多的注重社会经济、人口、生活费用等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学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受到广泛关注、一跃成为“显学”，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急之中，面临着社会的巨大变动，因此对社会的研究必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几次论战又从学术方面刺激了社会学的发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结构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作出了重要成绩，而从将其学术化、规范化这一角度来看，如上所述，陈翰笙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不仅注重、强调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的重要性，而且十分注重学术上的模式构建。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E·J·霍布斯鲍姆在谈到模式建构的重要性时写道：“这种研究所使用的资料的特性，使历史学家无法将自己局限于简单的事实研究和叙述，他从一开始就得构建模式，以便将零星分散的资料纳入统一的系统之中，否则它们只不过同奇闻轶事相差无几。这种模式的标准是，或者说应该是其各部分可以连为一体，能够揭示特殊社会状况下集体行为的性质及其界限。”^⑨

如上所述，陈翰笙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而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都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 ①《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 ②《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1年12月。
- ③《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 ④《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 ⑤《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 ⑥《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 ⑦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 ⑧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 ⑨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第532—552页。
- ⑩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 ⑪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 ⑫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 ⑬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 ⑭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 ⑮ 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 ⑯ 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 ⑰ 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 ⑱ 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 ⑲ 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复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
- ⑳ 同上书，第103—105页。
- ㉑ 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 ㉒ 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 ㉓ 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 ㉔ 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 ㉕ 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 ㉖ 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复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 ㉗ 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 ㉘ 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 ㉙ 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 ㉚ 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 ㉛ 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 ㉜ 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 ㉝ 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 ㉞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967年版，第596页。
- ㉟ 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谈陈翰笙30年代农村调查的 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侯建新

陈翰老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对中国革命和学术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巨大。他将理论与实地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将学术活动与伟大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堪称一代楷模。陈翰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为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从理论上说明农民土地革命之势在必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在学术上翰老以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尊重实证的精神以及田野工作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为中国现代农村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基础。这里我着重谈一谈翰老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和与此相关的一些情况。

陈翰笙领导的那次颇具规模的农村调查，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又称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那时起，就有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不同看法，如魏特夫、瓦尔加提出中国先前是所



谓“水利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不存在封建社会。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性质也要改变。这些说法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少冲击，因为当时中国革命进展得比较顺利。但在1927年后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形势就不一样了。于是，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从而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一步引向误区。

当时陈翰笙先生及其夫人顾淑型正在苏联。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被捕后，陈翰笙处境危险，被迫出走日本，然后进入苏联。他和夫人被安排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而马季亚夫正在该所担任东方部部长，所以经常见面。马季亚夫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所谓“水利社会”，而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便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农村，对此，陈翰笙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马季亚夫的主张、特别关于当前农村社会性质的主张，几次当面予以驳斥；同时暗暗决定，返回祖国后，一定对中国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用更充分的论据进一步驳倒马季亚夫之流。

1928年6月，即在陈翰笙的莫斯科争论不久，中国共产党六大作出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个决议，重申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此时，陈翰笙先生进一步坚定了进行中国农村调查的计划，他要以充足的实证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并科学地说明土地革命在中国势在必行。这是陈翰笙搞农村调查的主要原因。此外，据陈翰笙后来回忆，他形成搞农村调查的想法，还与蔡和森的一次谈话有关。1927年初，也就是他被迫转移苏联前不久，一天晚上，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他到北京郊外一个地方会面，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回来时天已亮了。他们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怎样革命的问题；蔡和森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对此他很有兴趣。后来陈



翰笙讲，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产生了搞农村调查的念头。

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陈翰笙来到中央研究院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当时蔡元培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实际工作，全部委托陈翰笙主持，他从不干扰。1929年春，陈翰笙主持研究所工作后，首先想到要有一批得力的干部。陈翰笙用人不讲资历，不凭关系，只要求个人志愿和实际能力。不久，他正式聘任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陈翰笙领导进行的第一项工作，也是他主持研究所6年中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农村社会调查。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他们决定调查从陈翰笙的家乡江南无锡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河北和岭南等其他地区，尽可能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

1929年7月至9月，陈翰笙组织了45人调查团，对江苏无锡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共调查了55个村落和8个农村市场，其中对22个村1207户进行挨户调查，共发出40多种表格，获得2000多个数据。

1930年5月至8月，陈翰笙组织了另一个更大规模的63人的调查团，进入保定地区。在4个月期间，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重点考察了11个村庄1175户村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以发现各村之间的异同。这次调查的重点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该地区农村一般经济状况的变迁。第二方面是各种制度的沿革，包括度量衡新制度的采用，银元和铜元兑换率的涨落。第三方面是各种价格的涨落，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价格和农用品价格。第四方面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变动对农村产生的影响。在这次调查中还制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标准。同时，陈翰笙还组织了另一批调查团奔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考察流亡到东北的难民状况。这实际是从另一个侧面研究北方农村经济，



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组织了广东农村调查。由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工作进展顺利。调查范围包括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历时三个半月；而后又在番禺的10个典型村中调查了1209户。同时还进行了50个县335个村的通讯调查。

1933年，陈翰笙领队调查安徽、河南、山东烟草地区，目的在于研究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农生活。此外，陈翰笙还组织了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和杭嘉湖20县内近百村的调查等等。

从1928年至1934年共6年时间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之调查者犀利、深刻的政治家素质，使调查团终于得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结论。在陈翰笙用中英文写成的大量论著以及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的经济论文，对国内外理论界以至对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翰笙指出：“虽然我们说中国的农村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但我们决不可误认为它仍是纯粹封建主义的……靠地价为生的地主，靠五花八门的税收过活的官僚和军阀，靠操纵价格为生的商人和买办，以及靠过高的利息过活的高利贷者，甚至比当代垄断资本的董事长们勾结还要紧密。但这些人积聚的金钱，正如海外华侨汇寄回家的金钞一样，大都更广泛地变成了地产。土地集中的过程只能使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积聚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在同一书中，他又指出：“虽然宗法式自给自足的农业也在国内许多地区分崩离析，但是谋求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仍是凤毛麟角。中国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仍然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而耕作的形式。”这些精辟的分析，说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实质，也为我党在农村实行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值得一提的是，陈翰笙是中共地下秘密党员，而这次调查是在国民党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杨杏佛的资助和保护下，利用合法机构和身份进行的，表现了陈翰笙灵活的斗争策略。结果，



不仅在理论斗争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专业理论队伍。当年来自无锡的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后来都成为我党知名的经济学家。王寅生、张稼夫、刘瑞生、秦柳方、姜君辰、陈洪进、石凯福等，也都是各有建树的专家。

1933年，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被推为理事会主席，并一直担任到1951年该会解散。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研会及其《中国农村》杂志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土地革命，嗣后还引导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还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农村调查，不过那是为了慈善救济事业，或为了改良农业技术，或为了完成某个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而已，多是些表面的，触摸不到实质问题。像陈翰笙这种深入到农村最底层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在中国是一创举，其后也不多见。这些调查者有深邃的政治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又有扎实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功底，所以能够把握住农村社会最要害的问题，留下有价值的资料。相比之下，不仅前北京农商部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显得简陋虚妄，即使金陵大学美国教授卜凯主持的农村调查也似肤浅得多。他们对各种复杂的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研究农村经济决不能忽视的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益、借贷制度等，亦都被忽略。再者，陈翰笙调查中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扎实细致的作风也是非常突出的。实际上，他将许多先进的人类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引进到经济调查中来。在无锡农村，他们数十人用3个月时间对1207户村民进行挨户调查，衣食住行，生产消费，文化教育，社会交往，无所不包，每一户便辑成8开篇幅的资料一册。保定调查团，规模更大，调查的户数更多（1773户），内容更为详备。那样的调查资料，即使我们今天翻开，也是令人叹服不已的。它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学术



史上无疑应占据一席之地。最后，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批调查资料所蕴含的巨大现实价值。不了解中国农村的昨天，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今天和预测明天。陈翰笙为我们留下的这批农村经济资料是罕见的、不可再生的，是后人继续的宝贵基础。

80年代中叶，我研究生毕业，陆续发表一些关于英国和中国农村经济的文章，引起翰老的注意，他通过陈洪进先生约我到北京他家里晤谈，开始有了交往。不久后，他几次向我提起30年代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无锡和保定的调查及其资料。原来是这样的：这两次调查的原始资料，解放后由中共南京军管会接管，后来转到北京。1958年春，在薛暮桥、孙冶方同志主持下，成立了无锡、保定经济调查小组，由江苏、河北两省统计局分别组织力量，于那年夏季在两地区原来的村庄用同样的方法第二次进行调查。这一次调查以1936年，1948，1957年为调查的三个时期，以与30年代前后的调查结果相比较。陈翰笙先后将一些有关资料包括无锡、保定地区后续的调查资料给我；他对这批资料未被充分利用表示遗憾，希望能有人继续做下去。他希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并能够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他鼓励我所从事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能够与中国的社会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80年代末，陈翰老以耄耋之年，热情洋溢地为我的一本关于中英封建农民与农村社会比较的小书（《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作序，使我至为感动；同时我一直把它看作是翰老对年轻一代学人的深深企盼。如所周知，这位视事业和工作为生命的老人在晚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年轻人。陈翰老对后学的殷殷厚爱和企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92年底我从英国回来后，开始着手准备承担这方面的工作。以保定地区以前的调查为基础，我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立项，课题为“冀中农村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1930—1995）”，1994年被正式批准为国家八五项目。我打算搞出一份关于冀中平



原上11个自然村落65年追踪调查的研究报告。能够真实地记录下中国若干村庄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农村经济生活及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这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倘若这种社区的或个案的分析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方乃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更是我们所殷切企盼的。中国农村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梦魂萦绕的目标。1995年夏季和1996年冬季，我两次带领课题组赴冀中农村，在天津市政府和当地政府协助下，沿着当年陈翰笙的调查路线，挨村进行入户调查。这次调查以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为重点，作为对陈翰笙等30年代至50年代调查的衔接，以期成为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史的沿续。我们希望，纵观这一地区65年的动态发展轨迹，以一种深厚的历史感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农村政策正在把中国农村推向现代化的轨道。当然，毋庸讳言，中国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还很多，甚至陈翰笙当年提出和忧虑的一些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们还希望，从眼下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从生动、活泼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探讨新发展，为使中国农村改革迈上一个新台阶贡献一份力量。总之，翰老崇高的信念和尊重实践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我们则努力使自己的工作成为翰老当年开创的事业的一部分。



追求理想不求闻达

顾景高

陈翰笙是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早年就读于美国波莫纳大学。192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研究所研究员，1924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1927年赴莫斯科，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员、纽约太平洋学会编辑、香港《远东通讯》英文版编辑。1951年回国，历任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著有《美国垄断资本》、《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农民》等。

今年1月，接到大姐——少礼来信，问我是否参加年初六庆祝姨父陈翰笙教授百岁诞辰活动。我考虑一个人活到百岁不易，又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半生，支持到今天更属不易。因此，距姨父生日还有半个月时，我决定参加，并打长途电话回复大姐。

我与儿子、媳妇于年初四离沪赴京。望着窗外的浮云，联想往事：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上海一名女中学生陈志远，遭受通缉，姨父将她带到北平，隐蔽在我们家里。不久，李大钊被捕，我的另一个姨父——北京艺文中学校



长高仁山也被捕。陈翰笙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处境十分危险，与阿姨躲藏在史家胡同内一间小屋约半个月，只有母亲一人知道住地，经常带些食物、换洗衣服和报刊信件前去看望。后在日本友人中江丑吉的帮助下逃往天津，取道日本，前往苏联。母亲曾参加营救李大钊和高仁山的活动，又陪同南方赶来的高仁山亲属，到刑场收尸和料理后事。从家人的日常言谈中，在我幼嫩的心灵中，懵懵懂懂地知道，革命是好人干好事，反革命是坏人干坏事。姨父是以实际的行动，无声的教诲，成为我走向革命的最早的启蒙人。

1932年秋，日本占领东北后，进而威逼华北，北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母亲率领全家老小，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姨父家中小住半年，然后到南京与父亲同住。

在上海时，经常上门的客人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她和姨父、阿姨坐在床沿用英语交谈，我们听不懂，但有时也猜出意思。史沫特莱不时用蓝眼睛瞅着我们这群孩子用手指指点点，我们知道是在谈论我们，就伏着桌子，做个鬼脸，眯缝着眼偷看她，逗得她笑了。她招招手，唤我们过去，阿姨也说：“过来吧。”我们却一溜烟地跑出房门，才使她们有安静的时间畅谈。我们不知道这些大人谈什么、干什么。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姨父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产生了由衷的敬慕之情。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准备逮捕地下党员。事先得到情报的地下党组织为保存力量，动员比较活跃的党员离开重庆隐蔽。我大姐少礼，二姐幼礼也离渝远走。当时姨父在香港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积极掩护地下党员。“工合”是外国友人支援中国人民长期抗战而发起成立的，有外国人参加的工业合作社组织，对中国人民的抗敌斗争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民党当局被迫抗战，不得不支持“工合”。但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因此又消极对待“工合”。国民党当局有恐外病和媚外病，对有外国人参加的“工



合”不敢得罪，姨父就利用国民党的这种心理，通过“工合”组织，掩护不少地下党员。大姐就是在“工合”工作的犹太人杰孙的直接帮助下，坐“工合”汽车前往南昌的。半个月后，二姐也乘坐“工合”汽车离开重庆。

在危急时刻，身为地下党的姨父伸出援助之手，解人之危，使我更加崇敬姨父，并在他的影响下，树立了走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

1951年4月底，我作为新组建的人民空军志愿军成员，从湖南衡阳坐军车奔赴东北。5月2日上午，火车到达丰台车站，停车半小时加水，那天正好五一节放假，事先接到我从保定打去的长途电话，父母、姐兄妹、姐夫及姨父、阿姨都提前赶到车站等候。他们知道停车时间不长，因此，一见面个个把带来的礼物抢先塞向我手中，然后才问长问短。我双手拿不了，不得不请身旁的战友帮忙。阿姨手持相机，抓紧分秒拍照，几百双战友的眼睛盯着我。我知道这不仅是睽离六年的骨肉之情（我和姨父则是1933年以后首次见面），而且体现了他们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与热爱。尤其是姨父，才从海外归来，深知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地位的提高，是与党的领导，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分不开的，因而对解放军格外崇敬。姨父从母亲口中知道我不吸烟，但仍送两条当时最流行的大前门香烟，他深知解放军辛苦，抽香烟可以消解疲劳。因此，送这些礼物，不过是经我之手，慰问人民子弟兵而已。车开后，我遵照姨父的心意，把所有慰问品（全是食物及香烟）分送车厢内所有战友，自己只留下同等一份。有人劝我多留点，我说：“这是慰劳大家的，不是慰劳我个人。”

1955年秋，我调动工作，由东北吉林市前往浙江杭州，在北京转车停留两天，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回家。从母亲口中，知道姨父回国后的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姨父接到周总理邀请他参加祖国建设的消息后，离美绕道欧洲，于1951年1月底回到北京，周总理为他设宴洗尘。乔冠华、章汉



夫、李克农和陆定一也参加。周总理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邀请姨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但姨父认为搞学术研究更适合自己的特长，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辞掉大官不做。席间，陆定一又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他也以同样的理由予以辞谢。不久，宋庆龄在寓所设便宴欢迎陈老夫妇，偏巧周总理也去找宋庆龄商量创办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的人选。宋庆龄当场推荐姨父，姨父认为金仲华有办报的丰富经验。担任编委会主任更合适，自己宁做助手。凡此种种，只求事业，不求做官的人事态度，正是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我不由肃然起敬。我以有这样的姨父而感到骄傲，姨父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姨父从美国回来，完全有条件向领导提出解决住房，但他不提，而是住在爱人的姐姐家中，也就是我父母住的祖传下来的老房。房子陈旧，没有卫生设备，姨父住在东厢房一排三间，用自己的工资修建化粪池和卫生间。1975年7月我回北京探亲时，陈老在我家一住就是20多年，直到1979年，陈老的学生——万里的孩子，在家里谈起陈老的住房时，引起万里的重视，这时，老家及附近其它民房正待拆除建高楼，姨父才搬到现在住的高干房。

1971年，陈老离开湖南茶陵五七干校回北京，没有工作，闲居又不习惯，就决定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在家开办英语、德语学习班。几年下来，学习的总人数有150多人，多数是工人和职员子弟，也有10多位是高干子弟，包括刘少奇的两个女儿。一些亲友为姨父担心，“文革”未结束，“走资派”未解放，刘少奇又是“头号走资派”，“走资派”的儿女来学习外语，会不会招来麻烦。但姨父心胸坦然，毫不担心。认为即使老子有问题，也不该搞封建株连，罪及妻孥。并认为：子女能进厂当工人，就能当我的学生。我免收一切费用，倒贴钞票教学生，又不犯法。名正言顺，正大光明，照样教自己的书。从这两件事中，我看到革命老传统在陈老身上闪闪发光，陈老博得人们的尊敬与热爱，是理所当然的。



我到北京的当晚，就去看望姨父。姨父患严重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基本上是盲人，走路也需别人搀扶。但身体健朗，饮食正常，且有规律：不饮酒、不抽烟、不喝茶，上床就能呼呼大睡。精神好，脑子清楚，讲话仍然有条有理，毫不噜嗦。姨父心胸开朗，平时批评别人，也是讲过算数，不放在心上；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而是乐观对待。我想，这大概是他长寿的秘诀吧！

年初六中午（2月25日），亲朋友好在万寿宾馆为陈老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敬送的花篮，放在象征长寿的大幅仙鹤图的两侧。陈老坐在轮椅上神采奕奕，以仙鹤为背景，和与会者分别合影留念。聚餐时，我妹妹——北京大学教授孙小礼代表全体家属致祝词。姨父的老战友，现为中国国籍的原美国共产党员、著名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拄着手杖，用外国腔的汉语，代表来宾致祝词。两人的发言，多次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孙小礼还将中共党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英文两种版本带来，文中对姨父在1929年7月至1934年5月，组织无锡一批能吃苦的进步青年，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法身份，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无錫、广东、河北等地，排除干扰，进行艰苦的农村经济调查取得的成绩，做出高度的评价。调查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有力地批驳了马季亚尔及中国托派认为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农村等谬论，揭穿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关于“农村复兴”的谎言，为我党在农村实行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时参加调查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后来成为党内有名的经济学家。聚餐宴席上，有些与会者纷纷唱歌、唱京戏，小朋友也表演舞蹈等文艺节目助兴。考虑到陈老年事已高，不能太累，于是以全体起立，擎起酒杯，面向陈老，以遥祝方式同时敬酒。大家反复高唱《祝你生日快乐》，外宾用英语重复唱，众人合拍响应，气氛欢快、热烈。姨父面露笑容，不断鼓掌点头，表示感谢。我觉得，参加陈老的祝寿活动，实际是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与会者为建设美好的祖国，更加奋勇前进。



陈翰笙与工业合作社

爱泼斯坦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年代里，陈翰笙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最积极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1939年，在工业合作社最初成立一年后，他成为驻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在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领导之下。1983年他与卢广锦、路易·艾黎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老同志以及“工合”的支持者一起倡议恢复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87年恢复了国际委员会，并任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对工业合作社思想与组织的提倡，可以上溯60年，直到工合运动诞生之前。

这种始终如一的提倡工业合作不仅仅是一位坚信工业合作社优点的人对工业合作的提倡，而且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民主方式的信仰者、一位爱国人士、一位革命家和一位共产党人对工业合作的提倡。

作为经济学家，陈翰笙一直强调与农业部密切相关的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30年代他曾写道：

“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小型农业盛行的国家，小型工业亦将盛行……根据此种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小型工业将会越来越重要。既然在中国可得到的资本数额很小，那么发展小型工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他指出，小型工业甚至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仍然具有重要性，并详细阐明了两国必然的差异。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日本，小型工业的不利之处被这样的事实所抵消，即它们实际上是更大的组织垄断集团的一部分。在中国相比之下统一的办法是通过联合会来代替大的垄断组织，小型生产合作社本身则是联合会的成员。通过合作社运动，小生产能在工业化连贯的进程中补充大工厂之不足，而又避免剥削。

关于民主，陈翰笙明确指出，在中国一种民族的生产制度将会是促进各方面民主的强有力的因素。“当人们受到个人责任的教育而又养成相互合作的习惯时，他们必将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观念。”

这些引自解放前陈翰笙的著述的文字，把民主与革命连在一起。它们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合作社将帮助人们适应中国的根本的变革，之后亦将帮助他们在一个新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地位，而这个新社会的经济将不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即一种社会主义经济）。

一、战前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下，合作社只能发挥其潜力的一小部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取得的。作为历史学家，陈翰笙真实地指出，抗战之前合作社在中国是如何作为由知识分子和慈善人士进行的一种本意良好的尝试而开始的。但是，声称是一种来自底层的民主运动的东西，迅速被转化为一种不得不由上层指导的体制。

他的报告指出，在战前的年代由国民党列入合作社名单的大约12万个组织的90%是信用互助会。这些互相会的组织者和官员通常是地主、富农与富商，他们在地方上掌握着政治与经济权力。这样的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简直是令人震惊的”。例如，在山东省



任何有条件参加合作社的人都得拥有10亩或更多的土地，在河北是30或40亩。显而易见，任何好处都不会波及那些更穷的而又最需要信用贷款的农民。从这样的“合作社”借款实际上就是向集体高利贷者借款。

二、抗战期间的“工业合作社” ——进展与倒退

抗战初期，工业合作社诞生了。这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较好的日子里，陈翰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努力促进工合运动以有助于国家和人民的战时需要。事实上，它们能够也的确在数量上和功能上取得了进展——这样的进展，其他生产者的合作社在以前从未取得过。

但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尽管表面上倡议“工合”（主要是为了装扮自己在海外的形象），而实际上依然忠于其反动本质。当它越来越背离抗日统一战线时，它亦愈加试图通过其政治权力来改造、控制和窒息这种新现象。

战后，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陈翰笙在评述工合运动的历史时写道：“如果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来促进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对这个运动来说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当时事实上存在的官方对合作社的控制更好一些）……这当然仍然会接受一些来自政府的援助或建议，但将会使中国工业合作社摆脱其现在遭受的那种官僚作风的灾祸……目前，供应站和地方总部用来处理官方通信的时间和精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942年6月，几个强加在工业合作社之上并经过改编的官僚机构的其中一个受到这样的描述：“新秘书长……一位典型的政府官员，对合作之事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关心……立即按照传统的模式开始把自己的人安插在关键职位上，把以前的官员中一切持异议者逐出办公室或使他们无能为力……他把自己的人任命为



各地区负责人……这些……董事们无一例外，除了捞钱之外，别无其他兴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极端地不择手段的商人。”

“从此之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而出现严重的退化”。许多商业卡车被允许以“工合”的名义进行运输而领取佣金，运输的却是与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的私货。收购与储藏原料而出售给外面的顾客……合作社要求原料的申请都遭到拒绝……合作社被迫提供……从不偿还的贷款。在办公人员当中形成了各种小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有自己的“违背合作社真正利益的既得利益”，“它们把合作社运动推向了灾难的边缘……”

正如他通常掌握着事实一样，陈翰笙每得出一个结论都以实际的事例与数据为根据——读者如果愿意可自行去查对这些事例与数据。他的分析与看法是基于详细的切实的研究。

三、为积极面而战斗

陈翰笙对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合作社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在抗战期间他努力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合组织有益的作用，抵销其消极倾向。在官方逐利者把毛毯生产业从工合组织攫去之前，工合为国民党统率下的前线士兵生产了数以十万计的军用毛毯。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工合”也制造武器——这些武器是国民党未给那里的爱国力量提供的。在这两个地区，工合不仅生产供人民消费的工业产品，而且有些引人注目的实例表明，工合也生产制造消费品的机器。

在社会方面，陈翰笙后来概述：“在那些没有给（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普通民众干什么事情的年代里，中国工业合作社独自战斗，在一些城市如甘肃的兰州、河南的Chenping（镇平）和广东的Nanyung（南雄）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传授给他们新的技术和民主组织方法，并为工业发展打基础。在Balilie 学校里，一



百多名参加工作的男孩受到训练成为团体领导人。这个数目当然令人遗憾地很少，但是如果中国工业合作社能够渡过这个困难时期，当大的变革来临时，那将至少有了—一个成长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合作社组织之内和时间与空间的限度之内，陈翰笙、艾黎和其他人士也致力于协助工业合作社，使其成员成为促进民主和人民生活之改善的更为广泛的努力之中的一个因素。一种方法是谋路由合作社联合会自身来取代、由国民党当局强加的监督与管理机构。陈翰笙赞扬兰州的联合会显示出了一个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成立的组织的价值。这个联合会鼓励单独的合作社自己举办夜校，给予它们财政补贴和组织指导，出版了一本双周刊物，并且建立了一种统一的审计制度……“以前合作社视地区供应站的官员（由联合会取代）为它们的上级权力机构，但现在它们却向联合会求助。他们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机构具有信心”。大多数有关的合作社终于开始自己处理许多过去均由中心机构处理的事情。

陈翰笙总是努力试图为“工合”组织的各种分支机构发现、培养和保留真正地热情而又能干的人员，这并非易事。“优秀的人员通常并非唯唯诺诺的人，他们不久即与那些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而被驱逐。这样的事情在有关该主题的通信中已明确指出。最承担责任的人不仅面对骚扰和解雇——有些还遭国民党当局监禁或杀害”。

1947年，在二战胜利与全国解放之际，陈翰笙写道：“中国工业合作社不可能在中国的现状之外生存……它是中国现状的一部分，中央（国民党）政府的整个腐败无能都反应在其组织之中。中国工业合作社能够设法生存至今已经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当然无疑部分地由于由其引起的强有力的国外的支持。”

但是，在对工合经验进行总评价中，陈翰笙进而指出，“工合的成就也并非微不足道的，尽管遗憾的是工合未被允许做更多的事。而事实仍然是工合给数以万计的赤贫者带来了工作，在一



些地方为小型工业开辟了道路……而这些地方以前绝对没有任何工业，同时工合也是惟一的带有建设性方案的组织，在像1942—1943年河南饥荒的灾乱的时候人们可以向其求助。”

他也赞扬了与工业合作社一起创立的作为其核心的社会服务设施，例如在宝鸡，它们包括3家孤儿院，一个妇女培训学校和一个难民村。此外，那里的工合医院免费照顾路过的所有难民，Nancheng和双十铺的医院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双十铺许多难民由培黎学校和合作社安排了工作。

但是，希望在于对现存秩序的变革。“如果中国工业合作社能渡过这个困难时期，当大变革来临时将至少有一种成长的基础。”

四、战时共产党领导的地区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来临的席卷中国的大变革已经在某些地区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气象——在抗战时期由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后期这些地方将成为解放区。

作为革命家和（当时是地下的）共产党人的陈翰笙帮助（工合）国际委员会集中支持这些地方。

中国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海外出版的著述中，他经常不得不用掩饰的文字来表达这样的目的。即使如此，他也曾不断地指出在中国合作社发展享有真正的、有利条件的、仅有的地方是延安地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常识告诉人们，这些地方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陈翰笙写道，成立于1939年的延安供应站起初从重庆（战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临时首都）获得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拨款，1500元供办公开支，2万元作为贷款用。“这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和给予（延安）边区合作社的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财政援助。”此后，国民党甚至封锁了由华侨与外国友人特别标明给予这些地方的合作社的捐助。



陈翰笙用“资少产高”简明地根据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的合作社的工作，在这里组织者们无私地工作，只领取微小的工薪。这是“民族危亡时期其平等主义政权自行强加的厉行节约”的体现。

延安为那里的合作社制定的原则记载在一份翻译的文件中，这份文件藏于一卷幸存的关于国际委员会在战争年代的英文通信的材料之中。这些原则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公约，由合作社大会通过，发表于延安1944年7月10日的《解放日报》之上。内容如下：

坚持“生产第一”，“民办公助”。

绝对禁止强制入社，保证入社和出社的自由。

定期结算账目，定期分配红利。

合作社的工作应由全体成员讨论，不能由少数人专断。

禁止囤积居奇，遵守（边区）政府法规。

反对贪污腐化，人人清正廉洁。

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形势与人民之需，提高专业技术。

五、解放后

1949年解放后，中国工业合作社各层次能干的人员在为中国的打下新的经济和工业基础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该组织自身先被一个总合作社部所吸纳，后来又被一些经济实体所吸纳。最初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得到了发展与繁荣，但在一个短期的活动增加之后，这些合作社即被淹没在走向总体的国有制和国家经营工业的浪潮中。在这个浪潮中，合作社并不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延续的形式，而是走向公有制的“更高”阶段的一种过渡形式，这意味着国有制。

现在总的来讲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直到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才得以恢复。在这项行动中，陈翰笙、艾黎和其他工合运动的老工作人员起了积极的作用。一年后，在一篇题为《发展工



业合作社必须面对乡村和小市镇》的文章中——重申了他过去一直提倡的地理方位。他写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开始以后的年代里，经历了许多坦途与坎坷。特别是人民公社的成立出现了重大的挫折与错误——根据这样的基本的设想，即“政府与社会应该一致”（政治与经济管理应该合一）和“一大二公”（越大越好，所有制形式越高越好）。此种变革并不适合于当时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它们违背了客观规律——颇似“一个仍然不太会走路的三岁孩童想学跳高”，或者说是揠苗助长。

后来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保证家庭土地承包15年不变，这使农民非常高兴。对农村手工业来说形势也是非常有利的。农副产品丰盛起来，“创造了对加工和工具器械的需求”。但虽然木匠泥瓦工等有足够的工作干，仍有一些手工业者担心他们将缺乏材料和市场，不敢大胆冒险。

陈翰笙写道，“保证材料和销售的最佳方法就是组织合作社”。“我们合作社的发展不应该只限于大城市，而必须面对无数的村镇，特别是那些小集市，它们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桥梁。这将既有益于生产者，也有益于消费者，将使农村人口能够离开土地而不离开家园，亦将促进农村商品生产，使城市与乡村都活跃起来”。

因而，工合运动的成长“有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反映了客观需要，应有光辉的未来。

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复杂的，工业合作社的成长比预期的要慢得多。一些曾经打着工合旗帜发生转向，变成了一般的商业集团。陈翰笙同艾黎和其他人士都反对任何非合作社企业打着“工合”的旗帜。1987年他们恢复了工合国际委员会。这时除了与合作社中的新旧朋友及其支持者建立联系外，国际委员会从事了一项新的任务：通过成立导向性的工业合作社来树立标准，坚决坚持合作原则，为那些利用“工合”的人树立标准。一些过去老工合组织工作过的地方被选择来作为实验区。国际委员会并不渴求成立大



量的工业合作社，这样的工作可由其他的组织来干。陈翰笙认为在范例性的工作中，必须特别强调合作教育。

如我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识之中所理解的，陈翰笙保持着他的信念，即工业合作社是形势的需要，有其自身扮演的角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更大的事业的一个必要的附属物。他把合作社视为一种合乎需要的重要的解决诸如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等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生产性的在政府鼓励下通过民主自助的方式。这种发展的条件并非都是现存的，但迟早发展的真正需要将决定需要合作社来发展其作用。

百岁高龄的陈老仍然坚信合作社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毕生都是一位现代化者。当他谈论过去时，他所考虑的总是能从中学到什么来满足今天与明天的需要。他相信合作社是名符其实的，基于自愿原则，自愿联合，其成员应了解情况，具有知识，技术上胜任，是一支健康的力量。合作社应追求其成员、社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没有腐败，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个人野心与贪婪。

陈老毕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拒腐蚀，永不沾，甘为人民的孺子牛。

参阅的陈翰笙关于合作社的著述：

《作为中国病的万应灵丹的合作社》，《远东通论》，纽约，1937年3月3日。

《合作社运动与农村建设》，《工业通讯》，第6期，1940年。

《论工合目前的困难》，《中国工合》，第21期，1943年。

《工合目前的困难》，《中国工合》，第21期，1943年。

《工合：中国合作社的故事》，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纽约，1947年。

《世界经济周报》，1948年5月28日。



新中国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回忆陈翰笙同志1947年冬在纽约的议论

薛葆鼎

“学术活动直接紧密结合革命活动的好榜样”这是我在庆祝陈翰笙同志学术活动、革命活动60周年和迎接他90华诞即将来临时对他老人家的认识。我对他老人家衷心钦佩。

39年前，翰老在美国钢城匹茨堡的“金三角”找我垦谈过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那时他就流露过吸引国际资金以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位闻名国内外多年的大学者。一年之后，因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关系，我得以在纽约经常去请教他。在党的领导下，为筹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而组织的“建社”成立会上，翰老年已半百，讲解了“中国工业化”、“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资金应如何筹集”等问题。那时，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即将明朗化，留美的进步科学技术人员很多准备回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有些则在同“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取得联系后准备取道欧洲和苏联直接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建设。可“新中国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这是大家都难以解答，又不得不时时萦思的问题。会上这个问题刚被提出，陈翰老就似成竹在胸地讲了一大气，他把一次工作会议形成“学术座谈会”。

他的讲话要点，有一部分被记录在1947年1月16日出版的



“建社通讯”第一期上。在“十年动乱”开始时，一份“建社通讯”第一期从一个高级工程师的旧衣箱中被“抄”了出来。在“四人帮”倒台后作为“抄家”物资又辗转传到我手中。这大概已成了“海内孤本”，但此事隔近40年的议论，至今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在那次讲话中，陈翰老一开始就抓住要害。阐明“什么叫工业化”。解放战争胜利后，要建设祖国，总希望达到国家工业化。但倘若建设许多工厂后人民仍不能广泛享受工业产品的话，那就谈不上工业化。我们建设祖国、建设工厂的目标就是要使人民共同富裕，能够广泛享受工业产品。实现了这个目标，才能叫做工业化。这也是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那么建设工厂所需要的资金该从何而来呢？陈翰老明确指出，这些资金既不能像资本主义初期那样，残酷地搞“资本原始积累”，如掠夺殖民地等；也不能靠帝国主义的恩赐，如丧失国格乞求经济援助；更不能出卖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任何丧权辱国的行径绝不可为。陈翰老提出，中国人口众多，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村已消失了封建剥削形成的贫穷，这就会形成世界少有的、具有极大的潜在消费能力的广大国内市场。这正是回笼货币，从商品流通中交换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以积累资金的广阔场所。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不免受帝国主义的敌视、包围和封锁而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主要应靠发展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使国民经济按照客观规律有计划地运行。这样运行得越好，就越能又多又快地积累起资金。因为剥削压迫工人农民多年的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那时都将不复存在，新中国有了清明、廉洁、民主、进步的政治局面，纵然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教育也长期落后，建设经验也不足，因而难免走点弯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只要找到了这个规律，就不难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陈翰笙与《中国建设》

张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建议，由享有崇高国际威望并有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经验的宋庆龄出面创办一个刊物，把开始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出版这个刊物，并亲自命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名为《中国建设》，首先于1952年1月以英文出版。

为此，宋庆龄委托她的老战友、著名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和曾在香港为她所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编过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的陈翰笙，共同负责刊物的筹备工作。陈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学识精深，经验丰富。同时，她又从美国请来曾经负责编辑《新闻通讯》的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任这个杂志的执行编辑。他并且亲自制定了《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要使世界各国最广泛的阶层，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作的努力。

当时，由于金仲华身任上海《新闻日报》和英文《上海新闻》的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建设》设在北京的编辑部的担子主要落在了陈翰笙的肩上。创刊时，为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其中包括著名教授钱端升、卫



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实业家刘鸿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和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金仲华和陈翰笙分别担任这个编委会的正副主任。

最初，杂志社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原新华社记者李伯悌等六个工作人员，要负责组稿、写稿、编辑、翻译、通联等工作。但是，在陈翰笙的领导下，大家劲头十足，齐心协力地艰苦创业。1953年至1955年间，编辑部陆续调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第三批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分别担任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奔赴全国各地采访。在不断补充新生力量的情况下，工作逐渐走上轨道。陈翰笙总是上班时间未到即已进入办公室，他承诺写的稿子无不准时、甚至提前交稿，而且绝不超过编辑计划要求的字数。他对所有工作人员同样十分严格，要求稿件通俗易懂，精益求精，不行就得重写。

他处处都以身作则，讲究效率，要求大家珍惜一分一秒时间。一次，他约一个同志去谈工作，那人晚去15分钟，只见门上贴着一张黄条，写着：“时间宝贵，恕不久候。”陈翰笙早已人去房空。此事传开，谁也不敢再迟到了。

创刊以来，陈翰笙认真执行宋庆龄制定的编辑方针，并且十分注意杂志社的组织建设和业务规章制度的完善。为此，他时常请示宋庆龄，并往往得到她的书面答复。在陈翰笙的主持下，定期召开编辑会议，对远期和近期的计划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编辑部里组长以上干部都参加，并且踊跃发言。会上，担任秘书、工作十分细致的华侨张巧裳用英文作详细记录，会后打印出来给大家传阅，以便于督促检查。迄今保存下来的一些当年的原始记录，已成为“珍贵文物”。

《中国建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杂志的图片工作，特别是彩色封面、封底和画页。为此，成立了“彩色委员会”专司其事。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她是一个造诣甚高的摄影家，并且具有艺术家的鉴赏眼光。每期杂志的彩色图片，



都要经过委员会的精心筹划和认真选择。《中国建设》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赢得众多读者的赞誉，经常都有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精美图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个优良的传统，至今依然保持。

这个杂志的另一特色是：和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努力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期刊物，都必附加一张“征求意见表”，反馈回来的讯息都必须认真处理。与读者的通联工作，从开始就受到重视，由陈翰笙亲自和爱泼斯坦的夫人、英国专家邱茉莉共同负责。每封来信必复，有时是陈翰笙口授，由邱茉莉打字作复。一些有特殊内容的信，往往要在编辑部会议上宣读，作为考虑选题的重要参考。

同时，陈翰笙十分善于运用他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刚问世的《中国建设》争取各界的大力支持。每当人大、政协开会，就成了杂志组稿的大好机会。往往是由金仲华或陈翰笙出面，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出谋划策。组织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专稿，构成了这本对外宣传刊物的一大特色。

《中国建设》每期都必有几篇反映中国主流生活的重点文章，在早期，这多半是由陈翰笙亲自策划的。而且，常常是由他自己亲自执笔。例如，在杂志创刊的头几年，他所写的文章就包括以下这样一些重要题材：“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继土改之后，实行互助组”；“工业化开始”；“中国经济的道路”；“走向农业集体化”；“人民治理国家”；“中国最大的海岛：台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含义”；“新成立的100万个农业合作社”等等。自1952年到1963年，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共有26篇之多，而且多半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翰笙的这些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对于他所涉及的中国国情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例如，在1952年第3期上“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一文中，他从旧中国封建社会的



阶级关系，说到农民为什么不断起来斗争，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解放后何以能水到渠成地实行土地改革，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以及土改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如此复杂的斗争历史，呈现在对中国并不那么了解的外国读者面前，却似一幅清澈明朗的画卷，一目了然。其实，他能有这样深厚的功底，绝非偶然。早在30年代，他已率领一大批经济学家进行了跨大江南北的、系统的农村调查，并已得出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除土地改革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深知外国读者心目中存在的疑问，因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去释疑解惑，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既不过高估计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已有的知识，时时注意交待背景材料。又不过低估人家的辨别能力，绝不说教，更不能强加于人，让读者就事实自己做出判断。陈翰笙的这些文章，都是直接用英文写的，用字遣词都照顾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效果自然更好一些。

1957年，《中国建设》在创刊5周年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开始驰名于世界。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政界领袖吴努、南非黑人领袖莫西·科坦、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等，都为这本杂志创刊5周年发来了贺电。周恩来总理也为《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亲笔题词祝贺：“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他随后又对这本杂志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要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1958年，毛泽东主席看到《中国建设》后，赞许这个杂志用事实说话，并认为：对外宣传就是应该这样做。

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自1960年起，《中国建设》除英文版外，陆续增出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1978年停刊）、德文版、葡萄牙文版（1963年底停刊）和中文版。为了服务于世界残疾人，最近又与中国盲文书社合作，开创了杂志的盲文英文版，好让新中国的信息及时传达到海外盲人世界。为更切



合当今实际，《中国建设》自1990年起易名《今日中国》(CHINATODAY)。如今，这本已有45年历史的杂志，已成为我国在世界范围颇有影响的主要对外宣传刊物之一。



庆贺陈翰笙所长百年寿辰

刘恩照

陈翰笙老先生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任副所长，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该所是1955年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向周恩来提出，于1956年3月14日请示中央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建立的。当时孟用潜同志任所长，陈翰老、刘思慕两同志任副所长。陈翰老主管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室、图书馆及资料室的工作。本人在翰老领导下工作多年，耳濡目染，深受教益。

翰老长期在国外工作，1951年由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任外交部顾问，曾领导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下属的南亚研究组，1956年并入新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翰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张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来所工作。在孟用潜所长领导下组成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出版、翻译了大量图书、期刊和资料，为我国外交斗争服务。该所出版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刊物在国内外发行，受到各国的重视。

翰老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史、世界史、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国农村调查的倡导者，毕生从事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他忠诚党的事业，关心后学和晚辈，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与使用，潜心指导研究工作。翰老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重视调查研究，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工作，主张言之有据，反对空谈，倡导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其工作、生活安排有序，时间观念极强，不



论会客、教学、研究工作，都准时不误，有时客人未到他就早在办公桌前等候了。翰老学识、外语造诣极深，所中遇到难题就请翰老解决。他被外国专家称为“中国的宝贝”、“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翰老晚年长期主编、出版许多系列书籍和刊物，义务教授青年学习英文，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求教者，他均热情帮助，并推荐许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到国外留学或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素慕翰老所写诗文。可谓诗如其人，诗以言志。今再次从其外甥女童瑜琼处求得翰老诗稿，欣赏、拜读之余，谨录数首，以说明翰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风亮节。

翰老1897年2月生于风景如画的无锡，28岁（1925年）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参加革命，后旋即加入共产国际。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翰老革命一生，忠贞不渝，与从小受到良好的母教是分不开的。对此，其写于1965年8月21日《念母》一诗叙述甚详：

无锡东门城头街，祖传茅屋遗三栋。
家离东林半里许，忆我慈母劳接送。
我父远游湘鄂黔，幸赖高堂管教严。
备课修身两不误，时时苦语作针砭。
教我为人不爱钱，处世应须穷益坚。
勤俭之风宜培养，见义勇为担铁肩。
於今望七虔追思，萱闱遗训注心田。

可以说，翰老生平不论治学、修身、处世、教学等，始终遵守了这些母教。翰老尤重保持晚节。这具体表现在他1972年9月10日所写的《秋日书怀》一诗中：

仰望庭中月，秋风扫葵叶。
所思惜永别，箏声久已绝。



物情常变态，允宜取和协。
求知当宏硕，无心争显赫。
处世贵明哲，翼翼保晚节。

翰老数十年如一日，为党奔走，教学育人，其为人民服务的诚心，在1972年9月1日的《自述》一诗中有充分的表述：

曾揭彭述之背叛，屡防饶漱石翻案。
奉命海外奔西东，当年为党流热汗。
而今幽居东华门，岂能长此成闲散。
幸能授课教后生，年老不甘作懒汉。

翰老是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老寿星之一。他有自己的一套修身养生之道，有其《卫生之道》一诗为证。诗中说：

基本吃素，勿忘走路。
心情舒畅，劳逸适度。

翰老饮食简单，定时，安排合理。每次早晨去看翰老，都见他将苹果用勺子刮汁而食。尽管年事已高，临别时他总是亲自送客到电梯门口，等客人下楼他才回屋。正因为翰老坚持运动，生活规律，身心健康，他才虽已百岁高龄但仍精力充沛，这可从其《人生三乐》一诗中看出：

坚强精力能劳动，敏捷文思如泉涌。
切磋良友得益多，人生如此不懵懂。

翰老对妻子忠贞，堪为楷模。他于1921年与著名摄影美术家顾淑型女士在西雅图结婚，直到1968年淑型因癌症去世以后，忠



贞如初。他1972年1月23日遵照妻嘱，将妻骨灰撒于富春江桐庐的窄溪。为此，翰老作《哭亡妻顾氏淑型》诗曰：

浩荡窄溪送骨灰，凄凄水上我徘徊。
何时物化应作伴，携手夜台笑语陪。

同年10月，翰老迁新居，不由又想起爱妻，作《新居》一首：

新居怜我影，墙花有金银。
庭中望秋月，空忆顾淑型。
暮年赋闲散，犹未达耄龄。
何时投窄溪，应不感伶仃。

适逢陈翰老百年寿辰之际，敬仰著名学者陈翰老品学兼优，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同志无限热爱，对学子谆谆教诲乃至治学、修身风范，他的一言一行都为本人和许多同志所崇敬和景仰。祝翰老，寿比南山不老松！



陈翰老与世界历史所

廖学盛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世界史研究组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成立之后，翰老就与我们世界历史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所筹建和发展过程中，他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做了多方面的具体工作。凡能有幸聆听他的教诲和得到他的具体指导的同志，每当回忆这类往事时，总是富有深情，由衷地表示出对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的敬佩和感激。我因为曾经是世界史研究组学术秘书之一，后来又担任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和所长，在漫长的岁月里，既有机会学习他怎样做人，又有机会学习他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

翰老是一位整天想着多为人民工作，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真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原则，言行一致的革命老人。他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与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紧密相连。在《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翰老写道：“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

长期同翰老共事，现已90高龄的陈洪进同志在《陈翰笙的史



学思想》（《世界历史》，1985）一文中，十分中肯地指出：“他是一位注重革命实践的实干家，倾注他毕生精力于社会形态转化的研究工作。”的确，翰老是非常注重革命实践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年华都贡献给了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反动政府、以建立新中国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1983年发表的《要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三卷）一文中，翰老集中表达了他关于研究目的和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文章中的许多话都是我们在与他接触过程中多次听到过的。他说“我们伟大导师无非是为了革命而狂热地做研究工作的。”因此，他反复对我们讲，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研究工作必须对革命和建设有用。“我们要研究的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样可以建设起来和帝国主义将怎样没落下去。”

由于陈翰老十分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性，所以他对研究人员的合理布局和研究课题的选定特别重视。在60年代初，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可是当时中国史学界对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还几近空白。翰老就出面动员当时尚年轻的三位同志改学拉丁美洲史，并且亲自给他们授课，向他们传授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史的方法，要求他们首先从熟悉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入手，特别要注意研究大种植园制度。其中的两位后来成了我们研究拉丁美洲史的骨干。

翰老在任期间，对研究室每位研究人员的课题都亲自过问。有时为了确定一个选题而与有关人员反复磋商。在80年代，他因年事高不能经常到所里来，但仍然十分关心我们研究课题的确定，常常向所的负责人提出他对选题的意见，有时请有关研究人员到他家里具体商量。他曾提出确定选题的四条原则：首先是要有用；第二是要有材料；第三是承担人有能力；第四是研究者本人有兴趣。在确定选题的过程中，翰老不是简单地为哪个人出一个题目，而是既考虑客观形势的需要又兼顾承担者的专长，通过反复讨论，使承担者切实明白选题的意义，知道从何着手。因此，确定选题的



过程就成了学术讨论的过程。翰老一贯对于课题的精确文字表述十分注意，往往要反复磋商和推敲。

学识渊博的翰老，时刻注意革命事业的需要，经常能够提出一些富有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选题。早在60年代初期，他就向我提出，要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将它列入当时制定的“十年科研规划”。但是由于我们认识的局限，当时没能认真抓起这个研究课题，只好在现在再补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我们所正组织人力，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史进行专题研究。

18年前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翰老提出的一些选题，现在读起来仍然十分亲切。我国的奴隶社会起于何时，它与其他各国的有何不同？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何不同？大英帝国是怎样衰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何新的发展？苏联如何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全部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吗？因为翰老不是随意提出问题，而是根源于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所以必然会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所助益。近十几年，我们已经在翰老希望的一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于不同国家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苏联的变化，特别是其兴亡的问题，我们正集中力量作比较深入的研究。

按照翰老的意见，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世界通史，应该“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应该成为帮助人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应该是“能加强我们的革命信心去改变社会使它向前发展”的正确知识。他要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从“对世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的高度出发，“急起直追”来从事世界史的研究。用翰老提出的要求和标准来检查和衡量我们当前的世界史研究工作，不得不承认，确有许多值得反省、深思和改进的地方。



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不断端正我们从事世界史研究的目的。既非为名，也非为利。既不是当作简单的谋生手段，更不是当作牟取非分所得的敲门砖。而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探求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特殊性，阐明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以使人们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

在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干部要学习世界历史的今天，用陈翰笙这位革命老人的话来鞭策我们自己做好世界历史的研究工作，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我们还面临种种困难，但只要我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团结一致地奋斗不懈，我们就一定会有所作为。

翰老深知，只能按照学术工作发展的规律来指导学术研究，搞好世界史的研究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急于求成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既重视不同层次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注意人才的聚集和培养，尤其是研究人员基本功的训练，又精心选定有条件作的课题开展研究。他反复强调，做研究工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从事的创造性劳动，决不是对已有的成果的照搬照抄。在60年代前期政治运动频仍的情况下，翰老的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指导学术工作的思想，有时不免遭到误解。但是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倍感亲切，对于翰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精神肃然起敬。

他特别强调研究人员要关心当今国际和国内的现实，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动态。他说，他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阅读新到的报纸和重要杂志。他曾吩咐当时的世界史研究室的每个研究人员，分头系统阅读外文专业期刊，并向全室介绍各种学术动态。他严肃地指出：“当前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有的不看报纸和杂志，有的不肯大量阅读过去和最近出版的书籍，在工作上敷衍塞责，因此很难有什么成绩。”

翰老经常强调，要能很好地研究世界历史，必须学好外文，对于新分配来的工作人员，他亲自考核他们的外语水平或者组织有



关人员测试。他一再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提高英语水平，欢迎愿意补习英语的同志参加他主持的学习班。

他要求研究人员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因此，他非常关心世界史所的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他刚到世界史研究室上任，就着手组织室内的同志开展全国各地有关外国历史的期刊订阅和收藏情况的调查，亲自过问图书和外文期刊的订阅工作，并且提供应订书刊的目录。他多次讲到，在一个研究机构内部，决不能轻视图书资料工作，图书资料岗位和研究岗位同等重要，要派有专长的人员做图书资料工作。他多方鼓励图书资料工作人员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安心于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在所的负责人向翰老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往往要详细询问所内工作人员的情况，要求说明哪些人在学术上有发展前途，他们还有什么不足，需要什么帮助。他对中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有时亲自帮助修改文稿，有时将国外朋友赠送给他的书刊转送给有关人员。

1978年《世界历史》杂志创刊，为了办好这个刊物，翰老倾注了很多心血。由于视力不好，他经常请人给他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还不时就某些文章发表评论性意见，向编辑部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在很多年内，他和编辑人员合作，亲自把《世界历史》每期的目录译成英文。

翰老一贯重视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1962年和1963年，他先后布置世界史研究室的一些同志撰写外国历史知识小丛书，并以他是如何撰写《印度莫卧儿王朝》一书为例，对我们作言传身教。他要求承担写作小丛书任务的同志不是简单地编写，而是当作一项研究任务来对待。1979年，他接受商务印书馆的聘请，聘任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之职，以便为普及外国历史知识多作贡献，使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能从外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商务印书馆负责外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张振宝同志多次对我谈到，翰老对工作的极大热忱和极



端负责的精神，深深使他感动。翰老的工作方法是，每星期抽出半天时间，由张振宝向他读一部外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的书稿，边听边议边改。从1979年起，他亲自审阅了197册丛书书稿。不仅如此，翰老有时还亲自出题组稿。

在60年代，翰老无论是在寒冬酷暑，总是准时到世界史研究室布置工作，商讨科研业务中的问题。另外，他还尽量抽出一些时间单独个别指导或听取意见。到80年代后期，他的体力，特别是视力，已经不允许他经常到所里来指导工作。但是，他一直十分关心所里的一切。或者打电话询问，或者请有关同志到他家里交谈。在听取关于世界历史所的工作情况的汇报过程中，他老人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还能为世界史所做点什么。其实，翰老为发展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已尽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可是，这位老人还经常说：我是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不多做工作，就成了不名誉所长了。为发展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推进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工作而不断作出贡献，这是陈翰老的一大心愿。



翰老的科研思想

陆国俊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人们给予热心的关注和辛勤的培育。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如此。翰老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成长密不可分，他正是这门新兴学科的培育者。

长期以来，我国对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既没有研究世界史学科的专门机构，又没有一支坚强的世界史学科的专业队伍。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我国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世界史研究组，1962年发展为世界史研究室。当时室里只有10余人，都是刚从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学生或研究生。初来乍到，这些新兵们很缺乏研究经验，只是在“打基础”、“练基本功”的思想指导下，有的闭门读书，有的翻译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动态，还有的写些小文章，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自流状态。

1960年，我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了世界史研究组。与其他同志一样，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世界史，或怎样研究世界史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知之甚少，或根本无知。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一叶小舟，迷迷蒙蒙，随波逐流，没有前进的正确方向。60年代初世界史研究室的发展状况清楚地表明，世界史研究室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聘请一位确有世界史学术专长的学者来加以指导。从1962年起，翰老就开始担任世界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至今仍然是世界史所的名誉所长，前前后后，



断断续续，将近40个春秋，与世界史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

翰老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他渊博的知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孜孜不倦的育人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我们每个人都十分钦佩。在所里，翰老主要是负责指导我所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我所研究人员逐步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明确了迅速提升自己研究水平的具体步骤，开始迅速地成长起来。翰老在世界历史所的建设和发展中费尽了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翰老指导我们科研工作是十分具体的，小到怎样看书报杂志、积累资料，大到怎样审读书稿、著书立说，乃至世界史学科怎样为国际斗争服务，等等，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翰老的科研思想究竟是什么？在这里难以一言表。我仅从中择其3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社会实际选择课题并服务于社会

翰老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究竟什么是科研？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社会服务。”翰老仅以这样区区几个字，就言简意赅地揭示了科研的深刻涵义。

在这里，翰老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社会现实问题。翰老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写历史书，而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社会现状是历史的延伸，不了解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现状，更不能正确预测未来。要真正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正确预测未来，就必须追根溯源，研究历史，才能对社会现实问题给予正确的历史回答。

翰老进而认为，要发现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就不能仅仅靠书本，而必须深入社会实际，及时注意当时国内外社会发展态势，关心学术领域的研究动态，以从中发现其最重要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并服务于社会。



翰老正是以这一思想指导我们的科研工作和自己研究工作的一生。解放前，他的研究主题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中国这个最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解放后他的研究主题又着重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现实问题。可以说，他的最大研究主题是反映了中国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任务，也反映了他为社会服务的不同科研内容，并造就了他这位一代学术宗师。他以同一思想指导我们科研工作，同样取得了明显效果。

二、不畏艰难而又必须重视困难， 具备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

翰老经常对我们说，科研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我们每个科研人员有明确的目标，方法得当，经过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做出理想的成绩。但我们又必须重视它，因为它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敏锐观察、埋头钻研、深刻分析、勤奋写作的优良素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求每位研究人员要“坐冷板凳”或到“现实生活中去”，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翰老不仅在思想上进行引导，而且在实践中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他来所后，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工作，经常亲自选择和推荐图书杂志，并对图书资料人员提出严格要求，作到以较少的图书经费购到有价值的图书，最大程度地满足科研人员的需要。他对科研人员，则根据不同层次、不同要求进行帮助。对正在“打基础”的研究人员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找他们谈话，在前一个星期给他们布置看哪些专业书籍或杂志，而在后一个星期让他们向他汇报看书心得，例如该书提出了哪些观点，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该书引用的材料有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等等。对于那些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科研人员，又耐心地教他们怎样写文章，从观点到材料的运用，乃至文字的修改、加工，都提出修改意见。翰老认真工作的态度，以及对我们的严格要求，至今还记忆犹新，使



我们所每个人受益非浅。

三、科研不忘群众而服务于群众

重视通俗读物的写作，是翰老科研不忘群众而服务于群众的具体体现，也是翰老科研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般地说，科研产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严格的专业用语与分析方法写成的专业著作，目的主要是给学术同行及其他专业的学者介绍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另一种是以尽可能简明生动的语言写成的通俗读物，目的主要是深入浅出地向社会青年和群众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知识。

作为当时世界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究竟可不可以写通俗读物？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中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级研究机构，只应该写专业著作；另一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主要应该写专业著作，但亦可以写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翰老来所后则明确支持后一种意见。

翰老虽然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发表了大量专业著作，但他又非常重视写通俗读物。他不仅自己写诸如《人类的故事》、《印度莫卧儿王朝》等通俗读物，而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丛书，在群众中起了重要影响。

翰老为什么要写通俗读物呢？正如他多次所说：“那是为了我们的青年一代呀！”“青年人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非常贫乏。不了解世界过去和现在，就很难建设自己的国家。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就不会爱惜我们的社会主义”。认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教育好下一代同样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正是在翰老这一科研思想的启迪下，室里有些科研人员就陆续承担了撰写《外国历史》丛书的项目。这不仅使我室初级研究人员为培育青年一代贡献了力量，而且也打破了“大著作写不了”、“通俗读物又不能写”而闭门读书的学术风气，逐步走出了“边干边



学”的正确研究之路。

归纳起来说，我认为从社会实际选择课题而服务于社会，不畏艰苦而必须具备刻苦、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科研不忘群众而服务于群众这三点，虽不能说是翰老科研思想的全部，至少可以说是翰老科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翰老的一生，正是他认识和实践这些科研思想的一生。



陈翰笙：具有传奇经历的革命老人

田 森

值此庆祝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李大钊生前战友陈翰笙同志诞生100周年之际，无限思潮涌上我的心头。

翰老早在20年代留美时期就参加了进步活动，回国后于1924年开始追随大钊同志从事革命工作，先后被派往第三国际和海外各地，出生入死，成绩卓著。他曾送给我一首诗，其中有“奉命海外奔东西，当年为党流热汗”之句，由此亦可见往事之艰辛。他在长期旅美的日子里，为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曾做过突出的贡献，当年上至白宫，下至普通群众都同他有广泛的交往，他正通过白宫的智囊人物欧文·拉铁摩尔对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举措施加影响，他四处宣传说：“国民党已腐败透顶，不堪救药，共产党才是新生的不断壮大的力量，且并不可怕。”他还受党的委托，协助宋庆龄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艾黎同志生前曾对我说，陈翰笙深受宋庆龄的尊敬，爱泼斯坦同志也曾对我讲过类似的话。难怪小平同志在悼念宋庆龄的讲话中说：宋庆龄“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为此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在座的陈翰笙同志的驳斥。”邓小平在悼念宋庆龄的讲话中特意提到陈翰笙，这种做法是不寻常的。

作为一位学者，陈翰笙不仅治学严谨，坚持真理，而且非常



勤奋。他既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又是卓越的国际问题专家。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他尚著有专著20余部，论文200多篇，他的许多学术著作都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赞扬了他在白区领导的农村社会调查。到了晚年，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驱依然非常关注中国社会学如何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前些年，他多次热情地建议我写一部《新社会学》，把传统和创新辩证地结合起来，为此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鞭策，令我深为感动。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磨练出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物质享受从来看得很淡。一个一心献身事业的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享受呢？不少人关心他的日常生活，关心他何以能够长寿？从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不饮，生活极为规律，按时起居，饮食清淡且有节亦有时，更不大吃大喝。他惟一的一点嗜好就是喜欢甜食，这可能同他在国外长期生活有关，但是他并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些老年人的常见病。至于穿，他就更不讲究了。他如今穿的那件深色呢大衣，还是50多年前在国外买的。1951年从海外归来，他一直住在东华门一所普通的房子里，每年冬天都要靠蜂窝煤取暖，直至搬到复外大楼前住了30多个春秋，可他却毫不在意。他也主张吃“补药”，不过那是特殊的补药，即辛勤劳动带来的工作上的成果，这对他说来比山珍海味更具有补身之效。他很少为自己打算，真是无私心地宽。有人一定要我概述他的长寿秘诀，我说了三句话：“勤奋、心宽、生活有序。”

为了人类的进步，他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可在文革中他刚获解放等待分配工作时，他已经承受不了那种在家赋闲的生活了，于是便在家中办起了免费英文学习班，他用特殊的教学方法造就了大批有为的青年。待到74岁那年，他本该离休了，可他却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他要扑在办公桌上死去。“四人帮”垮台后，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立即聘他为顾问，后又改任世界史所名誉所长。重新工作给陈翰笙带来了真正的春天。他整天忙



着各种学术活动，亲自带研究生，口述供发表的文章，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审定大百科全书中的世界史部分，接待来自世界各国和国内的来访者，为不相识的青年朋友改稿，给中央领导就文化出版工作提建议，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可在那一段时期我常看他脸上浮着的微笑，我知道充实而又紧张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活力和幸福。可是如果有谁翻阅一下他80年代的工作时间表，你必定会大吃一惊，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排得满满的，这哪里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能够负荷得了的工作重担呢？但他不仅这样做了，还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年纪大了，一分钟当做两分钟用才是。”看来，他认为还应当马力开得更足一点才好哩！1993年他大病了一场，经受了几个月的磨难，后来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当我们又一次相对而坐漫谈未来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好了，我需要做工作！”而我的片刻的沉默虽然令他不快，他又补充一句：“我需要做事情、教学生，如果我对别人有所带动的话，我活着有什么用呢？”看来，非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绝不甘心终止工作的。此后，翰老作为我们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的顾问，曾多次参加我们举行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研讨会，他以近百岁的高龄亲临指导，令与会的中外知名人士无不深深感动。特别是他不仅仔细地听了会议的发言，而且事后还对讨论的问题发表中肯的评论，令我们深受教益。

对于陈翰笙博古通今的渊博知识我是非常佩服的，但我同样敬仰他的人格，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极端厌恶双重人格的人，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同他促膝谈心时，你都可以享受到一种纯真的友情，感受到一颗诚挚的心的跳动，而他的精神更令每一个有幸而接触到他的人深深感动。他倾尽毕生精力为振兴中华而忘我地奉献，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官，处处帮助别人而从不希望得到回报，特别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更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革”中顶着巨大的压力帮助刘少奇孩子学习英语的动人故事，其实那不过是许多动人故事中的一个罢了。



在知识界，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一些优秀的人物。像陈翰笙这样毕生追求进步、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德才兼备的学者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又一种典型，这对于我们贯彻六中全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是有好处的。生活不可能永生，但我相信，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陈翰笙的精神却将永存。



百岁老人 一生清白

沈自敏

陈翰笙老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即公元1897年2月5日。今年1997年2月5日，是老先生的百岁期颐之年。敬仰这位老人的小辈后辈，充满着幸福感，祝贺他健康长寿。

陈老先生是一位赤诚的革命家，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又是卓越的国际问题专家。他治学严谨，坚持真理，十分勤奋，有专著20多种，论文200多篇。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革命工作共时同步，具有深刻性、预见性、整体性、实践性。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近年来常常引起注意讨论的问题。倘若认真了解探索陈老先生近百年的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政治上的风云幻变，常常向学术界提出种种质疑和问题，那末远见卓识的学者，责无旁贷地应该作出深刻的分析，较切实的建议；这需要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赤诚的革命热忱。陈老先生是这方面鲜明的典范。

在陈老先生的著述中，没有专门论述史学思想的文章，可是实际上他把史学思想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并且贯彻到他的行为之中。他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而人生观世界观又取决于他的历史观。他的那些现实性很强的文章，常常带有历史的分析，使用史家的笔法，前因后果，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在他看来，历史观是决定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当前，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教育是根本，而历史教育，特别是世界的教育，更具有重要的价值。陈老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所进行的两项规模相当宏大的研究工作：南亚农业区域的研究，华侨史资料的汇集，他都明确的指出其“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不仅如此，陈老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例如，他为年轻的学人义务举办“英语培训班”，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世界历史研究所有陈老先生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真是大幸运。

陈老先生的这种言行一致的高贵品格，在《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有生动的记录。这一本书是陈先生在耄耋之年视力严重损伤的时期，由他口述，经任雪芳同志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本书篇幅不大，仅有200多面，但是很有深度，又极有风趣，娓娓而谈，婉婉动听，既有儿时的童真，又有期颐之年的志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陈老先生一生保持着这种赤诚的至德。从这一本书中，可以得到一些具体的启示。

先就这本书的书名说起，它标示为《四个时代的我》，这原来也可能标题为《四个时代与我》，似乎更习常易懂，然而书名却用了“的”，而不用“与”。一字之差，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从书名和书的内容来说，陈老先生很明确为一至理，即：个人是从属时代的，个人应该服从时代的需要，就陈老先生毕生的经历来看，他是很明确这一道理的，以此而律己教人，培养自己的品德。

陈老先生的“道德观”，极其高明，值得人们毕生追求，同时又极其平淡，乃是人人可以实践的守则。他说：“所谓道德，是社会上提倡的，一致公认的好的行为。道是行为，德是成绩。成绩好是有德，成绩不好，便是缺德。”这样，就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操作、个人的行止，提高到道德要求的标准。现代哲学家弗罗姆进一步说：“所谓道德，就是个人力量的发挥，恶就是无法发挥自己的力量。恶的本质就是无能。”这样，就和我们当前提倡的“精神文明”、“职业道德”联系起来。



以此律己察人，人间的是非善恶原来是不难辨别的。人生一世，经历复杂，这是经常遇到的日常事务，尽管有时会遇到影响终身的变故，如何对待自己一生的正确和错误，陈老先生也具有既深刻又平凡的至理。他一身对他人的济助和援手，不胜枚举。陈老先生从不计较，瞬即淡忘，一经悬沟，他往往答道：“记不起来了！”他的一名随班学习英语的青年学人，一直认为他“谦逊过甚”，他却从容说道：“这些事，真是记不住了。你知道，做对了的事大都不容易记住，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应该去做。倒是做错了的事，很难忘记。”陈老先生的答话，既深刻又平凡，确又是至情至理，可以作为人生圭臬。他的那位学生，事后动情地说：“这些话，似乎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却使我的心灵为之震动。”

陈老先生对小辈后学，一贯仁厚至诚，即使对同业学者，以至国际友人，照例心口一致，诚意切磋，他对国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著述中的偏差，亦及时提醒。例如有些国外的经济专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封建残余，只有少数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含有多种多样的殖民地的特征，事实上，封建主义的顽固性和强烈性大部分来自殖民主义。陈老先生的这些评介，不仅是对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评介，实际上也具有指导意见。而对国内的一些读者，在参读这些著作时能有所取舍。肃清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影响，是陈老先生毕生努力的指向，60多年前，他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1期《新年的梦想》一栏里，就提出这个响亮的口号：“帝国主义因此寿终正寝。”这个期望，在最近出版的《陈翰笙著作1919—1949》英文版的扉页中又光灿灿的刊载，且有文呈广阔的视野：“我希望能实现我促进文明进步的理想。”陈翰笙，中国，北京，1995年10月10日（“If My Dream reflects my hope that May help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 wish to realize it”Chen Han-seng, BeiJing, China, October 10, 1955）

近来，我们在报刊上常常谈到不少百岁老人真诚朴实的人生



历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之中，他们的嘉言懿行也许能平息一下浮躁的心境。这是人间的瑰宝，这是国家的祥瑞。记得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的话，他说：“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的意义，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许要比在单纯的才智方面的还要大。即使就才智的成就来说，也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这远远超过通常可见到的其他因素。”陈老先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确在于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正取决于他的品德操守。

司马光说：“德者，才之师也”。信然！

陈老先生的百岁诞辰，欣逢佳节。诞辰的前一日是“立春”节，新春来临，大地春回；诞辰的后一日是“除夕”，年年纳福，岁岁平安。我们欣喜的看到，陈老先生已跨过期颐大寿：“巍峨岩岫，山岳之本；德行文学，君子之本”。陈老先生博大宽厚，生活充满欢乐幸福，期颐老人，将愉快的励进 21 世纪，这伟大的新世纪。



我说陈翰老

俞 源

一个人活100岁不容易，一位社会科学家活100岁更不容易。一个人要成为社会名人不容易；一位社会名人，一辈子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在和平建设时期，完全不计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不渝、毫不张扬地为国家的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身体力行，奋斗不息；退居二线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教诲莘莘学子，为祖国培养人才，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实在少有。这样的人，是真正的革命者；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是名符其实为社会进步而工作的社会科学家；这样的教育者是言行一致的人之师表。百岁老人陈翰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陈翰老当然是名人，他却认为自己很平凡，更显其哲理之通达，人格之伟大。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永远是我的好老师。陈翰老的一生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极有价值的“人生哲学巨著”。读这样的“巨著”，要写一篇读后感，长篇大论未见得能说清楚，一篇短文更不可能说清楚。但是，作为他的学生，欣逢他百岁华诞，理应说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敬意。这些话，只能算是读这部“巨著”的随想录吧。

我说，陈翰老这一百年的人生轨迹，概括起来是，忠于一个理想；经受了三大考验；做出了三大贡献。

忠于一个理想。他始终追求兴邦富国之路，恪守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陈翰老认为道德和理想是分不开的。我说，陈翰老的理想是从他高尚的为人道德产生的。据陈翰老说：“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与他接触不多。我这个人的脾气、性格、道德观念都是从母亲那儿来的。”

他母亲常对他说：“人是穷的，心是铜的。”意思是说，人穷，但骨头要硬。教育他“不要见到大佛‘得得’拜，见到小佛踢一脚。”意思说，为人要正派，不要势利。还教育他要以诚待人，要敢于坚持真理，见义勇为。正是由于他有这种道德观念，所以，小学时，他的老师给他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将领的故事，讲炎黄子孙要热爱养育我们的华夏大地，他能听得进，记得牢。后来，他在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创办的长沙明德中学上学，受到了一些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老师的影响。比如，历史老师讲述鸦片战争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讲述清政府丧权辱国、国家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与现状，激发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和腐败的清政府的思想，无疑是对陈翰老民主思想的启蒙。但是，探索兴邦富国之路的少年陈翰笙，最初渴望的还是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造福于祖国。所以，他毅然离开祖国，到美国求学。陈翰老革命思想的升华是在认识李大钊同志之后。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资本论》，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从而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一经走上革命道路，陈翰老非常忠诚于自己的理想。此后，他无论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处在工作的顺境还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在退居二线后，他都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遵循着全心全意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战斗着、工作着、生活着。

经受了三大考验。一是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考验。在那个年代，他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抨击时弊；他不避危难护送和营救革命同志，因此，他三次险遭敌人逮捕；第一次是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逃亡日本；第二次是1935年在上海



海，经史沫特莱等人掩护，才逃往苏联；第三次是1944年在桂林，由于李济深等人透露蒋介石政府将逮捕他的消息，他逃往印度。二是建国以后名利地位的考验。新中国建立，共产党取得了领导权，许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同志，担当了领导职务，这是党的工作需要，是很自然的。但陈翰老认为自己是一名学者，只要为党工作，人尽其才就可以了，所以，虽然中央领导同志提议他当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他都未承当，即使负责《中国建设》英文刊物的创办工作，他也推荐另一同志当主任，自己只当一名副主任，其无心做官、淡泊名利，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三是“文革”十年浩劫中的人格考验。他坚持真理，爱憎分明。面对“造反派”，他忍辱负重，不屈斗争。他憎其所憎，对康生、“四人帮”嫉恶如仇。在被揪斗时，有人劝他去找康生，但他认为，正是康生、“四人帮”这伙人祸国殃民，“我岂能卑躬屈膝去求他？”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对老一辈革命者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被糟蹋，痛心不已，所以在英语班教学生用造句的办法怒斥“四人帮”。他爱其所爱，身处劣境，仍关心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年轻人都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为无事可干、无学可上的青年办起外语班，甚至不避其祸地招收当时的所谓“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同志的孩子和万里等同志的孩子。

陈翰老的三大贡献是：其一，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一方面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制造反革命舆论，反对土地革命，进行文化围剿。陈翰老从1929—1934年，在大江南北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村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主要问题。在中国农村，农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从而驳斥了中国托派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谬论和蒋介石政府“农村复兴”的谎言。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应该说，这是陈翰老对中国革命事业最突出的贡献。此后，1946年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陈翰老在美



国发表演说和文章,揭露蒋介石统治的腐败性,声斥美国政府的援蒋反共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这些工作,在美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另外,人们不应忘记:1941年1月,是他第一个向国外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1942年在桂林,向外国记者公开了廖承志同志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消息,从而使何香凝、宋庆龄得以及时营救。这些工作,也功不可没。其二,学术贡献,广义地讲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关于陈翰老的学术贡献,陈洪进教授于1985年发表过“陈翰笙的史学思想”的长篇文章,该文讲到陈翰老的“四个系列著作”,“八部代表作”。我觉得概括得很好。当然,即将出版、由李新玉博士主编的《陈翰笙1919—1949文集》(英文版),收集了陈翰老许多未发表的很有价值的文稿,应该说是又一部代表作。我认为,正如陈洪进先生的文章所指出的,陈翰老的学术指导思想和学术道路,是陈翰老对社会科学事业更为重要的贡献。陈翰老的学术研究始终是为他的革命理想服务的,是和革命形势相联系的,是顺应革命的需要进行的。用陈翰老自己的话说:“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的目的或动机更加重要。如果目的只是为了写作,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方法。”反之,他为革命事业需要而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不是“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而总是走向社会,脚踏实地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的学术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就是他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对于今天我国社会科学界,是很有意义的。三是教书育人,培养了大量对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才。在《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已经讲到,早在20年代,陈翰老就培养了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卓越贡献的学界前辈,甚至在他身处劣境的“文革”中,还在英语班培育了300多名学生。“文革”前,我有幸和陈淑琴同志在陈翰老指导下学习“印度近现代史”,其间,除了在学业上得到许多有益的指导而外,在做人做事方面也留有难忘的印象。其一,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热情关心。记得在我们上第一堂课时,他就要我们背出印度史大事年



表,讲述印度地理概况。我们讲不清楚,他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们,并开列参考书,要我们认真阅读。以后,学习每一段历史,都要求我们阅读有关书籍和文章,写出心得笔记。粗粗统计,4年间,我一共写了17篇文章,每篇他都作过批改。那时,我们住在北京大学,到陈翰老工作单位或住处上课,路程较远,陈翰老怕我们下课吃不上饭,常常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席间言谈,陈翰老夫人顾淑型先生的和蔼可亲,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其二,言必信,行必果,做事一丝不苟。陈翰老给我们约定上课时间,我们早到、迟到不得超过5分钟,否则都要受到批评。他常说,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他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在约定给我们上课时间后,偶然碰到会议或他要到外地视察,不能如期上课,他打电话找不到我们,就打电报,这样的事,发生过不只一次。当时,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同窗无不羡慕地说:“你们真幸运,遇到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又是这么负责任的导师。”人无完人,陈翰老也有缺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带一点迂腐的书生气。他做人,实实在在恪守“害人之心不可有”,但他往往忘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如今复杂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陈翰老总是以“君子之心”度人,结果确实实上了一些当,吃了一些亏。但是,对人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不是辩证法,实际上陷入了形而上学,本身就不算是完人了。总之,我认为,陈翰老在革命品格、道德文章的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我很好地学习的。

今年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我想,宣传和学习革命前辈的理想、情操和优良作风,应该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翰笙姨父与我们

孙少礼 孙幼礼 孙稚礼 孙小礼

我们亲爱和崇敬的姨父——陈翰笙已是足足 100 岁的老人了。在祝贺姨父百岁华诞的时候，我们回忆起几十年来与姨父相处的岁月，难忘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我们和姨父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外祖父顾栋臣只有两个女儿，母亲顾淑礼和姨母顾淑型。外祖父 44 岁就去世了，外祖母一直住在我们家，由父母亲和姨父母赡养。母亲和姨母感情极好，总愿意住在一起。姨父母长年在外奔波，就把我们的家视同他们自己的家，就把我们这一群姐妹兄弟视同他们自己的子女，给予我们悉心的关怀和爱护。

一、姨父关心我们的学习，却从来不问我们的分数

20 年代姨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就住在我们家（北河沿 42 号）。那时小礼还没有出生，我们三姊妹年纪还很小，正在上孔德学校和孔德幼稚园。记得姨父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很早起床，天热时坐在院子里阅读书报，天冷了就在室内台灯前看书，直到吃早点。姨父每天吃饭是定时定量的，他看到我们吃饭时狼吞虎咽、筷子打碗的那副吃相，一面摇头，一面开玩笑说：“怎么，你



们一边吃饭一边刷马桶？”大家都笑了，以后我们吃饭都文静和文雅了。对我们的不良习惯，他常常用这种幽默的口吻来纠正。

姨父常在这里静静地工作，我们走过他的窗前，不是听到沙沙的翻书报声，就是嘀嘀哒哒的打字机声。为了不打扰姨父的工作，母亲总嘱咐我们不要在院子里吵闹。然而他在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或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也常和我们一块谈笑。姨父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希望我们从小养成读书的兴趣和习惯。他常问我们：今天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上了什么课，读了什么书，老师说了些什么，作文写些什么……但是从来不问我们考试得了多少分数。

我们都喜欢姨父，都乐意为他做点事情，例如替他到小店买邮票，抢着为他把信投入邮筒……姨父也很喜欢我们，尤其喜欢少礼，夸她用功，喜欢历史，作文写得好，要少礼叫他“寄爹”。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都跟着称姨父为“寄爹”了。姨父也很喜欢顾诚（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说他聪明、活泼、爱问问题。有一天姨父抱着诚弟拍了一张照片，笑着说：“寄给我的母亲，说是我的孩子，让他们高兴高兴！”

姨父非常重视对儿童的全面教育，经常和母亲谈论并介绍国外的儿童教育情况。记得一天是少礼的生日，姨父买了苹果、葡萄等水果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弟妹们见了都抢着要吃，少礼用手把着不给，还说：“这是寄爹买给我的！”大家又哭又嚷，闹成一团。事后姨父知道了，在星期天，他带少礼去公园，一路上讲了好几个小故事，说明要团结谦让的道理。回家时，姨父又买了水果，要少礼主动分给大家吃。这以后，少礼总以大姐的姿态关心照顾弟弟妹妹，直到如今。

二、在姨父影响下母亲成了地下工作者

姨父母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姨父为共产国际工作过，在国



外转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们当时年幼无知，但至今仍记得一些事情。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姨母是北京艺文中学教务主任，带领学生上街，姨父约母亲同去参加，母亲目睹了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的惨案。在姨父的影响下，母亲日渐同情革命，并协助他们做一些革命工作。姨父母也很尊重母亲，各种事情都与母亲商量，使母亲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们曾教母亲说英语，当姨父母的外国朋友来电话时，母亲也能接电话并把一些关键字音记住，再转告他们。

姨父为我们请过一位家庭教师，叫张挹兰，她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女学生。张老师每天晚上来我们家两个小时，检查我们的功课，指导我们读课外书，做课外作业，为我们讲解各种问题。

1927年春天，姨父曾让母亲到苏联大使馆与隐蔽在那里的李大钊进行联系。李大钊被捕以后，母亲化了装去监狱探视，为姨父给李大钊送信。这时，姨父母处境险恶，躲住到史家胡同，只有母亲知道他们的地址，常带些衣物食品和报刊信件去看望。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我们的教师张挹兰。4月28日，她同李大钊一起被处刑，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张老师的妈妈极度伤心，弟妹年幼，就由我们的母亲代表张老师的家属去收尸，料理后事。后来姨父的好友高仁山（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艺文中学校长，也是我们的表姨父）又被逮捕和杀害，当时母亲赴刑场，见到了高仁山英勇就义的情景，并帮助收尸和处理后事。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姨父母不宜公开活动，母亲就想方设法为他们掩护。有时母亲给我们一两个铜板，要我们到附近店里去买点东西，顺便看看有没有和尚或什么人蹲在外面大便或干什么。我们心里明白这是要我们看看外面有没有可疑的坏人。记得母亲曾好几次在院子里轻手轻脚地烧一些书本，压着小火怕冒出院外，我们知道烧的都是姨父的书本信札。不久，姨父母辗转去了苏联。



1928年5月，姨父母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工作。他们时时关心我们的学习，姨父写信说：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希望少礼能进一个好学校。后来她进了师大附中。那时姨父母不在北京，却常介绍一些友人来我们家。他们曾介绍一位女青年陈志远到北京艺文中学读书。一天，她在街上进行宣传而被逮捕，她说住我们家，警察就押着她来我们家搜查，母亲机警地指着我们住的房间说：这就是她的卧室。警察一无所获，索然而去。姨父的好友王寅生（后来与我们的表姨陶宇珍结婚）在北京被捕，母亲去探望他，出狱后暂住我们家里。被土匪绑架的查良钊，被赎放后也来到我们家，他满面长着胡须，好疲惫的样子。还有张锡昌、刘思慕、张法祖等人，母亲都一一热情接待。我们的母亲实际上已成为姨父母朋友圈中的重要一员。

三、与姨父母重聚在上海姨父 同我们谈学习历史

日军侵占东北后，北京吃紧。1932年底我们家迁到南京，先到上海小住。在上海我们又和姨父母见面了，少礼、幼礼和稚礼留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住校读书。那时姨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还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长，他正领导着地跨南北大半个中国的农村调查，工作十分忙碌。姨母则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姨父只要在上海，就约我们周末去他们的住处——中华学艺社。几乎我们每次去，他都忙着看材料或者打字，我们静静地等在那里，看他拿给我们的报纸文章，直到饭后他才与我们谈话，询问我们在校读书学习和活动的情况。记得有一天晚上不知不觉地谈得很晚，学校已锁大门，我们回不去了，只好住在那里。姨父说他睡在地上，让我们三人与姨母横睡在床上。我们还未上床，姨父已躺在地板上，以书代枕呼呼入睡。

姨父生性活泼爱动，虽然工作非常紧张，也能忙里偷闲去公



园走走和看望朋友。有时他带我们一块到公园玩，边说边笑很是高兴。一个假日下午，姨父应约去外国朋友史沫特莱家喝茶，把我们姊妹三个都带去了。史沫特莱一见我们就用英语说：“唉呀，都这么大了！”她在北京时见过我们多次，因为姨父的朋友来家里找姨父，门铃一响，总是我们跑去开门，并把客人领进来，史沫特莱就是常到家里来找姨父的许多外国朋友中的一个。那天她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问我们很多有趣的问题，都由姨父作翻译。

姨父很关心我们在学业上的想法，有一次他问我们将来打算学什么，少礼说想学历史，幼礼说想学医（这时稚礼已转到南京女中）。姨父听了很高兴，他跟我们讲起他年轻时想以科学救国，到国外学园艺，因高度近视看显微镜困难而转学地质。但眼睛看石头标本仍有困难，可是他的记性特别好，所以老师建议他改学历史。他对我们讲了许多学习历史的体会，他说学历史不是为写历史书，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但要学中国史，还要学外国史，读外国史可以大开眼界，各国之所以有不同的社会发展情况，就与各国的历史有关。他说一个国家强盛起来，有它的内外因素，对这些因素必须有清晰的了解，才能找到救国的方法。他又讲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他为什么进行农村调查，等等。我们听得很有兴趣，印象很深。

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春，姨父母又因工作需要去日本了。他们在日本时行动很不自由，受到警方监视，于是约母亲去东京，能以陪伴母亲游玩为由外出活动。母亲在东京住了两个月，回来后告诉我们，姨父利用在日本的时间撰写了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文章和著作。

姨父母为革命而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1935年春因发生意外情况，他们不得不离开日本，再度去苏联，途经上海时，曾约母亲会晤。1936年他们又从苏联去了美国。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却时时刻刻关心着祖国和人民，关心他们在国内的朋友们，非常希望读到我们的信。当时抗日浪潮高涨，我们姊妹都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参加



读书会、歌咏队、宣传队，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这些都是我们给姨父母写信的内容，并尽可能告诉他们一些朋友们的信息。

四、宋庆龄一大早打来电话，希特勒进攻苏联了

1937年我们全家搬到了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大后方。少礼和幼礼被列入了黑名单，必须离校隐蔽。姨父母那时已在香港，得知此事，马上写信介绍少礼和幼礼去找“中国工业合作社”东南区办事处主任，经他们帮助，两人绕道江西、广东南雄到了香港，与姨父母又聚会在一起了。

刚到香港不久的一天，姨母正生病在家，有一位客人敲门，幼礼开门后，姨母高兴地说：“啊！是孙夫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可敬的孙夫人——宋庆龄。她亲自来探望姨母，并与姨母谈论了为新四军募捐的事。姨父母与孙夫人来往很多。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还没有起床，幼礼接到一个电话，听出是孙夫人，立即叫起姨父。姨父接完电话转身告诉我们：希特勒进攻苏联了！他披着睡衣，马上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把这个重大消息一一通知朋友们。

当时姨父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工作，还帮助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宋庆龄是名誉主席，姨父是执行秘书，姨母也在“工合”的办事机构工作。那时所有从海外来的捐款都通过“工合”分发到抗战后方和解放区。姨父还办了《远东通讯》，这是对外宣传的英文半月刊。每期刊出，姨父都带一份回家给我们看。

皖南事变后，许多社会文化名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姨父经常与他们商讨各种事情。记得有一次，金仲华、刘清扬、冯和法等十来人来到家里，商量要在香港办一所学校，讨论得很具体。他们说干就干，很快在九龙选好了校址，成立了“立华女中”，立即招生上课。刘清扬任校长，姨父等是董事。姨父让少礼去立华



女中教书，兼管教务方面的一些工作，并且住在学校里以便照应一些学校的事。每周六，少礼从九龙过海回家。晚饭后，我们常帮助姨母把一些很美的手工刻花图贴在印好的卡片上，作为新年、圣诞贺卡，也是为新四军募捐的一种义卖小商品。姨父则坐在一边翻看报纸，也与我们谈天。偶而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可是电影一开演，姨父就打瞌睡，甚至声音很大地打呼噜了。姨母推醒他，可他很快又睡着了，我们觉得他实在累极了。

五、太平洋战争爆发，姨父母和我们被困在香港

为了给新四军和解放区募捐，姨父母为《保卫中国大同盟》筹办了一个大型嘉年华会，用地面积很大，装备了一个大游戏场，有跑马转盘、空中客车、翻斗秋千等，周围设有各种小商摊位。姨母忙着许多具体事情，幼礼帮着做些零星小事。当时姨父已为幼礼联系好，随一位沈大夫运送军需、医药用品去苏北解放区。因为幼礼即将去解放区，姨母特意带我们上街品尝广东风味茶点，还去逛了一次香港山顶花园。

1941年12月，嘉年华会办得正热闹，临行前的幼礼也在会场帮助姨母看守“工合”摊位。姨母因感冒提前回家时嘱咐幼礼把她的药带回去，可是幼礼却忘记了。第二天幼礼一大早起来独自赶到会场取药，只见人们都在慌忙收拾摊位，“工合”老工友说：“你来干什么，快回去！”听得人们说：“日本军到九龙了！”街上拥挤的人群神色惊慌，公共汽车没有了，店铺在纷纷上闩……幼礼拼命往家跑，家住在半山的罗便臣道。这时山上是英军，山下是日军，已开始接上火，炮弹从头顶飞过。幼礼满头大汗赶到家中，遭到姨父母好一顿训斥：“你这小赤佬跑到哪里去了，出去也不说一声，打仗了……”从这一天起，我们四人就被困在屋子里了。姨父怕门窗玻璃被炮弹震破，就把报纸和书本裁成纸条，满贴在玻璃门窗上。房东看了很害怕，担心是些“有问题的书报”而



引起麻烦。

不几天，炮声停止，英军投降了，日军更加肆虐，姨父母的朋友们躲起来，音信全部断绝。一天晚上，一位朋友匆匆来找姨父，要我们立即离开。他领我们到了一所学校，在一间空教室里，用课桌拼起来当床睡觉，我们当然睡不着。次日一早往窗外看，日军已驻在对面的楼里。姨母果断地要我们姊妹立刻离开，我们跑到了一位学生家里。果然我们刚走，几个日本兵就来了。姨父当时已剃了光头，穿着一身旧长袍，一双旧布鞋，装成这所学校的看门人，姨母也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总算平安无事。之后姨父的友人张法祖又把我们带到一户人家的厨房过道里暂时住下。过道没有灯，白天靠两边的门开着可透进亮光，晚上为节省蜡烛，只能点一会儿。主人用柴火一烧饭就黑烟滚滚。住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姨父照样有说有笑。他开始留胡子，有时他用手摸着胡子说：多摸摸，让胡子长得快些！我们姊妹二人常从这家的防盗门缝观看街上的动静，发现有一个小贩每天提着篮子挨家卖花生米。为补充营养，姨母要我们每天买两角钱花生米。姨父总把花生米摊在纸上，分成四份，甚至还数着粒数以准确地平均分配。

街上渐渐平静，人们开始活动，互相打听消息。姨父不便出门，由少礼陪伴着他。姨母则带着幼礼外出寻找朋友，商量离开香港的办法。听说姨父的一些外国朋友被日军抓进集中营，正关押在一家旅馆里。我们走到这家旅馆附近，一群居民正在好奇地往楼上看外国人。我们看到姨父的英国好友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也在其中，正倚着栏杆往下看，于是我们向他俩招手，虽然不能通话，但心里明白大家都还健康地活着。

六、从香港——桂林——逃亡印度

1942年2月，姨父得到通知，我们被组织起来离开香港去澳



门，经东山游击区再辗转到达桂林时，已是4月了。一到桂林，姨父就遇到范长江、张友渔、萨空了等许多老友，他活跃地开展各项工作，主持“工合”的桂林分会，出版刊物，去桂林师范学院教课。姨母也常去“工合”，到师范学院教英语，还筹办了一个小化工厂。这时少礼去中山中学教书，幼礼就在一个小化工厂工作。

后来，姨父介绍少礼去美国新闻处工作，幼礼到衡阳一家医院工作。1944年春的一天，幼礼突然接到姨母的电报要她马上回桂林一趟。回到家，方知广西军委会已得到通知要逮捕姨父，姨父母只得再次出逃。他们用了假名，由父亲在重庆设法帮他们弄到护照，一切已准备就绪。在秘密动身去印度的前一天晚上，姨父母与我们（指少礼和幼礼）四人在一起吃晚饭，还喝了葡萄酒，碰杯互相祝愿。我们边吃边谈，谈得很晚。临别了，姨父母嘱咐我们很多，姨父觉得少礼在美新处工作很好，表面上在美国机关，实际上是为中国工作，他介绍了美新处的一些人，认为可以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还可趁机把英文弄好。姨父认为幼礼将来可以从事福利事业，但是还是要学有专长，不论是哪方面的都行，不能肚里空空地干革命。次日一早，我们送姨父母到上车的地方，这次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车子开动时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个多月以后，长沙沦陷，衡阳、桂林居民紧急疏散。我们姊妹两人先后回到了重庆。

姨父母在印度时，曾写信给我们，建议幼礼去印度求学。那时幼礼已决定继续去浙大完成学业。姨父母得知后，特从国外寄给幼礼一支派克钢笔表示勉励。后来姨父母又从印度去了美国，我们一直与姨父母保持通信联系。他们身在国外，一直关心国内的朋友们。1948年，幼礼得知姨父的老朋友张锡昌被捕，写信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姨父马上回信，并附了一封给老友吴觉农的信，请他设法营救张锡昌。经吴觉农多方努力，终于使张锡昌获释。



七、与姨父母重逢在新中国的首都

姨父母得知全国解放这一特大喜讯之后，奉周总理的指示于1951年初绕道欧洲回国。他们一到北京，我们就去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们。阔别多年，能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相会，大家都高兴极了，我们和姨父、姨母热烈拥抱。我们畅谈别后的种种经历，告诉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新鲜事情，他们对每一件事都那么感兴趣，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询问一切。那年，姨父母都已50多岁，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真像一对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他们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为他们安排的工作中去，姨父在外交部、《中国建设》、国际关系研究所等部门任职，姨母在新华社、中苏友好协会、摄影协会等单位工作。

起初，姨父母被安置在象鼻子后坑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居住，1956年时因房子要拆迁，而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住房，他们就主动要求与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夙愿，于是立即搬到了东华门大街25号这个古老破旧的院子里。他们住在朝西的三间东厢房里。冬天是相当寒冷的，屋里虽然生着一个相当大的火炉，室温仍然不高，姨父经常穿着棉袄在家里工作。他对我们说：“我不怕冷，我的腿最经冻。”他撸起裤腿，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一冬都光着腿，只穿一条呢裤而已。他出门从来不带帽子，不围围巾，即使顶着五六级北风，也毫不在乎。到了夏天，东屋西晒，非常炎热，姨父经常是只穿一条单布长裤，打着赤膊，汗流浃背地工作。他却对我们说：“这点热算什么，我不是照样干工作吗？”那时姨父已经60多岁了，无论严冬酷暑，都不停地紧张工作，令年轻人感到佩服。

每次我们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于1959年病逝），都同时去看望姨父母。姨父一见我们总高兴地立即把我们腾空抱起，或把我们的孩子高高举起，然后说一些玩笑话，逗得大家都笑。不管谈论



多么严肃的问题，姨父总是那么幽默，在他周围总是充满着欢乐和谐的气氛。在那三间打通的平房里，南边是卧室，几个箱子摆在一起，铺上褥子便是床了。北边是书房和客厅，四周除了门窗，便是装满书籍的书柜，中间放着两张沙发，显得十分拥挤。然而就在这个狭小的屋子里，学识渊博的姨父常常同我们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带领我们神游广袤的人间世界。

母亲和姨母姊妹俩常爱一块谈论往事，姨父闲暇时也同她们一起亲切叙旧。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姨父说他在美国与姨母怎样巧遇又怎样恋爱的故事。他得意地说：“我在一个果园勤工俭学，每次下工以后，我都带几个桔子给你们的阿姨吃，她吃得很开心，她以为我总有桔子给她吃。后来她嫁给我了，我也不去果园了，就没有桔子给她吃了。”说完他哈哈大笑，大家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有一天，小礼夫妇刚到姨父家，就有人送东西来，姨母说：“是孙夫人（宋庆龄）送萝卜丝饼来了，还热着呢，她要我们马上就吃！”于是四个人围桌而坐，姨父说：“孙夫人特别爱吃萝卜丝饼，你们尝尝，是不是好吃？”姨母还说：“孙夫人自己爱吃的东西，常送来让我们尝尝，希望我们也喜欢吃。”

姨父是副部级领导干部，但他并未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从未想到要争取这种待遇，他在东华门那间简陋的住所里一住就是25年，生活得很愉快。姨父也从来没有领导干部架子，他平易近人，关心周围群众疾苦。东华门街道上的人对姨父都很敬重和爱戴。

姨父的性格朴实开朗，耿直坦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姨母曾对我们说：“你们的寄爹是个书呆子。”其实，姨父是一切出自公心，一切秉公对待，他对那种吹吹拍拍的庸俗行为和政客手腕十分反感。他心直口直，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领导。他说：“我不会吹牛，也不会拍马，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吹牛拍马的人。”

姨父是个坚持革命原则的人，组织纪律性很强，不该告诉我



们的事，怎样央求他，也从不透露一点，从他那里是得不到“内部消息”的。可是如果我们有什么具体困难，或者他的朋友、学生有什么困难，求助于他，却是有求必应，尽其所能给予热情帮助。

八、“文革”中的姨父

“文革”风暴突然袭来，姨父受到猛烈冲击，被扣上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罪名，长时间关在机关里挨批斗。姨母惊吓、焦虑，1968年患了癌症，又不能住进医院，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审，只有年老体弱的母亲一人陪伴、照顾她。姨母很想念姨父，但总不得见面，直到临终前几天，姨父才被两个人押送回家见了姨母一面。姨父要求留下来陪陪病人，未得允许，姨父回到机关失声痛哭不已。以后许多年，每到姨母的忌日，姨父都要停食一天，独自闷坐不语，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姨母去世以后，母亲为姨父的晚年生活担忧，尤其担心他的严重眼疾，她知道姨父和他的妹妹感情很好，曾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妹妹陈素雅，希望她能多和姨父在一起，照料姨父的生活。1969年姨父被下放到外交部湖南干校，当时我们姊妹四人也都分别在各地干校或农场劳动，我们常给姨父写信，他每收到信就马上回信，还常把他写的诗寄给我们。从他的信中我们能感受到姨父身处逆境中的乐观精神。我们的母亲于1970年在北京病逝，姨父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特写信给我们表示哀悼。

“文革”期间，我们的孩子们在中或初中毕业之后都陆续到各地插队，“上山下乡”了。他们也常给姨公写信，姨公非常关心他们，给他们回信时总劝他们在劳动之余多读点书，英文、理化方面的书也要看，他相信将来会有机会上学学习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证实姨父确有先见之明。

姨父下放干校时，已是70多岁，被分配在收发室分报纸信件，



他和以往一样，对工作极端负责，无论对己对人，都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做事非常细心，凡挂号信他必要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中才放心。同事们都为他的认真负责、热情服务所感动。有人对少礼说：“外交部以后如果实行选举，我要投他一票！”

姨父开办“家庭英文学习班”，刘少奇、万里等人的子女曾来学习。

1971年下半年姨父回到北京，回到了东华门，素雅阿姨和她的女儿女婿董瑜琼大夫、许德胜大夫先后搬到北京和姨父同住，在生活上、尤其在身体保健方面，使姨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期间我们姐妹也先后回到北京。

我们看到，姨父又开始忙碌了，没有人给他工作，但他是不会闲居在家的，他善于自己给自己安排工作，他在家里办起了英文学习班。在那没有上学机会的年月里，来向姨父学英语的人愈来愈多，有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干部，由于程度不齐，开设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他亲自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去买英文报刊作为教材发给学生读，每堂课都同学生讨论怎样把中文报刊上的某一段报道译成英文。姨父对教英文十分投入，学生学得十分来劲，东华门后院的一间小平房成了一所生气勃勃的英文学校。听说有些学生的家长是“大走资派”、“黑帮”，比如刘少奇、万里、乌兰夫、薛暮桥、于光远、王炳南、李纯青……等等，大家为姨父担心，怕会给他带来麻烦，但他毫无畏惧，他说：“任何人的子女都有权力要求学习！”

姨父喜欢体察民情，常让我们的孩子们陪他一块上街。有一次他要去上海，执意要自己从东华门步行到东单售票处去购买火车票，又执意要自己排队，他数点排队的人数，看着表，计算要用多少时间能买到车票。有时他到理发馆去，师傅要先给他老先生理，他却执意要和别人一起排队等候，并看着表计算要等候多少时间。人们说，这位老先生事事都这么认真，真不简单！

“文革”结束以后，姨父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他指导各种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指导编书……在晚上和星期天开设不同程度的英文学习班。这时姨父已经八十多岁，患着严重的青光眼病，视力极差，但他工作热情极高，精力过人。他说：“我像一部汽车，发动机是好的，虽然两个车灯不亮了，只要是熟门熟路，我这部汽车还是能走的。”在东华门院子里，他常从有着三层石阶的走廊上跳下去，以证明他的“发动机”还很好。每有客人来，临走时他都要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马路边。冬天寒风凛凛，家人劝他戴个帽子，他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戴帽子，‘四人帮’要给我戴那么多顶帽子都没有戴上，现在我更不用戴帽子了。”

姨父非常关注教育事业，担忧教育质量滑坡，已是90高龄，还亲自口授文章发表，认为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总勉励小礼要在北京大学这个教育岗位上好好工作，多培养青年。姨父特别爱护青年，关怀青年人的学习成长。姨父每次见到我们的孩子，都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常常是问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对姨公的关怀深受感动，都从心里喜欢姨公。他们与姨公交谈，向他学习英文，不但学到了严谨治学态度，而且学到了高尚的做人品德。

姨父也热心帮助成年人，不论什么人，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到姨父家里去向他请教问题，一般都是来者不拒的。谁写了文章送给他，他从标题到文字都耐心细致地提出意见，指导写作，甚至还主动提供他所保存的有关资料。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关心地问：“你们最近在干什么？写了什么？写好文章读给我听听，我可以帮你们修改，我还可以帮你们译成英文。”

姨父喜欢实干，视工作为生命。他从不浪费时间，对时间抓得很紧很紧。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有一张时间计划表，每一格代表一个小时，表上总是填得密密麻麻的。可是近几年，他的记忆力减退，双眼几近失明，他已不能那样紧张工作了，他为此



感到苦恼。他说：“我拿了工资不干工作，活着干嘛？”所以他总是向人们要求工作，他常对人说：“我还可以教英文，可以讲世界历史，谁来跟我学都行，可以随时来找我，白天来，晚上来，星期天来都行，我尽义务教，不收学费，不要报酬。”

九、姨父的生日是我们全家的重大节日

姨父生于1897年2月5日，按农历是正月初四，恰好是在春节假日期间。记得是在40年前的正月初四，我们的母亲发起庆祝姨父60岁生日，全家老小聚集到东华门尽情欢乐一番。此后每年这一天，我们带着蛋糕，奔向姨父家，祝他生日快乐；我们的下一代向姨公拜寿拜年；我们的第三代向太姨公拜寿拜年。这一天成为我们家的一个重大节日，是一年当中最热闹、最欢乐的日子，大家围坐在长寿老人身旁谈笑留影。记得姨父82岁时，他说：“我今年才28岁。”90岁那年他说：“我刚9岁。”每年我们向姨父祝寿，而姨父则以他那心胸广阔、乐观豁达和永远年轻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按中国习俗，要提前一年做百年大寿。在1996年2月我们兄弟姐妹和姨父的妹妹一家并他的侄儿侄女们共同组织了一次热闹的家宴，祝贺他老人家百岁华诞，宴会上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还希望8年后，我们再欢聚一堂庆祝姨父的“茶寿”，即一百零八岁生日（按：茶字表示20加88等于108）。

在为姨父举行的“百岁家宴”上，他的学生们向他祝寿，对他说“我们是你的学生。”他立即说：“现在，我是你们的学生了。”当他们对他说：“我们是你的老学生了。”他又立即说：“那我就是你们的小学生了！”听了这段机智风趣的对话，我们深深感到，身为百岁老人的姨父，他的心态还是那么年轻，精神还是那么奋发，正像我们写给他的祝寿对联：“盛世长青树，百年不老松。”



义兄——陈翰老

彭家礼

我父亲彭由笙（字鍾善）同翰老的父亲陈觉先（字澹），辛亥革命后，都在长沙游宦。同在一个单位，即湖南步兵领衙门任职。我父亲是幕僚，陈老伯还兼带兵。他们两人都叙了候补知事衔，等候挂牌（即候委）。两人相处极为相投。由契友进而结拜为异姓兄弟，互换兰谱，亦称换帖，即把彼此祖宗三代的历史情况，写在两分印制得很讲究，有兰花香味的红纸贴上，表示“同心相契，其气如兰”。所以称为兰谱或兰交。换谱后即行跪拜礼，然后把交换的兰谱放在各自的祖先堂前，供奉三天，礼节是很隆重的。陈老伯年长，是哥哥，我父亲对盟兄执弟子礼是很恭顺的。

他们的顶头上司，即步兵统领，是我父亲的舅舅，我父亲因此先得到实授湖南湘阴县知事的委任。但他以兄弟情谊为重，决定把这次委任让给他的盟兄，并取得他舅舅的同意。于是陈老伯就赴湘县上任了。后来，他们虽是天各一方，但终身问信不辍，在日军占领武汉前夕，我家逃难到岳州，生活陷入窘境。得知陈老伯已去重庆，乃急电求援。回电叫父亲速去重庆，立即为父亲找到工作。虽说是异姓兄弟，却情逾骨肉。相交50年，情深意厚，是难以忘杯的。

翰老少年时代在长沙明德上中学时，即酷爱读书，听父亲说，他手不释卷，头发长得很长，他父亲给他钱，叫他理发；过了几



天，发也未理钱也没有了，问他钱干什么了？他说钱都买书了。

听说，翰老家乡有个二伯（我的印象翰老的父亲行四）从小就非常喜欢翰老，翰老去美国留学时常给予接济。

1927年我大兄彭振华中学毕业，我父亲写信陈老伯求他介绍工作。后来翰老叫他去上海，对他说，你还年轻，应当继续求学，介绍他到上海建设大学，后来又搞到持志大学就读。学费、生活费都由翰老负担。

1932年，我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初次见到翰老时说，我读书很少，知识浅陋，他说，“那更好，白纸上好画画，旧东西学多了不好，还要先受反教育”。名义上翰老为我找到南京实业部经济年鉴编委会一个排字工作。实际是在翰老身边学习，指定我读几本书：瑞占诸夫写的英文《马克思传》；拉皮朵夫的《政治经济学》和李达的《现代世界观》，这些书都给我开扩了新天地。

1952年，我到北京准备进华北革命大学受训未成，翰老介绍我到了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

翰老为人尊老、念旧，记得解放前他路过武汉时，必来看望我父亲，1953年我父亲来京小住，翰老得知后，百忙中抽空带着礼物来我家探望父亲，不因地位高而忽略小节。

翰老助人为乐，急人之所急，1977年经济所严中平的爱人孙秀珍患晚期癌症，在家日夜呻吟，当时无出租小汽车，向学部军宣队要求借车被拒绝。医院又找不到床位，翰老得知后立即要我陪他到严中平家看望病人。又找学部负责人姜君辰，解决住院问题，没有结果。翰老又写信给当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胡乔木，并让我陪他带着信亲自走到胡乔木住所，胡不在家，便将信留下。后来孙秀珍才住进了肺科医院。翰老助人是用实际行动，不讲空话。这类事情多得不胜枚举。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后，协助翰老编译华工史料，在翰老的领导下，使我接触到关于华工出国的较系统的知识。我对翰老献身学术，守正不阿，助人为乐的精神十分崇敬和敬仰。



我所知道的陈翰笙先生

费筱墨

陈翰笙先生在“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提到的在美国波莫纳大学的同学焦墨筠即系我的母亲，书中曾提到他与我母亲的关系。文革前我曾在我舅舅家中见到一张照片，照片上左面是我母亲，右面一排四个男同学，他们拉着一面当时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五色旗”，我母亲在每位男同学像下都注有×君××的字样，惟独在陈伯伯的像下还加注有“陈君无锡人……”等等介绍陈伯伯的情况的两三行小字，足见他们当时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惜这张照片在文革中遗失了。

我第一次见到陈伯伯是1932年，当年他到青岛去看望我母亲，我那时虽仅四岁多，但当时的情景还依稀记得，记得他当时住在青岛主要的大街中山路上一座公寓内，进大门后向左转，还记得与他一同外出逛街的情景。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当时时近复活节，中山路上一家外国人开设的著名的糖果点心店在橱窗内陈列着一个细藤条编制的篮子，内中放着几个形状非常可爱的用巧克力制成的兔子，标价10元（当时一石米才一元），因价贵我们从未想到要买它，但每次经过那里总免不了要朝它多看几眼，也许这个眼神被他看见了，在他离青时由他买下嘱店家送到我们家中，令我们惊喜若狂，不仅好吃，每个兔子肚子内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玩具，我还记得我得到的那个玩具着实令我在小朋友中



出了一阵风头。

波莫纳大学位于美国南加州，是一座包含文理两个学院的著名的大学，直至近年仍每年位列全美最著名学院前五名之内，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名誉博士学位即系当年在他访美演出时由波莫纳大学所授予。波莫纳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极高，自从我们见到过陈伯伯后，我母亲常常提到陈伯伯在波莫纳大学读书时，所写的英文作文，多次被教授拿来印发给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全体同学作为范文阅读，足见陈伯伯当时在校学习成绩之优秀，陈伯伯在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接纳为菲尔培塔凯巴协会会员，并获赠金钥匙，我母亲曾提到这个荣誉有一个古希腊字的名称译音好像是“孔姆莱德”，而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曾说过，陈伯伯共获得了三把金钥匙，这在波莫纳大学是空前的，当时轰动了整个波莫纳大学，而我母亲也多次提到陈伯伯学习上钻研精神，说他不仅精通英、德文，还掌握俄文和数种印度的文字。

陈翰笙先生一生为革命到处奔波，在学术研究上享有那么高的成就和荣誉，但自奉极俭朴，1981年时我曾收到陈伯伯的来信，令我非常讶异的发现那封信的信封是一个旧信封反过来使用的，当时我想可能因手边一时无新信封之故，但在1983年我又收到过陈伯伯给我的两封信，每封信都是用反过来的信封装好寄出的，这才使我了解到这并非偶然，而是他一贯勤俭的作风，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信封虽大小不一，但每一个信封都黏贴得非常工整，绝非草草之作，你如果不去看信封里面，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旧信封翻转来使用的。

我的舅舅是一个医生，抗日战争前我国与苏联恢复邦交，颜惠庆被任命第一任驻苏大使，因他患心脏病，遂请我舅舅以大使馆秘书名义随同赴苏工作。我舅舅自苏返回后曾提起，1935年某天他到莫斯科火车站接人，看到陈伯伯自火车上下来被两个苏联友人接走，对陈伯伯看到他而故作不识，似乎还有点不满，我们说可能认错了人，但我舅舅坚决予以肯定，直到我母亲病逝后第



二年陈伯伯到上海，我陪同他到我舅舅家，他才说当年我舅舅看到的确定是他，他当时也看到我舅舅，只因当时大家的身份不同，他又是以秘密身份赴苏工作的，故才不便相认。至此这段公案才算弄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陈伯伯自美国寄了一支当时风靡全球的最新的“派克51”型金笔到中国送给我母亲，由于当时金笔价值高，寄费及保险费都很贵，陈伯伯在邮单上只填写了“派克”，而未填“派克51”，这样在美国邮局中被人掉包，寄到我母亲手中的是一支老式的蓝色派克笔，而非派克51。我母亲去世后，当我把这支笔拿给陈伯伯看时，他连呼“我当时寄的不是这支笔！”



翰老对我们的教育与关怀

李康明

我是在1939—1940年间，由陶行知先生介绍认识翰老的（当时陶行知先生在香港九龙办了一间中华业余学校，我在那里学习并认识陶先生，翰老在那里曾给我们做过时事讲演）。当时我想找个机会参加国内抗战服务工作，给陶先生写信提此事，他就介绍我找翰老。翰老当时是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法祖作他的助手）。见到翰老后，他给我几本有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小册子，要我写一篇读后感给他（我想这是测验我的文化程度），我照办了。他不久就和我联系桂林湘桂工合办事处办的工合人员培训班，让我去那里学习。但由于抗日战争延展到华南地区，交通很不正常，一时去不了桂林，等了几个月，约1940年9月，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派人通知我，说近日有船去广州湾（即现湛江市），要我写个去桂林的旅行行程。因我未出过门，不知怎么走，就找一张中国地图，看看桂林在哪里，要经过哪些地方，写了一张去桂林的旅程表。翰老看后，觉得过于简单，要我重新了解具体旅程，如经过那些县镇，需要多少时日，以及交通工具等。我拿着地图，请教一位广西籍的同学，得到他详细讲解，使我有可能是写出较具体的去桂林的旅程表。从这件事的接触过程中，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即你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必须认真从事。

后来，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帮我买了船票，给我200元港币的



旅费，翰老和顾老亲到码头送我上船，并祝我旅途平安。此情此景，几十年来，一直使我不能忘怀。

一、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桂林，“工合”的培训班已经结束（因我在香港等了几个月的交通，正是培训班培训的时间）。湘桂工合办事处分配我去湖南邵阳工合事务所工作。我在“工合”一直呆到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才又回到香港。在“工合”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得到翰老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在“工合”的经历，也是曲折多事的。因为在“工合”这个机构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国民党又派人进去，在工作上难免发生摩擦、斗争，在这个地区待不下去，就要转移工作地区，几年间，我跟着邵阳工合事务所主任柳休，从邵阳转到广东曲江（即现韶关市），以后又转到江西赣州，后来到了桂林。翰老对我在“工合”工作期间，关怀备至，在转移工作地区中，他是尽了很大心力的，使我感受很深。

又如在桂林工合事务所工作期间（约在1944年），翰老遭受国民党迫害，将要离开桂林，临走时，对我说，他要去印度，以后有什么困难找张锡昌先生。当时翰老和张锡昌先生在桂林办“工业研究所”，出版“工业研究”月刊（确切名称记不起来，记得在那里工作的还有简竹坚小姐，简现移居香港）。想起来，这深切关怀的话，是对我真情的爱护和关心，现在仍使我感到非常感动。

二、教育我不要做官

在广东连县“工合”期间，当时有一批和我年龄相若的青年，纷纷离开“工合”去上大学，使我萌发了上大学的念头，以此写信告诉翰老，翰老来信不赞同，说我的文化已可以适应当时的工



作，读书不外做官，他认为做官不好（大意如此）。因而作罢。当时社会风气确是如此，读书似乎是为了做官，其他没有出路。这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当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做官，必然是做国民党的官。因此，教育我不要做官，我理解是不要和国民党同流合污。

三、待人真诚亲切

解放后，翰老在北京，当时在外交部任顾问。文革前，我每年都有机会去北京参加会议（文革前，中央各部召开的会议，都通知广州派人参加。文革后，体制改变，广州市是否与会，名额由广东省掌握；广州市单列后，又恢复参加北京各部召开的会议。现体制改革，取消单列市编制，又复原文革后的状况）。在北京开会期间，星期天休会，我必去翰老家拜望他老人家（当时住东华门）。每次都留有深刻印象，他很关心地方经济发展情况，总问及广东发展如何？也谈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讲解当前发展中的问题，使我感到亲切，诲人不倦。并经常留我在家吃饭或去国际俱乐部喝咖啡；顾淑型老人家在世时，有时拉我去逛市场。有一年他二老和我一起去游香山，并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尊敬的翰老，对后辈怀着浓厚的感情，谆谆教诲，使我永远难忘。

我祝愿他健康长寿！



结识陈翰老五十年

刘振寰

40年代初期，因日寇侵略中国，我逃难到桂林，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桂林办事处任财会工作。在一个秋末冬初的季节，因战局变化，陈翰老由香港转移到桂林工作，从此，我有幸结识了翰老。那时我年仅卅岁，翰老约五旬左右，承蒙不弃，以后每次造访恭聆高论，获益匪浅。解放后，我拜访求教尤勤，每次不仅是“忘年交”，堪称“师生谊矣”。50年交往，对翰老的高尚品德，耿直性格，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诚恳对待同志朋友学生等情况，留有深刻印象。

翰老在香港期间，负责“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会同在港名人，如宋庆龄夫人等，向国际募集大量捐款，对流亡工人在大后方恢复生产，支援抗战，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树立了声誉，取得国际友人的信任。40年代初期，因战局变化，转移内地，到桂林继续为“工合”工作。

翰老刚直不阿，认真负责，嫉恶如仇，桂林“工合”某届负责人，有贪污不廉行为，虽有相当声望的人物为之缓颊，翰老坚持正义，终于使该负责人被“工合”除名。后孟用潜来桂林主持慰劳西南盟军服务工作，翰老给予了很大支持。

翰老在留学期间，专攻经济学，颇有成就，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颇多。香港沦陷，他本可以去国外谋职，享受高薪待遇，但



他以民族危亡为己任，坚持为党的事业工作，不顾国内烽烟遍地，艰难危险，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继续抗战救国工作。工作中并不放弃所擅长的专业，与张锡昌等创办《中国工业》，解放后又主编《中国建设》英文版（China Reconstruct）。

在桂林工作期间受国民党政府威胁，迫不得已，离开桂林，辗转到了印度，继续为中国救亡工作尽力，还在大学任教。为了促进中印友好关系，结识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建立了友谊。当时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管中印关系事务，参与了接待工作，旧友重逢，翰老以高水平的流利英语与尼赫鲁总理谈笑风生，被特聘为翻译，为促进中印友好，起到了一定作用。周总理曾誉为外交人才，出色的英文水平。

翰老接受了社会科学院胡乔木的邀请，聘为该院顾问后，在繁忙社会工作之余不忘奖掖后进，继续培养青年，义务为他们补英语，前后足有廿年，仅我就曾为他组织介绍过两期不下30名，翰老培育了数百名英语人才，仅出国留学学者有百名左右。

翰老已年属耄耋，眼已接近失明，口齿也不便，但还念念不忘“工合”，国家的民间外交和培训学生，在80年代会同“工合”中外老领导人，如艾黎、卢广绵等恢复了“工合”工作，坚持“工合”要从事工业生产，不经商，不投机倒把，更要严禁贪污。在外交上主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认为朋友多，做工作就方便，在外交方面一直主张开展民间外交。

结识翰老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经常受到无形的启迪和教益，值翰老九七寿辰特写上述事迹，供为翰老立传参考。翰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奔波一生，历尽坎坷险阻，成就事迹极丰，愧本人文笔拙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请原谅。



五十年雪泥鸿爪

——记陈翰笙与李纯青的友谊

谈家芳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见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诗）

我从李纯青遗稿中，追踪李与陈翰笙先生50年友谊的踪迹。时间应自1940年始。

抗战军兴，李纯青从日本归国，1940年7月17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怪物久原房之助》一文后，突然接到一封来信。

李在晚年反馈自己作品时候，补写了如下话语：

“这是一篇值得我纪念的文章，我之所以纪念它，是因为1940年在香港发表此文时，突然接到一封信，祝贺我这篇文章写得好，此人我不曾谋面，他在学术界已卓有令名，我难忘他提携后辈之情。后来，我在北京，我们同事多年。十年浩劫中，又同坐在一间冰窖般的牢房里，整个严冬，风狂屋冷，不给生火，没有一丝暖意。我和他每日棉衣加裹被，而心中光明，无事可愧对于人。这样终于活过来了。此人就是陈翰笙先生。现在我们又是对门的紧邻，彼此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世界极大又极小，只能以有缘识之。”（见1986年6月12日所写《再谈研究日本》一文，载《笔耕五十年》）

以上所引，应是本文的总纲，下面将以具体事实加以阐明。



经历了10年战斗的岁月，1949年全国解放，李纯青以朝圣般虔诚的心情，来到北京。有诗为证：

“鹊桥贮立，观银河潮急。千载人间长饮泣，今夜和风习习。洞庭太白群仙，起舞太空翩跹，欢宴地球来客，狂歌一曲三千。”
(初到解放区即兴)

这是一种革命战士在胜利后回归大本营时宽慰之情。对人民革命胜利划时代意义的壮言豪语。一种令人可以流泪的无邪的忠诚。我想，所有各战线返回的各方神仙，都会有这种心情。陈翰笙先生在不久后调来北京，又都分配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他们同是党组成员，陈翰笙任副所长，李纯青是研究员。李纯青曾对我说：“陈翰笙是美共、苏共、中共的老同志，在学术界名望很高，是个大学者，大名人。周恩来总理要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被他婉言拒谢了。”李纯青用着不常见的孩提般仰慕的语气，“研究所有这样的领导，将大有希望，我能和他共事，感到光荣。”

5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以至全体人民的黄金时代。胜利不久，意气风发，万众一心，大家都以最佳成绩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李纯青和陈翰笙也不例外。他们没有思想负担，没有历史包袱，以学者风度，主人翁姿态，从事于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敢说敢想，一天等于20年。

1956年11月，全国人大组织代表团，出访苏联及东欧六国。李纯青和陈翰笙同属代表团成员。我在一封封家信中寻觅着他们的旅途萍踪。

1956年11月16日李纯青自苏联来信：

“昨晚到达莫斯科，飞了约十小时，北京到莫斯科的距离，果然是朝发而夕至。

从天空下来，俯冲过三个云层，最上一层彩霞烧半天，下面是粉红色的云海，再下面是灰暗的乱云，地面下着雪，莫斯科中央机场，笼罩着霏霏雪片。

一天赶太阳，行不到一半，太阳终于跑掉了。



天黑了下來。

在天空看下界，偉大的山岳變成一盤模型，汽車像螞蟻般那麼小，那麼慢。人類的智慧已經把高傲的雲層踩在腳下，它像一群馴服羊群，漫不經心地放牧。但是，我却感到天空遼闊無邊，無處歸宿，心也變得那麼空漠和寒冷，難怪神仙也要思凡，想念祖國和家園。

今天我們參觀克里姆林宮，晚上看歌劇黑桃皇后，大概還要去南俄海疆，去中亞西亞，當然，首先會到列寧格勒……”

1956年12月13日自捷克來信：

“訪問捷克已告一段落，今天來到KARLAVY VARY，一個溫泉勝地休息，過幾天回布拉格，然後去羅馬尼亞和其它兩國，新歷年要在國外過了。

捷克斯洛伐克工業化程度很高，有些工業技術超過蘇聯，我們走過的地方都是現代化城市，大工業區，美麗而富饒。鋼產量和中國差不多，鞋年產八千萬雙，玻璃製品世界第一。看來人民生活很好。他們對中國很熱情，為我們掛專列，不斷宴請和講話。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基斯拉伐，特為熱烈，歌舞盈盈，起舞紛紛。

現在我在旅館寫信，窗外蒙蒙細雨，前面又是高山，又是大樓，一條小河流淌在峽谷之間，風景如此綺麗，但我觉得疲乏，流動的太厲害了，覺又睡不好，而且常要起草發言稿，幸而沒有落伍，也沒有出毛病。”

1956年12月31日自羅馬尼亞來信：

“我們現在羅馬尼亞首都，決定明年一月二日去保加利亞，已訪問過三國，一部分人還要去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這裡人情溫厚，給我們以隆重接待，所到之處，掛滿中羅國旗，我們這支隊伍，和平友好使者，毫無阻礙地從北京走到希臘邊境，足以為祖國自豪。確實，社會主義國境只站着幾只鳥兒，下一代人將是幸福的。



我和陈翰笙先生，以及其它喜爱动脑筋的人，都很仔细地观看每个国家的情调，还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以及它的未来。在这方面，很有收获，也很有感慨。有时为之忧心忡忡。但是，纪律告诫我们，这是绝对不能触碰和不能思考的问题。”

1957年1月7日自保加利亚来信：

“到保加利亚，住在郊外皇宫，被数里森林包围，开窗只能听到松涛的声音。今天他们都去地方参观，留我在改访问归国的报告。宫大人少，感到一种静寂的趣味，松涛声更显得更为高亢。

说说这里发生的故事：为分配卧房，有人想出绝妙方案，把打鼾的归在一起。于是，陈翰老有条件 and 民族资本家、北京乐家老铺的乐松生先生同住一室。到了半夜，只见陈翰老抱着毛毯匆匆从室内逃出，独自隐身在大厅沙发中静坐。往来巡卫的人趋问不语。再问有何不适？回答是“我打不过同室的”，“我认输了”。闻者为之忍俊不止。

陈翰老向来是幽默而富有风趣，他的佳言隽语，足可为相声曲艺界提供一箩筐的素材。比如，他指说自己是一清二白，复加以阐明：一只是青光眼，两只是白内障。既无针对任何人或事的对比嫌疑，而又仅仅是自嘲自乐，在引人发笑中，蕴藏着满腔爱心，一片忠厚。

1957年2月，人大代表团完成任务后载誉归国。就是这一年的夏天，党中央掀起了以百分之五为指标的反右斗争。这一场既以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开始，又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为辅助，终而导致万马齐喑局面的昏天黑地的斗争。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龙头一摇，全国上下无一幸免，每个单位的小有权者，又假藉这股强劲东风，扫除异己，决不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李纯青未发一言而于1958年补打成党内右派，一放到底，在农村从事最艰苦劳动，以观后效。这以后便是全国工农大跃进，小高炉大炼钢铁，农业亩产百万斤，有人献出剩余的忠忱，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一茬一茬地，像理发一般，绝不容许有半点生机。



这一阶段，被贬放的李纯青就很难与陈翰老见面了，只有在“三年困难”时期，李纯青病回北京，偶然一次在欧美同学会与陈老相遇，这一次，我才得识陈先生。这位西方留学生，却是一副中国老学究模样，眼睛近视，头发稀疏，脸色白皙，背厚而微佝，对人谦谦有礼；他的夫人顾淑型女士身材高挑，面目端庄。一种属于大家闺秀型的职业妇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6年，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借用当时的术语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贯彻执行，有人用偷梁换柱法，先让所内的一批领导挨斗。人们记忆犹新，当会想起那些人头戴尖帽、身挂纸牌、弯腰弓背、被押解在主席台上一长系列的展示。由于陈翰老是副所长，也不免在被斗之列。这种东方古典式的刑罚，无知而野蛮，居然通行在廿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真是今古奇观！在这一场长达十年人妖混淆、毒氛弥天的疯狂时日里，中国人以极大的耐受力屈辱地生活着，不能耐受的均已死去。我无意追究那始作俑者，也不会责怪那些无知的毛头娃娃红卫兵，更不屑唾吐于几个神人共愤、心狠手毒的四人帮，我只纳闷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听从于一声无声的号令？江青的手臂并没有超过两尺，她能割掉远在东北辽宁张志新的舌头吗？诱发着某些人体内残缺的基因，煽动着某些人卑劣的私欲，来达到驾驭万民的目的，未免太机巧了。这种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社会暴乱，到头来只能自毁长城。好一个‘法不及众’，让人们只能对这场噩梦摇头叹息，而难置一词。最后，我对仅用“十年浩劫”来简结这段历史劫难的人大发牢骚，觉得太傍观了，太轻描淡写了。现在，当我也步入老年，我才懂得，我必须向那些沉默的高明学者学习。他们有自我价值，有自身的重量，他们分秒必争地在各自领域内为人类社会做出奉献，眼前的一时一事，即使长达十年，他们也会用最冷静的态度去观察与思考。人世沧桑是规律，高洁正直与仁厚才是永恒。天何言乎！天何言乎！



1968年，陈翰笙、吴壬林、刘思慕、李纯青，一齐关进机关后院的小楼里，限制一切人身自由，不许人员进出，只有外调人员来时，才是例外。一冬天不给生火，掐断了暖气。每人月发20元生活费。他们像原始人在孤岛般自己寻找生机。李纯青曾撕破衬衫，用布条夹败絮捆绑在水管上，以引水入室。他们把假牙用手帕包紧，晚上放在被褥里，以免冻结在茶缸底。这两个老人穿上重重棉衣，再裹紧棉被，在木板床上盘坐，运气丹田，好使血脉活动起来。当外调者被一阵吆喝声和脚步声推搡着进屋时，那外调者也禁不住这一股室内寒气的袭击，不免倒退几个踉跄，连呼好冷。

按照我的理解，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名列世界名人辞典的陈翰笙先生，他们有高层文化的薰陶，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既不会谄媚求饶，也不会诬人自保，只是忧国忧民之心一念难泯，为此苦恼而已。在此期间，陈老夫人顾先生去世。陈老悲痛的心情可以想见。这两位难友有时吟诗唱和，自求排遣。下引李纯青《小楼冬》七律一首：

“锣鼓喧天楼外闻，青松白发对黄昏。寒凝空气心如裂，水锈铁窗花有纹。水暖全无四阅月，生死全抛一身轻，几度狂风追浪雪，来回挥斧劈孤坟。”

又一首，《渔家傲·囚》：

“四壁悬崖七尺短，长征万里盘旋转。低头自问轻自唤。天渐晚，家邻咫尺天涯远。”

狂风落叶飞沙乱，小鸟啁啾瑟缩看，烦愁滚滚冲霄汉，夜长不寐旦复旦。”

隔离审查将近一年，于1969年4月结束。应该说，在当时形势下，这次囚禁是出奇的短暂，应该满意。

“1969年11月11日上午11时，一列专包的火车，乘坐一千多人，开出北京。”

在李纯青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也不知道能否活着回家，更不知道今后生活怎么过，还有多少日子和多少磨难。”

没有警报，没有枪声，但浓厚的战时气氛，袭击着和进占着人们的心。好像谁都相信，中苏必战，而核弹已经从外蒙射出，正在向北京飞来。

是逃难呀，为什么要逃呢？既然人这么不值钱。谁知道，这原来是林彪的阴谋诡计，简直不可想象。

我一家九口，分散在七个地方，当两个孩子到车站送行，他们的身影消失时，我脱下眼镜，镜片已湿雾蒙蒙……”

这一段记载着李纯青和陈翰笙从北京下放湖南茶陵虎踞山外交部五七干校时的情景。

按照毛主席指示，广大干部必须下放劳动。李纯青和陈翰笙及外交部其他人员一起，除参加斗批改之外，积极参与体力劳动，以脱胎换骨，接受再教育，改造成为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一个是届耳顺之年，一个已是古来稀，革命了半辈子，但仍逃不过这伟大的历史使命。在干校，李纯青负责烧开水，陈翰笙担任信件收发，他们敬业爱业，在这份平凡的劳动中，做出发明创造、改进程序、提高效率的出色的贡献。例如，李纯青发明了用一根木条制成的简陋量尺，一伸手便能探测出炉水的深度，而不用爬上板凳，脱下近视眼镜，对着热气腾腾的壶口向内张望。又例如：李纯青用军事理论武装了的实践，认为“修运水道如修栈道”，其重要性为烧水全部劳动中第一要着。于是，他在担水加煤之外，日夜胼手胝足，运土运砖，把担水通道修好。对于这些，李常津津乐道，自夸自豪。陈老先生则除正襟危坐，分发书信，给各家带来惟一的外界联系外，又常常奔走于邮局之门，为他所义务帮助的一些贫苦学生汇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事只有李纯青知道。当他们返璞于真，用原始劳动手段大修地球之时，世界上已进入于宇宙的探索，而中国亿万子民，尚沉浸于中国文化瑰宝“资治通鉴”的帝王统治艺术之中。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董仲舒的治国



如治丝，必先理乱的贤良对策，以及法不及众，假手于群众斗群众的绝妙好计，人的智慧都用来对付人的本身了。史无前例，后无来者，诚令人叹为观止。

让我们轻松一下，谈谈陈翰笙和李纯青当年在干校的居住环境。

“我们的住房很热闹，像集市中的肉铺一样，白天，来回的人流不息，家住农村的汉子和夫人都到这里集合、开会、休息、吃饭……，他们把毛巾、热水瓶、衣服、洗脚盆、茶杯、背包、雨伞、椅子、凳子、臭鞋等等，通通放在这里，这是‘公’馆，‘公’寓，人众杂沓，不得安静，好不令人烦恼。有时夜里开会到11—12点，我们不能进去睡觉，只好在外面喝西风，作游魂。陈老曾写诗一首“叹六号房”（房子是第6号），我则和诗一首，“赞六号房”，一赞一叹，各持一说。

今天还特别热闹，为什么呢？一是同房一位中学生，明天要回北京参加分配，一群年青学生围着他海阔天空地神聊，他们讲着我40多年前所讲所听的话，距离太远了，什么都不着边际，我对那种话兴味索然。只好躲到野外来。这里是三面茶园，一面丘陵，只听见流水淙淙，闻无人声。天是蓝底拖上几丝淡墨懒云，太阳不时露出笑脸，风微微吹拂，略感凉意。此时是上午11时正。

越过一片水田，爬上山丘。水面游过一群鸭子，那是地上的鸿雁。想起两句未成的诗句：“雁叫尖声报寒汛，风吹层雨排山来。”即是此景。今见鸭子在水中觅食甚欢，难道已“春江水暖”？这山丘都是红土，一股一股地翻着红浪，阳光冲破乌云，倾泻着道道光辉，我复得诗两句：“瘠土生赭草，肥叶闪白光”。山丘上植满松树，高与人齐，间有油茶，花已凋谢，松涛阵阵，思念纷纷。

我必须告诉你一处最美妙的地方，那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离干校45分钟，有一片幽静的丘陵，那里就是我写“忆王孙”的所在。有一次我在这里突然发现数十株油茶树，而且开着红花和白花，白花带红，红花褪色，给人一种清香彻骨的感觉，而



四周都是松林，花开得十分寂寞。由此再走一段路，沿着山脉走，便可看见洙江。江水从万山群豁中脉脉流出，如果有太阳，它就泛起鱼鳞般的涟漪。我喜爱这个地方，腰痛未愈，一拐一瘸地也要跑到此地抒情。我为茶花所迷，为美景所醉”。

（以上录自1971年1月5日李纯青家信）

由此可以知道，一同在干校生活和劳动的陈老的生活环境，包括屋内及屋外。

大概是1970年12月杪，陈老曾去醴陵治眼病，另一同室已移居他处，上面所说的中学生到北京去了，只剩下李纯青一人，独占空屋，心情抑郁，吟诗以寄怀。题为《五古·江干行》：

“陈老去醴陵，怅然觉冷清。出门网所失，踽踽江干行。渡口拥旅客，笑谈天有晴。风帆破逆水，急急向归程。暝色远山聚，家思心上凝，枝头小鸟闹，呼唤春暖生。今宵梦落处，柳暗又花明。”

时日蹉跎，如此过了1971年，无非是劳动、学习、斗批改，写检查和交代。到了1972年，林贼事发，干校见了松动，彼时陈老已去上海，暂居其妹陈素雅家。

1972年2月16日李纯青家信：

“接翰老信，他特赴富春江为其亡妻撒骨灰，践生前玉诺，事见其人，闻之惻惻，哑然终日。今录其来诗几句：“富春江上撒骨灰，碧水东流不复回……”，其友和之，有“风凄空谷瑯玕碧，月冷微波蕙兰芳……”“不尽升沉千古恨，都随清白一江流”。不详其友何许人，此老人心也。翰老信云：宦乡在江西上高，独自研究战后帝国主义的特征。曾向他求教和借阅资料。窃意此事有二义，一、此君亦未解放，疑与我同病；二、其研究亦为身后思乎？翰老信又云：‘五七办’送部退休某人去合肥，此人明日转抚州，将为陈看新屋，如已落成，陈老即将赴京，然后来湘转赣，行将安老于异乡。上级照顾维周，但未得叶落归根，古人谓乞骸骨于故土而不可得，悲夫！”

李纯青即时回寄翰老诗一首：



“曾梦金银花向荣，良侣何忍去无情？而今窃慰君有妹，寄语善陪陈翰笙。”

1972年春天，李纯青被落实政策，取消了群众专政，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回到北京。陈翰笙也被取消了定居江西的安排，回到了北京。初时陈翰老借住在东华门亲戚家。我们常时去拜望他，陈老每次送客必躬亲门外，这个规矩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其后陈老收了很多失学青年，在他寓所就读英文。那些学生的家长有的还未解放，有的还戴着各种各样吓煞人的帽子，但陈老不以为意，我行我素，弦歌不绝。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就是这样，有多少光，多少热，他都要为社会献出，不做事情对他来说是最最苦恼的。

80年代始，我们两家先后搬在木樨地高楼，恰巧又是对门，距离如此弥近而关系又如此深远，反而见面机会不多了。这是由于各人都害怕干扰对方的缘故。所有高楼居民都有此经历。1990年李纯青去世，我索然独居，日夜整理遗稿，既无暇也不敢常和这位百岁老人见面。只有两件事，我愿补叙于下：

一、人民出版社戴文葆先生借我寓所和陈老之妹素雅女士会谈，为借出陈老与宋庆龄来往信件一事。素雅秉承了陈老的意见，谢绝了。说：信件都已销毁。事后她告诉我，为了宋先生，这些信不能交出，何况已经没有了。即使现在拿得出来，出版社也不可能变成铅字。嘱我婉言转达歉意。

二、陈老已过百岁耄期之年，他前几年已步履蹒跚，春节时必由素雅姊扶了过来，向我这个小老太婆故友的遗孀拜年，每次说话只有两句：“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敲门找我，我一定来帮忙。”要百岁老人帮忙？真是从何说起。每次我都忍不住要笑，笑过之后，既惭愧又折服，从内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古人谓耆宿大贤，陈老可以当之。

这是一位一贯助人，为别人考虑多于为已的高尚的人。借用1970年12月13日李纯青家信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顺便说几句关于陈翰笙的事，这个人刻板之至。但居心纯厚，



为人正直，君子也。在我腰损时他为我打饭打水，感人肺腑。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除耳顺有青光眼外，五脏无病，生命力旺盛，但最近也对我说，“世界上好像不需要我这个人，我对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短欠，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他绝不是悲观的人，却说了悲观的话。想起熟人多为鬼，我告诉他：“彼岸熟人渐多，此岸知己渐少，这边那边，生死是不可抗拒的。”他确实是孤独的，老年失妻，他爱人的姊姊也去世了。”

这是廿七年前的一番对话。此后，事情发展是以陈老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家庭集体而安度晚年。他的妹妹陈素雅，外甥女童瑜琮大夫，甥婿许德胜大夫，两位医生和两个孙辈和他生活在一起，有效地保护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离开干校后这些年月，陈老出版了很多书，教出很多学生，电视上播出过好几次盛会，我总结为这是上天对一位善良仁厚长者的最公正的回报。我在送给他贺年卡上写道：“百岁老人的存在，就是国家的幸福，社会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我知道，李纯青在天之灵日夜在不断眷顾着我，他正通过我的思考和我的抄作，也在表达着他这位尊敬的良师，共患难的益友，寄以宽慰和护佑之情。

敬祝陈老与天地同寿！敬祝他老人家永远健康！



陈翰笙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启发

朱 敏

记得1942年夏季，由张锡昌老师带我去拜访了陈翰笙老师和顾淑型老师，并由顾老师介绍我到工合子弟小学任老师。小学校地点在桂林祝胜里17号，靠近七星岩，是桂林市区躲避警报的好地方。不久，顾老师一家也搬到祝胜里，在小学后面。顾老师在广西大学任课，经过小学就要进来和老师们谈谈。她是工合小学的理事。她叫我到她家去玩，她的外甥女孙幼礼和我一般大。记得1943年春节年夜饭就在她家吃的，就此认识了简竹坚，孙少礼（幼礼姐姐）和另外二位男青年。经顾老师倡议：在她家组织一个“读一本书的读书小组”，有孙少礼、孙幼礼、简竹坚、朱敏和另外二位男青年（听说是少礼的朋友），约六七人参加。第一次小组会由孙少礼谈她读了《印度尼赫鲁传》的心得和证论。讲得很好。陈老师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他谈了当前国际形势，指出印度反英殖民主义斗争，以甘地的“绝食”运动来反抗是太消极了，后来由尼赫鲁号召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反抗英殖民主义是进了一步。但是限于尼赫鲁本人是英国留学生，只在知识分子中组织，力量很薄弱。他举例说：尼赫鲁生活很奢侈，平时穿的衬衫都要寄到英国去洗……等。陈老师的发言，非常丰富，语言简练，动人心弦。经过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历历在目，就在眼前一样。他的指导，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入神，感到其



中的深刻，使人永远不会忘记。

陈老师的教育和启发，大大地触动了我的思想和回忆。我从抗战开始，就从学校参加救亡工作，后来参加了张锡昌老师领导的“浙江太平区经济建设实验区”的农村工作，组织农民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以改善农民生活。在实际工作中启发和组织农民起来抗日。就在此时，接受了党的教育，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到了1941年，国共统一战线被国民党破坏，党决定隐蔽党员，保存力量。党组织决定我转移到桂林。这次听了陈老师的启发教育，想到我党政策非常正确。可以说对我是一次深刻的党课教育。我暗自立誓，努力学好俄文，一定要回到党的怀抱。

1945年日寇投降，我就和张锡昌老师的大女儿张明华同志一起由桂林奔向解放区，后来参加了解放军部队。这是陈老师对我教育的结果。

陈老师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儒雅大方，文质彬彬，对人亲切关怀像慈父一样。他生活很俭朴，胸怀开阔，不计小节。他在“桂林工合事务所”工作时，常是徒步由郊区走进城去办公，下班临近傍晚，又和张锡昌老师徒步回祝胜里。我现在想，这徒步运动使他现在仍有强健体魄，享受100岁高寿的条件吧！他胸怀开阔不计生活小节，是他在高寿时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能坚持生活一丝不乱的习惯吧！他直至耄耋之年仍能牢记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是他的党性表现。我们后辈应深深地向他学习，再学习！

祝愿他

长寿如松柏，永远长青！

寿比南山！永远健康！



无处不闪光

——记陈翰老

孙巧成

翰老百岁，众人庆贺，愿老人家健康常在，寿比南山。翰老为人，人人敬仰，几代人称颂，有口皆碑。岁月流逝，往事虽已依稀模糊，惟翰老人品，如夜空中明星闪耀，仍历历在目。

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认识翰老是在1959年秋初入国际关系研究所之时。那时，翰老是副所长，研究所有一二百人，在外交部或学术界知名的人士不少。几个青年人入所，所领导未必知道，尤其是翰老，他既不管人事，也不是我所在的小单位的顶头上司。所以，初次同翰老接触是在楼道里相遇之际，我很敬重地叫他声“翰老”，可能是又见到了一张生面孔，他便停住脚步同我说话。他以很浓重的江浙口音问我：“你是新来的？”又问了姓名，多大了，学什么专业，从什么地方来的，来了多长时间，分配在哪个室工作，我一一作答。当得知我是杭州人时，他笑着说：“我们是老乡，我的话你听得懂吗？”短短三两分钟的谈话使我马上感觉到翰老是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不像有些领导那样有架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只是点头而过，从无言语。

翰老的记忆力很好。以后在院子里再见时，他频频点头，有



时还叫出我的名字，主动同我们攀谈起来。谈日常生活，谈如何做研究工作，还常常夹些幽默话，引大家发笑。翰老是位大学者，又是老党员，曾经同宋庆龄这样的伟人共事过，能如此和蔼可亲地跟我们这样的小青年接触，令我至今难忘，使我由衷地对他肃然起敬。

这是陈翰老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二、一把剪子，一瓶浆糊

翰老对于如何搞研究工作自然有他极为丰富的经验，但是，他没有在所里介绍过，讲述过，至少是我没有机会聆听过。不过，在日常接触中，翰老则经常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这些刚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多次托出过他的经验之谈。他说搞研究工作，尤其是初入门者，一定要眼勤手快，努力收集资料，丰富充足的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他还说，任何人都要亲自动手收集资料，核实材料，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的谈话形象生动。令我始终铭记在心的是关于“一把剪子，一瓶浆糊”的讲话。他说搞研究工作，离不开一把剪子和一瓶浆糊，一旦发现有用的材料，就要随时随地把它剪下来，贴成册。所以，剪子和浆糊要不离身。剪剪贴贴，抄抄写写是任何研究人员的基本功，最简单的，也是最不可缺少的。没有资料，写不了文章，有理说不清，有理不服人。他还作现身说法，领我们到他办公室去看看。的确，在他的办公桌上，剪子和浆糊赫然在目。他说，我搞了几十年研究，到现在还随身带着这两样东西。翰老的这一番话，对我们说过多次，也使我渐渐地重视资料工作，养成积累资料的习惯，受益匪浅。

三、直言不讳

有话直说是翰老留给我的最突出的印象之一，也是我敬仰他



的人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所内，不论会上会下，经常直言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怎么认为便怎么说，一吐为快，毫无隐讳。他并不要求其他人认同他的观点，但是，要让他说出他的看法。

关于研究工作，翰老坚持根据事实得出结论，整个工作一直围绕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学说进行，翻来复去探索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的征兆，我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专门收集西欧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资料。翰老对这种学风不以为然。经常摇摇头，表示异议，总是说“结论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当时，他的看法经常受到反对，他只好自言自语：“历来都是材料里头出观点。”

翰老的直言有时直得实在惊人，在政治问题上也是如此。一直忘不了的一次是他关于“大跃进”的谈话。50年代末，全国都高举三面红旗，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新闻报刊上尽是“丰产高产”、“吃饭不要钱”、“大步迈入共产主义”之类的说法，对“大跃进”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但是，翰老则不然，他作为社会名流到地方上参观考察之后，对虚报浮夸作风深感忧虑。后来，他在会上就公开地说：“这样下去，哪里是大跃进，反而是大跃井了。”他怕大家没有听懂，还向前一倾，做了个下跳的动作。当时，我们听了都吓一跳，为他捏了一把汗。可是，翰老自己却十分坦然。我想，他也不会不知道这样讲的风险，但是，是忧国忧民之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驱使他如此直言不讳。

四、泰山压顶不弯腰

文革期间，加在翰老头上的罪名不少：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走资派，假党员等等，多次受到批斗，戴过高帽子。他在隔离审查期间，面对厉声厉色的严词盘问，甚至是老年人难以承受的粗暴行为毫不屈服，就是不低头，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

批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坚持说：“我不反动，我是革命的。”



批他走“白专道路”，他反问道：“专有什么不好？”“不专有什么用？能为国家做什么？”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他摇摇头说：“我没有反党，没有反革命罪行，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又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从没有隐瞒过什么。”要他揭发他人，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叛党投敌行为，他表示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和事。相反，他觉得同他一起在白区工作的人都很爱国，热情支持党领导的斗争，抗击日本人，反对国民党。他坚持无可揭发，结果是审查一无所获。

翰老后来说过，我不能歪曲事实，我不能说没有良心的话。顺便说一句，翰老平日言谈中很强调“要有良心”，他的为人如其言，注重著书立说和办事做人，都要凭良心。

五、诲人不倦

翰老在研究所期间，他的才能不受重视，他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言行观点常常与众不同，同当时的领导和政治观点不合拍。但是，古稀之年的翰老依然精力充沛，于是，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自找了一项工作，便是自愿地教青年人学英语。这工作始于文革之前，参加学习的都是研究所的人，或在所里开课，或在翰老家里教学，或三两人，或组成一个班。翰老对愿意学习的人，不论水平如何，热情欢迎，多多益善，从不拒之门外。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基本上是在家里教了，而且也有外单位的人参加。翰老教英语自始至终是义务的，不要也没有任何报酬。

翰老教英语十分认真，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但仍事先备课。他要求学生很严，连发音口语也毫不含糊。当时，我们学英语是作为第二外语，只想能阅读报刊就行了，不求念得准，说得好。但翰老却坚持要发音确切，掌握基本口语。他强调发音不准，开不了口是欲速不达，只会事倍功半。有时，翰老严得使有些人受不



了，不想学了，想打退堂鼓，但又不好意思提出来。有的人真的不学了，翰老还会来动员你。翰老对教学十分热忱，甚至比学生还积极。他教得很耐心，他不怕你进步慢，只怕你不坚持。他教英语不是心血来潮，因此，能持之以恒，工作和社会活动再多，也尽力做到不误课。在这方面，他常常比学生做得好。我们这些当学生的还常常请假，甚至忘记了，缺了课，惟有老师总是准时来到。

翰老教英语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寿星了，真是诲人不倦。

我同翰老接触主要在1959—1969年那10年间的老研究所。70年代，翰老还担任新研究所的顾问，但顾而不问，他来所少了，难得见面。60年代，我是大学刚毕业的小青年，翰老是老者和领导、名人和权威，我们之间差距太大，同翰老的接触不可能多，深入地了解自然更少。我所能知道的都是日常交谈中，常常触动我的心迹、永远也不会忘却之事。以上所写诸点都已是30年前的事了，一言一语不免有出入之处，然而对翰老的看法、态度和神情是不会“差以千里”的。

我仅以此文贺翰老百岁华诞。



陈翰老二三事

刘存宽

久闻陈翰老的大名，但是我第一次认识他，还是60年代初的事。

1961年初夏，吉林大学校领导派我来北京邀请翰老去我校讲学。那时翰老正兼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该所位于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内，很不好找。我费了好大的工夫，走过一幢幢洋溢着异国情调的使馆大楼，顺利通过了各国使馆门前中国哨兵警惕目光的审视，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研究所。

进了大楼，我先去看望我过去的一位老领导，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从侧面问他翰老现在是否有空，并告诉他我是奉命来邀请翰老去吉林大学讲学的。他说翰老人很热情，会答应的。我又提出可否在该所查阅一些外文资料，他也慷慨应允。但当我要求见一见我在北京大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时，这位老领导就面有难色了。他迟疑片刻，说道：“小刘，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行不行？”我怀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这位老领导的办公室。

然后，在走廊的另一端，我轻轻地叩开了翰老办公室的门。我当时年仅32岁，不过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一名青年讲师。由于我前此读过翰老的一些著作，知道他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又在国外生活过几十年，还是20年代的老党员，因而心里感到有些不安。



可是，当翰老慢慢打开房门后，我的不安立即烟消云散了。

那时翰老已是60多岁，可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体格十分健壮，头发乌黑光亮，精力充沛过人，气宇轩昂，风度洒脱，面目慈祥，彬彬有礼的人。在他身上，感觉不到领导的架子，也没有20年代老党员的功臣模样，全然是一副学者本色，朴实无华而又平易近人。他看上去似乎只有五十开外光景。

当我说明来意，递上校方的邀请书后，他沉吟片刻，就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不禁为我此行的顺利完成任务，感到庆幸。交谈片刻以后，我又向翰老指出想见见老同学的事。不料他的回答和我那位老领导完全不一样。他说，你那位老同学1957年被划成右派，但他工作很好，有错可以改嘛，为什么不能见见？这件事虽不大，却体现出翰老的宽阔胸怀。

几天以后，翰老和我登上北京——长春的特快列车。在长达近20个小时的旅途中，翰老休息得很少，我们一路上欣赏祖国的锦绣河山，一面海阔天空地畅谈。渴求知识的我，一心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多聆听他的教诲。我当时在学校讲授世界史，对美国和印度的历史极有兴趣。我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翰老情绪很高，诲人不倦，有问必答。我们从美洲印第安人，美国黑人谈到美国的华工；从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内战谈到西进运动；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新政谈到美共。翰老出于对一个年轻教师的关怀，总是十分耐心地向我作各种说明，饶有风趣，娓娓动听。他说他十多岁的时候在国内看见一幅美国加州大甜橙的广告，便立志要到那里去种柑橘，这是他去美国的最初动机。他在美国住了很久，也在苏联、印度等国住过。在美国，他结识了美共主席福斯特和美共总书记丹尼斯。他还谈到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三个国际的历史》、《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等书的写作经过，还说这些书是由福斯特口授，由秘书打印成稿修改而成的。他还对白劳德和“美国例外论”发表过精辟见解。在谈到印度的时候，翰老从马其亚力山大大帝远征印度河流域说到阿育王、甘地、尼



赫鲁，从印度的民族、宗教、文化、土改说到土邦、种性。他还讲了他1955年去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时的一段插曲。有一次，在前往某地参观途中，火车在某站停留时，当地派了几个女孩上车来献花。当时是阳历4月，印度已较炎热。女孩们汗流满面。翰老给他们倒了水喝。女孩们喝完水，下车去了。车启动后，陪同他的一名印度官员突然拿起一只女孩们喝过水的杯子，扔出车窗打得粉碎，一面向翰老解释说，那个杯子是一个低级种性的女孩喝过的，我们不能再用。翰老是印度通，自然了解他为何要扔杯子，对此只报以淡然一笑。他还向我说起印度贱民的悲惨处境。他们是“不可接触之人”，出门时只能匍匐行走，以免自己的影子投在别人身上，导致不祥。为此，他们总是敲着梆子，向行人预报自己的到来。他说这种陋习在当时印度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言谈充满了对处于印度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无限同情。

在北京——长春近20个小时的旅行中，我获得一次生平少有的学习机会。那时东北的辽阔原野，积雪初消，车窗之内，春光融融。两代学人之间，正在学术的漫长之旅中交接着接力棒。翰老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正直高尚，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后来，在那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中，翰老备受折磨摧残。我虽没有见到他，却时常关心着他的处境。

70年代初听说他在东华门家中义务给一些青年教授英语时，我感到格外的宽慰。“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正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翰老任我院世界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我们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翰老这时已八十有余，得了青光眼，双目接近失明，但他仍孜孜不倦，勤于著述，向学术界献出了极有参考价值的、洋洋大观的《华工出国史料》等多种著述。我院的一些重要会议，他仍然参加。记得80年代初，在我院大会议室举行一次全国档案工作座谈会上，翰老作了一次重要发言。曾三同志，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省市档案馆的负责同志，还有学术界的许多同志参加了会议。翰老在



发言中着重强调了档案工作为科研服务的重要性，指出档案不向学术界开放对科研危害至大，并对一些档案部门思想不解放，甚至垄断档案的现象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他的这番讲话，直爽坦诚，切中要害，说出了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心里想说的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拥护，对后来档案法的制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一面听着他的发言，一面对翰老一贯敢作敢当，襟怀坦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为祖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的崇高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会后，我不禁对一位与会的朋友发出这样的赞叹：“他还是他！”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对于我来说，翰老便是其中的极少数人之一，尽管翰老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不仅是我学术生涯中的良师和引路人。他的淡泊名利（如建国初年婉拒了周总理请他作外交部副部长的建议），一心治学、光明磊落、乐于助人的高风亮节，也是我毕生学习的楷模。

欣逢翰老百年华诞，写下这几段往事，托童瑜琼大夫转致翰老，以表达我对他无比崇敬和热烈祝贺之情。后之读此文者，必将有感于斯人。



中国的脊梁

胡其安

我认识翰老，是在一个非常时间和非常的地点。1967年的初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之中。神州大地，愁云惨淡。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繁忙的火车站的月台上，谁也不知道下一站会发生什么。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风云突变，我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把我押上一辆吉普车，车窗挂着黑布，我无法知道车的去向，只知道是在北京街道上驰骋，约摸十分钟，车停我又被押解下车。车是停在一座深黄色的大楼前，入口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我识出这是东交民巷（当时改名为反帝路）8号的大院里。这里原是法国驻华使馆的旧址。由于位于外交部街的外交部大楼属于危险房屋，东交民巷8号就成了当时外交部的临时驻地。

我被带进大楼里的一间宽约10米的地下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着黑色中山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端坐在一张本色的木板床沿上。看守我的红卫兵事先交待我们不得“串联”。所以我们只能行注目礼。幸好，看守并不老守在屋子里，我们有的是时间，互道姓名，进行交谈。我终于知道他就是人们尊敬的陈翰老。

翰老向我问明原委之后，用浓厚的无锡语，半似安慰地对我说，“没有事体的，我们是在劫难逃。获得自由以后，我请你吃



饭”。而在这个“牛棚”里，每逢吃饭时间，我们就被列队押解进外交部的大饭厅里，颇有“示众”之意。在过道里恰巧碰见愁容满面的龚澎大姐，大家也只能相濡以沫。

在“牛棚”里的日日夜夜，翰老和我谈了他一生的经历，一个为新中国的诞生而长期奋斗的人，竟然受到这样的对待，用翰老的话说，是坐进共产T的“班房”，大家不胜唏嘘。而在这期间，翰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临危不惧，处逆境于泰然的精神。对他来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天早晨起床，他总是脱下睡衣，折叠后放在枕头底下，然后迅速地整理被褥，像是一个受过军训的青年人一样。

流光如驰。1971年秋，当时大家都已“解放”，结束了“牛棚”生涯。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东四外交部礼堂听传达林彪事件，在大院里不期而遇。翰老拉着我的手，十分认真地告诉我，他在某月某日得到“解放”，并约我去他当时的东华门大街38号寓所便餐。从此我成为翰老家的常客，我们是忘年之交。他学贯中西，无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各种掌故，他都有惊人的记忆，娓娓而谈，是一本活的辞书，特别是他的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实是我的良师益友。

这里我讲一件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有一次我问翰老的健康。他回答说，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只是由于青光眼，视力衰退。然后他又斩钉截铁地强调“我的眼睛代表政府，他们看不见现实，脱离了人民；而我的头脑代表人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还记得80年代初期，好像是一次反精神污染运动中，翰老忽然打电话要我去。他告诉我，他可能要坐“班房”了。原来他当时指导一位美国研究生，并给了她一份社科院研究50年代晚期人民公社经济的文稿作为参考。而当时这类材料一般都印有“内部文件”或“机密”字样。因此，翰老有“泄密”或“里通外国”之嫌，这其实是莫须有的。我安慰翰老说，一切都会清楚，绝不会



坐“班房”，而他却十分地认真，连漱口用具和换洗衣服都做了准备。果然，过不多久，终于真相大白，翰老很高兴地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的事体，胡耀邦同志说了一句话，他说陈翰笙是个好老头儿”。事情就是这样圆满地划了句号。

我现在海外，无法亲临翰老百岁华诞，谨致此文为翰老祝寿。我在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记述翰老生平的文章（新华文摘曾经转载），说翰老是中国的脊梁。今天仍以它作为这篇短文的题目。

祝翰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